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

碩士論文

鄉鎮企業與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之研究

The Study of TVEs and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研究生：王翔慧 撰

指導教授：林德昌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致謝辭

謹以此書 獻給我親愛的家人

西子灣的兩年時光以這本論文劃下尾聲！很慶幸在每個求學階段中，我都能體驗到豐富、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認識很多朋友、接觸到不同領域的師長、學習到書本之外的可貴經驗，這些都是我未來人生中的至寶！

尤其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林德昌博士—對我的照顧及鼓勵，還有兩位口試委員—許光泰博士、朱景鵬博士—不吝於給我論文上的指教；此外，我也要感謝范錦明教授和甦成姐在資料蒐集與研究方面的幫助，以及孟娟姐、千宜姐在行政上的協助。

還有要感謝我的摯友瑞霏、訓宏、建池及佳欣學姐，你們的傾聽與安慰不斷支持我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在許多熬夜的日子裡，與惠蓮姐、思謙的相互砥礪成了我前進的力量；譬如學姐、立岡學長、盈捷、張菁、冠廷、珮茹、怡帆總是分享我的喜樂悲傷；秀韻學姐、重陽學長、千婷、惠萱、孟忻、宜靜、怡春、碩彥、士豪、孟真，你們的送餐服務、貼心陪伴會深印在我的腦海。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你們給了我珍貴的信賴與自由！還有眾多阿姨們對我生活上、課業上的關心與照料。

祝福你們—我的好友們、師長們—也能夠擁有美麗而充實的人生！

永遠的奶油翔慧 2004 夏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現代化理論中的「經濟現代化」為主要架構，並且採用鄉鎮企業為研究標的，來分析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鄉鎮企業是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企業形式，中國大陸這種以鄉村為資源基礎、並延續經濟改革前集體所有，同時揉入現代經營管理模式的企業形態，儼然成為今日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此外，鄉鎮企業體制本身的特殊性也是本研究的重點，由村民、政府官員、經營者、黨幹部為成員，使得農村社區與黨、政府間形成一種特殊的相互依賴關係。最後，延伸探討經濟現代化過渡到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則中國大陸又呈現出不同於西方現代化國家的發展路徑。

關鍵字：鄉鎮企業、現代化理論、經濟現代化、經濟發展、地方政府組合主義、村民自治。

* * * *

Abstract

The main frame of this research i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categorized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VE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VEs is a kind of special enterprise style of China. TVEs integrate rural resources,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into the main pow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Moreover, also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VEs’ system are the emphasis of this research. The members of TVEs which are villagers, local government officers, managers, and party cadres form a kind of special mutual-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mmunities, 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governments. Finally, the extending question i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ransiting to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lso China with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nations.

Key Words: TVEs, Modernization Theory, Economic Moder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 * * *

目次

致謝辭	i
中英文摘要	ii
目次	iv
表次	vi
圖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理論架構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	8
第二章 理論分析架構	
第一節 現代化理論文獻回顧	11
第二節 鄉鎮企業沿革相關理論	17
第三節 指標應用的相關理論	22
第四節 鄉鎮企業與基層政權相關文獻	26
第五節 小結	33
第三章 經濟現代化分析	
第一節 工業化水準	35
第二節 企業產權結構的轉變	50
第三節 二元經濟體的轉變	62

第四節 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	75
第五節 小結	86
第四章 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	
第一節 中央地方關係的轉變	91
第二節 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的政企關係	99
第三節 政企互動實例	112
第四節 村民自治與黨支部	120
第五節 小結	132
第五章 比較研究與結論	
第一節 西方現代化	137
第二節 中國大陸現代化	143
第三節 鄉鎮企業的角色	147
第四節 展望	151
參考文獻	
中文書籍	153
英文書籍	156
中文期刊	161
英文期刊	163
其他	164

表次

3-1、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比較表	36
3-2、中國大陸三級產業產值比重趨勢表	40
3-3、鄉鎮企業三級產業增加值比重趨勢表	41
3-4、鄉鎮企業增加值占全國三級產業比重	42
3-5、中國大陸三級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趨勢表	43
3-6、鄉鎮企業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趨勢表	44
3-7、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佔全國三級產業比例	45
3-8、二二二年國家干預經濟比例表	52
3-9、國家對鄉鎮企業經濟自由度比較表	53
3-10、全國從業人員統計表 - 以企業產權區分	55
3-11、全社會各類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表	57
3-12、各類型鄉鎮企業單位數	59
3-13、全國衛生醫療服務概況表	77
3-14、二二二年農村地區衛生醫療概況表	77
3-15、中國大陸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統計表	78
3-16、國家科學研究經費支出表	86
4-1、中央與地方預算外收入比較表	95
4-2、承包合同結算方案	114
4-3、村民委員會統計表	122

圖次

2-1、二部門剩餘勞動力模型修正圖	24
3-1、中國大陸國內與鄉鎮企業人均生產總值（增加值）比較圖	37
3-2、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成長率比較圖	38
3-3、中國大陸三級產業比重圖	39
3-4、中國大陸工業與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趨勢圖	46
3-5、中國大陸工業與鄉鎮企業工業貢獻程度比較圖	47
3-6、全國與鄉鎮企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個別比例趨勢	48
3-7、全國與鄉鎮企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趨勢	49
3-8、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程度	51
3-9、國家干預各類經濟比例	51
3-10、全國各類型企業從業人員比重趨勢圖	56
3-11、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佔全國非國有部門從業人員比例	56
3-12、全社會各類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趨勢圖	58
3-13、鄉鎮企業產權結構比重趨勢圖 - 增加值	60
3-14、鄉鎮企業產權結構比重趨勢圖 - 從業人員	62
3-15、農林漁牧業平均每人產值增長趨勢圖	68
3-16、中國大陸二 二年農業與非農業人口比例	68
3-17、農村勞動力分佈圖	69
3-18、中國大陸城鄉人口比例趨勢圖	71
3-19、中國大陸城鄉人口成長率比較圖	72

3-20、鎮人口佔農村人口比例圖	73
3-21、鎮與鎮人口成長率	74
3-22、城鄉婦女？ 娠死亡率比較圖	79
3-23、二 年中國大陸教育人口分佈圖	80
3-24、二 年全農村勞動文化程度	81
3-25、中國大陸城鄉電視機普及率比較圖	83
3-26、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用戶趨勢圖	84
4-1、地方組合政府示意圖	97
4-2、鄉鎮企業運行圖	106
4-3、絲織廠組織運作圖	114
4-4、村民自治體系與鄉鎮企業關係圖	123
4-5、黨組織運作途徑圖	128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國大陸現代過程中，鄉鎮企業（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簡稱 TVEs）身為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究竟扮演何種角色？而鄉鎮企業本身體制的特殊性，是否意味著中國大陸現代化過程中，有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或西方國家的特色？

以下本章內容茲就研究動機與目的詳細闡述，並且簡單說明本篇研究所採用的理論架構，研究方法部分也詳細指出研究指標的選擇標準。希望帶領讀者對本研究有概略性的了解。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前，城市與鄉村宛如兩個不同的世界，¹而戶口制的實施則象徵著城鄉之間的分隔線，²不僅限制了城鄉人口的自由流動，也造成農民和城市勞工的差別待遇，即不同的戶籍，享有不同的權利和待遇。³由於計畫經濟體制下，所有生產、消費、投資的經濟行為皆由國家計委從事分配與規劃，因此，有關城市與鄉村間的互動也都是在計畫下所進行的。⁴城市的發展主要是

¹ Anjali Kuma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Production, Trade and Marketing," in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edited by David S.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London: Routledge, 1994), 99.

² 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New York: M.E. Sharpe, 1999), 23-50.

³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八四至八五。

⁴ David Zweig, *Freeing China's Farmer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185-189.

以國有企業為主軸，著重工業與重工業；而相對的，鄉村則以人民公社為發展中心，從事農產品生產，落實鄉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政策原則。

中國大陸一九七八年的經濟改革，溯其源實起於農村的改革。以往人民公社所生產的農產品價格被限定，使得農業生產成本增長速度高於產量的提升速度，農業政策無法提升農民增產的誘因；並且，戶口制的人口流動限制，隨著農村人口的增長，使得每人平均可耕地面積下降，造成農業勞動力大量剩餘。⁵其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誘發了農民生產的動力；⁶另外，同時間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升，兩方面交互作用下使農民的收入增加，促進農村的資金累積迅速增長。⁷

在一九七〇年代前期，中央鼓勵農業機械化，各地的社隊企業紛紛興辦起農機廠；⁸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國大陸中央明確訂立了鄉鎮企業的地位，⁹合理轉化社隊企業為鄉鎮企業。但以往屬於社隊企業的機器、設備，在人民公社的體制下為集體所有；經濟改革後，這些機器、設備並不容易或不能被分割，因而鄉鎮企業也就承襲了社隊企業的集體所有形式。另外一方面，原就存在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以及迅速累積的資金，便成為鄉鎮企業與農村工業化發展的最主要要素。¹⁰

⁵ 劉志彪、唐勇，「中國大陸農業發展與鄉鎮企業」，*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論文集*，范錦明編著（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二〇〇一年），頁二七七。

⁶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231-245.

⁷ 王曉魯，「鄉鎮工業的資本形成和效率問題」，*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William A. Byrd、林青松合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九九至頁三五。

⁸ David Zweig, *Freeing China's Farmer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255.

⁹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明確指出了鄉鎮企業就是指：社（鄉）隊（村）舉辦的企業，部分社員聯營的合作企業，其他型式合作工業和個體企業。

¹⁰ 杜海燕，「鄉鎮工業的增長因素」，*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William A. Byrd、林青松合編

鄉鎮企業本身可以說是極具中國特色的企業形式，中國大陸這種以鄉村為資源基礎、並延續經濟改革前集體所有，同時揉入現代經營管理模式的企業形態，無論是在過往的東西方發展中國家，或是自由化後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沒有相同的發現。¹¹前文已揭述，鄉鎮企業是承續人民公社下的社隊企業而來，而這裡的社隊企業其實是指「公社、大隊、生產隊」的三級體制。¹²而演變至今，鄉鎮企業則包含鄉（鎮）辦企業、村辦企業、聯戶辦企業、個體戶企業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企業；前兩類屬於集體企業、其他則可歸類為私營經濟。¹³一九八〇年代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經營觸角不再限於與第一級產業密切相關的加工型產業；並且在企業自主方面，鄉鎮企業也享有招募、財務、銷售的自由，經濟行為無異於私營企業。

鄉鎮企業在中國大陸農村地區發展，最顯著的影響是吸納了剩餘的農業勞動力人口，¹⁴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數由一九七八年的二千八百二十七萬人，佔全國就業人數與農村就業人數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七點零四及百分之九點二三；擴大到二〇〇二年的一億三千二百八十八萬人，所佔比例分別為：百分之十八點零二與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四。¹⁵並且，這些被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到了二〇〇二年所創造出的生產力為三兆二千三百八十五點八億元，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點九，而其工業產值二兆二千七百七十三億元，則佔全國工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五七至頁六一。

¹¹ Fei-ling Wang, "Floaters, Moonlighters, and the Underemployed: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v. 1998): 459-475.

¹² 宋洪遠等編著，*改革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二八六至二九四。

¹³ 林青松、William A. Byrd, "中國農村工業概況，" *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一至二。

¹⁴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7-138.

¹⁵ *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業總產值百分之四十八點九四之多。¹⁶除此之外，鄉鎮企業在也對於農村居民的純收入、生活水準有正向的貢獻。¹⁷

本研究主要是由鄉鎮企業作為切入點，來觀察中國大陸現代化的模式。中國大陸最早在一九六四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時的總理周恩來提出了四個現代化：「中國要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又將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議題重新提出。由於現代化的議題進入中國大陸政府的施政指導原則，許多相關的學術及研究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設立，最具權威性的如：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北京同響現代化學術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等，也有相關的研究報告、以及包含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理論的提出。¹⁸

關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研究，大約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紛紛解體，民族主義盛行，出現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這些國家因而必須發展及建設獨立的經濟、政治、社會體系，許多現代化理論便是在這種時空背景下產生的。¹⁹「現代化」並沒有很明確的定義，有時常被視為是「發展」(development)的同意字；²⁰然而，西方的發展經驗為現代化提供了一種線性路徑的概念：將社會區分為傳統與現代社會，而現代化就是由傳統社會演變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並且是經歷曾經發生於西方國家的同一組變遷。²¹此

¹⁶ 同前註；《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¹⁷ David Zweig, *Freeing China's Farmer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253-267.

¹⁸ 北京同響現代化學術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網，<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 (二〇〇四年二月四日)。

¹⁹ 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二六。

²⁰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〇年)，頁一三八至一四二。

²¹ Ronald H. Chilcote, *Theoretic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300-302.

外，現代化理論研究所涵蓋的範圍與形式也有許多歧異。以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為例，Walt W. Rostow 成功的將英國現代化劃分為五階段，²²著重在經濟發展的階段區分，並向世界宣揚資本主義；而 Samuel P. Huntington 則著重政治層面：面對隨著現代化而來的社會與經濟巨變的同時，應該盡力維持安定。並主張在現代化過程中，應該盡量約束新團體參與政治、多提升教育程度，並且限制媒體開放報導的方式來掌控大局。²³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來採用「摸石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模式，在改革前中央將發展重心多放在城市地區，而經濟改革主要也多著重在城市地區的國有企業上；在這種現代化過程，農村地區相對不受重視的情形下，卻也沒有造成什麼嚴重的農民動亂。在許多研究中，發展中的社會在建立開放性的市場經濟時，往往因為偏重城市地區發展、忽略農村地區資源分配與貧富差距問題，而引起社會動亂或是農民革命。²⁴因此，在經濟改革過程中，身為農村經濟發展主要動力、且表現亮麗的鄉鎮企業便值得好好重視研究，除了前文略為描述的經濟貢獻之外，鄉鎮企業對於中國大陸現代化過程中其他的社會穩定意義又在哪裡？

此外，作者以為鄉鎮企業體制本身的特殊性也是本研究的重點。其一，在所有性質方面，鄉鎮企業是集體所有或是私有；其二、資金多是鄉或村政府透

²² Walt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²³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Apr. 1965),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²⁴ 轉引自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and 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and Joel S. Migda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過社區²⁵集資的形式來提供資金，或是銀行貸款、私人以及外國投資；其三、鄉鎮企業有相較於國有企業更靈活的職工管理體制；其四、鄉鎮企業主要目標為銷售與追求利潤；其五、鄉鎮企業不受政府的收購機制控制，生產銷售都在市場下進行；其六、鄉鎮企業的經營者必須自行尋求專業人才及技術；最後，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與地方社區存在密切的關係，無論勞動力、資金、土地、生產原料都由地方社區提供。²⁶再由鄉鎮企業成員來觀察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村民為勞動力提供者（或集資者）、專業經營管理者、地方黨幹部以及地方政府官員；鄉鎮企業由村民與經營管理者創造的稅賦上繳地方政府，作為農村本身所需的建設財源，而地方政府與黨幹提供企業充足的行為空間及法令上的便利性。²⁷

透過上述鄉鎮企業對中國大陸總體的經濟貢獻，以及個體分析鄉鎮企業形式特殊性的方式。本研究首要尋求中國大陸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鄉鎮企業的出現，是否使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途徑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又，鄉鎮企業在中國大陸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第二節 理論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鄉鎮企業在中國大陸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現代

²⁵ 社區是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泛指與一定地域範圍相聯繫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他既可以是——個國家，也可以市城市中的一個街區或農村中的一個鄉（鎮）一個村莊。這裡指的社區指的是縣以下的鄉（鎮）村社區。

²⁶ 馬戎、黃朝翰、王漢生、楊沐合編，*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五至六。

²⁷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14, and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95-138.

化理論的內容及範圍龐雜，因此由何處著手便是作者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在參閱許多學者的研究方式後，本研究選擇以「經濟現代化」作為切入點，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體現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所提出的現代化「三步走」策略模式，是以經濟的現代化為出發點：第一步，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一九九一年到二十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配合相關數據與資料作實證分析，使論述有較具體的驗證。

現代化理論中除了「經濟現代化」的研究之外，尚有探討社會現代化、政治以及文化的現代化等研究。因此，延續經濟現代化的總體性實證研究，轉而向鄉鎮企業的體制面部分作個體分析，透過 Fei-ling Wang 的勞動力分配模式可以觀察出，在所有權上為社區型、以及家庭式勞動力分配模式的鄉鎮企業，綜合了「勞動力市場」的新型態勞動力分配模式。²⁸另外，鄉鎮企業的組成人員背景除了提供勞動力的村民，及經營管理人員之外，尚有地方黨幹以及政府官員，利用 Jean C. Oi 的地方政府組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概念²⁹來觀察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私營及外資企業的不同。並期望透過以上鄉鎮企業的體制面分析，可以了解鄉鎮企業在政治或是社會現代化上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最後，則從以上總體、個體分析中歸納出鄉鎮企業對中國大陸現代化的貢獻，也要突顯其身為農村經濟發展主體，不同於其他西方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特點。

²⁸ Fei-Ling Wang, *From Family to Market: Labor Allo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2.

²⁹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95-138.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係以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主。

（一）歷史研究法

所謂的歷史研究法，是指從事物本身的產生和發展的具體過程，去研究和揭示發展的規律的一種方法。本研究透過對其他國家現代化過程相關歷史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橫向的作為研究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對比資料；並且針對鄉鎮企業的歷史背景史料作有系統的整理，縱向的作為分析鄉鎮企業體制面轉變的工具。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探討法是指，研究者蒐集與主要問題有關的期刊、文章、書籍、論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料，進行靜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了解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及可能產生的結果。而在本研究中，則著重蒐集與現代化理論相關的研究書籍、探討鄉鎮企業的理论性或實證性文獻、或是相關所需要運用到的理論資料、以及各類研究報告等，來支持、充實本研究的立論觀點。

（三）統計分析法

在本研究中，統計分析法為相當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主要利用中國大陸官方的統計資料與相關研究報告作為指標觀察的來源：如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鄉鎮企業年鑒、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現代化報告等。

並且，在現代化指標的選擇方面，較傾向總體層次的可量化經濟指標來做統計分析，主要參考學界常用的衡量方式，來轉化為可相對應用於鄉鎮企業的現代化指標；本研究著重在鄉鎮企業體制面進行分析，以突顯中國大陸現代化

的特殊性，因而不將採用的指標加權指數化，³⁰而採分開衡量的方式。本研究所選擇的指標內容分述如下：³¹

1.工業化水準相關測量

工業化通常是現代化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工業化所帶來的實質意義，最明顯的莫過於平均每人國民產值的成長。尤其是工業產值所佔的比重升高、農業產值所佔比重相對減少（但不表示農業產值絕對減少），或者發展到後來，服務業產值得比重也隨之提升；本研究中除了針對各產業產值的分析之外，尚針對各產業單位數量、以及從業人員數來做對應觀察。並且，以上各種數據皆可對應到鄉鎮企業的類似統計數字，如平均每人國民產值對應鄉鎮企業平均每人產值、工業產值對應到鄉鎮企業工業產值（增加值）。

2.產權結構比例測量

由於現代化本身所包含的意象相當廣泛，包括政治秩序、經濟體制、社會文化等，由產權結構比例來觀察，通常在現代化過程中，國家介入市場的力量會減少，轉移為維護市場自由運作等法制性的非積極作為。因而，在此可以藉由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比例相對減少作為指標來觀察，可以採用資產數量、從業人員數、單位數量以及單位產值等數據；相對於鄉鎮企業而言，由於企業經營行為幾乎等同於私營企業，便可以此觀察出鄉鎮企業對於產權結構比例變化的貢獻。

3.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測量

³⁰ 經「指數化」後的數字無法顯示個別指標的發展程度，對於各國的發展背景、政策導向等解釋能力較弱，因此較適合用來與世界各國做「現代化進程」的程度比較，而無法顯示中國大陸本身現代化的途徑與特殊性。

³¹ 下列指標分類參考：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七四至七九。

二元經濟結構是指城市以工業為主的現代部門，相對於鄉村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部門而言的並存經濟體制；而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階段，常會導致城鄉間的資源相互流動的現象，使相互區隔的二元經濟結構漸漸轉化為有連結性的整合經濟體系。在測量上除了鄉鎮企業的單位數量之外，還可針對雇用員工數量、企業產值、或資金來源等數據作為統計材料。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前就具有十分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徵，因而此項指標測量在中國現代化途徑中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4.其他內生性經濟指標

在新古典學派的經濟成長理論中，往往將難以量化的抽象要素視為外生變數，但這種衡量經濟發展的方式並無法呈現出實際現象。因而有一派學者致力於將這些因素內生化，發展出一套內生成長理論：根據內生成長理論，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必須尋求內生性的要素成長才能再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數量。³²由於中國大陸市場尚未完全自由化，對於內生性指標提升的追求尚不是很明顯，因此在此僅就參考性的列舉幾種衡量指標：在生活質量方面有醫療服務、嬰兒存活率等項；而教育程度、電視與網路普及率可歸納於知識傳播方面；此外，受到已發展國家相當重視的知識創新部份，則可利用知識創新的經費投入、人員投入、以及專利產出等項來衡量；³³除了以上幾個內生性指標之外，尚有其他難以量化的指標，如生態環境、文化環境、政治清廉度等。

³² 關於內生成長理論的幾篇重要研究有：Paul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 1986): 1002-1037, and Robert E.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 1988): 3-42, and Gene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1994): 23-44.

³³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4—地區現代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一五一。

第二章 理論分析架構

在第一章的理論架構一節中，已經概略性的介紹本研究總體的架構與理論運用的關聯性。因此，在本章中就不再花費篇幅重敘各理論的運用方式，而將針對本論文所運用的理論作較詳盡的描述，以及相關學者的看法、研究文獻回顧作組織性的整理；並且，也將針對鄉鎮企業的歷史背景以及發展模式作系統性的介紹。

第一節 現代化理論文獻回顧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社會科學對於第三世界並沒有多大興趣。當學者開始注意低度發展世界時，都有個潛在的假定：新興國家會踏著西方國家所走過的足跡前進。也因此，用來說明西方國家從封建主義蛻變到資本主義的理論典範，幾乎沒有經過修正，就整批輸入亞、非、拉丁美洲的研究中。而最早被運用的就是「傳統」(tradition)與「現代」(modern)這種簡單的演化分類。³⁴這兩種分法假定：所有的社會在某一階段都是類似的，因為它們都是「傳統」的社會，而且它們一定會經歷到曾經發生於西方國家的同一組變遷，成為「現代」社會。

35

一般而言，學術上對於「發展」這個課題可以區分為「正統的(orthodox)」與「激進的(radical)」理論兩類。³⁶正統的發展理論主要由 Max Weber 為代表

³⁴ Ronald H. Chilcote, *Theoretic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300-302, and Ian Roxborough 著，馬紹章譯，*發展理論* (台北：巨流圖書，一九八一年)，頁十一至二五。

³⁵ Peter L. Berger, *Pyramids of Sacrifice – Politic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11-25.

³⁶ Ronald H. Chilcote, *Theoretic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的思想所衍生。其論點特徵主要在於：認為發展經驗可以移轉給發展中國家、發展是漸進式的，並且背後有一套西方價值觀（western value）的假設。而激進的發展理論主要由馬克思學派為主體。而其論點特徵則在於：具有革命性以及實證性，並且有歷史發展作為理論支持；另外馬克思學派也認為發展其實是動態且不穩定的。³⁷而在本研究中採用的現代化理論，則屬於正統學派的範疇。

（一）現代化的意涵與概念

「現代化」一詞所包含的意義是十分龐雜的，而名詞定義也常常是學者們爭論的議題。一般而言，理論界對現代化大約可分為下述幾中觀點。³⁸

1.現代化不僅是時間尺度，更重要的是價值尺度。

現代化由英文原意來闡釋，應該是「使成為現代」的意思。這裡的「現代」並不是指我們所生活的時代，³⁹「現代」一詞最常被使用在文藝復興時代的著作中，是表達相對於「中世紀的」（medieval）一種新的觀念體系。沿用至今，「現代」一詞不僅是時間的尺度，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種新的價值尺度。

2.現代化並非是表達明確的時間觀念，而是表達一個過程。

「現代化」從字面上解釋是存有矛盾的：現在存在的東西都是「現代」的，又要如何將他們「現代化」？並且隨著時間的遞移，百年後的「現代」顯然與今日的「現代」不同。因此，「現代化」其實與時間並沒有太大關聯，它所表述

Westview Press, 1981), 271-330, and Charles K. Wilber and Kenneth P. Jame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Business Division, 1988), 3-27.

³⁷ Ronald H. Chilcote, *Theoretic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271-330.

³⁸ 有關現代化理論觀點的分類，茲參考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二三年），頁四至六。

³⁹ 當我們說「現代」這個詞語時，我們必須把它跟「當代」（contemporary）一詞作區分；而我們常說的「現代美國」，其實應該稱作「當代美國」。

的是一種歷史發展的方向、是某種社會的藍圖。

3.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工業化。

經濟學者將「現代」視為社會所生產的單位資本與財貨的「量的增加」，因此，很多人在採用「現代」一詞的時候，就只從經濟的觀點著眼，凡是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就被認為是現代社會。⁴⁰工業化有其共同的特點：都市社會、機械化、自動化、專業化的程度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廣泛使用、經濟成長、社會分工複雜等，常被用來作為檢定「現代化」的指標。

4.現代化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改變的過程。

這種觀點主要是由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的角度來觀察的，也就是將「現代化」視為一種「文明的形式」。現代化不只是片面的強調工業化與經濟現代化，應該從心理、思想與行為模式上轉變，否則是不可能成功的由落後國家跨入現代化國家之林的。

上述的幾種觀點，雖然對「現代化」並沒有一致性的看法，但彼此的解釋卻也沒有互相對立的意象；不同領域的學者也賦予「現代化」不同的解釋：社會學家認為，現代化是由低度發展社會到高度發展社會的過程，也就是社會部門相互影響而導致社會結構的變遷；經濟學家則認為，現代化是經濟由低度發展到高度發展的過程，社會的消費行為會趨於成熟；政治學家解釋現代化是傳統政體轉變為現代政體的過程，是政權合理集中化的過程；歷史學家強調現代化是一種歷史範疇，而包含各層面的變遷過程。總而言之，「現代化」是一種內涵豐富、多層次、多階段的歷史過程，並且會隨著時間的推進不斷賦予本身新的內容。

因此，對於「現代化」過程特徵的描述，Samuel P. Huntington 提出了幾個

⁴⁰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頁一三。

綜合性的、被各界廣泛接受的想法。⁴¹

1.現代化是一種革命性的過程。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轉變，必然會涉及到人類生活方式最根本的變化。

2.現代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無法將現代化過程簡單的歸納於某個因素或範圍，它包含著人類行為、思想所有領域的變化。

3.現代化是一個系統的過程。某一個因素的變化將會聯繫、並影響到其他因素，造成更多的變化。

4.現代化是一個全球性過程。現代化起源於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但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性的現象，最早是由歐洲的現代思想與技術擴散造成的，但也同時成為非西方社會自身發展的結果。

5.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代化是在各個領域全面的轉變，只有透過漫長的時間才可能完成、是一種緩慢的進化過程。

6.現代化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現代化的過渡階段可以區分為許多小階段，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演進模式，但所有社會都必須經歷這些本質上相同的階段。

7.現代化是一個趨同性的過程。現代化導致不同的社會有趨同的走勢，使不同的國家漸漸相互依賴，最後形成人類社會的一體化。

8.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現代化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暫時性的衰退現象，但總的來說，現代化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的。

9.現代化是一個進步的過程。現代化的代價與痛苦是很巨大的，但最終會帶給人類為化上、實質上的美好生活。

⁴¹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 1971): 283-322.

（二）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自一九五〇年代發展至今，各領域的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進行相關研究，以下根據不同領域簡單介紹現代化理論的發展。

1. 社會現代化理論

美國的社會科學家 Talcott Parsons 最著名的理論是依據行為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系統理論，⁴²他將現代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歐洲西北角（英國、法國及荷蘭）為主導，如英國的工業革命及法國的民主革命；第二階段是以歐洲東北角（德國）的工業化為主導；第三階段則是以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為主導，突顯美國的現代化使工業革命與民主革命有更好的結合。

Talcott Parsons 之後，其學生 Wilbert E. Moore 將現代化視為工業化的結果，研究現代化的初始條件；而 Marion J. Levy Jr. 則對現代化社會結構提出具體特徵描述；⁴³Daniel Lerner 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其所包含的要素與結果是全球性的，並且相同的模式會再現於所有進行現代化的國家。⁴⁴社會學的研究方向源於社會進化思想，認為工業化是現代化的觸動因素，而工業化也必然造成現代化的結果，並且強調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別。

2. 政治現代化理論

以 Samuel P. Huntington、David Easton、Gabriel A. Almond 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研究認為：政治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核心。Samuel P. Huntington 強調，現代化過程中應該要約束新團體參與政治，應避免全民過度熱衷政治造成不平衡。⁴⁵並

⁴² 社會系統論的重要著作：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⁴³ Marion J. Levy J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⁴⁴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England: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67.

⁴⁵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Apr. 1965), and

且與 Joan M. Nelson 建立、檢驗五種發展模式；⁴⁶Almond 則將「現代」與「傳統」的概念運用在政治分析中，把已發展、未發展及發展中的政治體制加以區別，高度發展的政治體制為現代社會的特徵。

現代化最顯著的特徵是國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國家政治體制、民主制度演化與變遷是政治學界研究現代化的重心，主張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分權化以及秩序化，並且強調政府權威的合理性與政府能力的有效性。⁴⁷

3.經濟現代化理論

Walt W. Rostow 以英國為研究標的物的經濟起飛論，⁴⁸將英國工業化過程劃分經濟成長階段，起飛論的五階段主要分為：(1)傳統社會，(2)起飛前的潛伏階段，(3)起飛階段，(4)成熟階段，(5)高消費時代，此理論也成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聖經；還有 Simon Kuznets 著重在產業結構的轉變，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與就業結構會發生轉變。

經濟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是工業化與城市化，認為持續性的經濟成長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因素。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有的著重經濟成長與政治、文化的變遷是否有規律性；也有著重不同的經濟現代化成長模式；或是經濟現代化成長的各階段研究等。

4.人文範疇的現代化研究

以 Alex Inkeles、David C. McClelland 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研究的人文學方向。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⁴⁶ 轉引自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an M. Nels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⁴⁷ 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二八至三。

⁴⁸ Walt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⁴⁹關於人文範疇的現代化研究主要著重在：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最根本保證，並指出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社會穩定、持續和健康發展的基礎。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就是人的價值觀、心理素質、行為特徵的轉變與培育的過程，尤其強調人的參與意識、開放意識、進取精神、創新精神、獨立性和自主性。特別是 Alex Inkeles 等人提出的現代化十項特徵，為傳統工業時代現代化的實證研究與定量評價開拓了新思路，此標準被國際社會廣泛用於評判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水準。

5. 制度學角度的現代化研究

Cyril E. Black、S. N. Eisenstadt⁵⁰等為代表的（體制比較研究）制度學方向。該研究方向主要從人類歷史發展演化的角度，對不同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進行比較實證研究，提出現代化發展模式多樣性的觀點，並對多樣化的模式進行深入詮釋與剖析。以 Black 的現代化發展四階段⁵¹為例：(1)傳統社會面臨到現代化的挑戰，(2)傳統領導者退出、追求現代化的領導者團結後取而代之，(3)經濟及社會轉型，由農村集農耕組成的社會轉型成城市及工業組成的社會，(4)社會整合。在研究方法上，開闢了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多變數分析方法，應用其基本思想構建指標體系，對現代發展水準進行評估。

第二節 鄉鎮企業沿革相關文獻

在有關鄉鎮企業的探討文獻中，大多指出鄉鎮企業的出現與發展和農村工業化息息相關。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政府重視城市地區的發展，利用戶

⁴⁹ 周穗明等，*現代化：歷史、理論與反思—兼論西方左翼的現代化批判*（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二二一至二二三。

⁵⁰ 同前註，頁二二二。

⁵¹ 轉引自 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口制、糧票、路票等配給工具，限制了城鄉間的人口流動，形成壁壘分明的二元經濟體制。⁵²

提到農村工業化，最早其實可以追溯到一九五〇年代後期，時值中蘇共分裂，中國大陸提出自力更生，以及其後影響中國大陸至今的三線工程也在這個時期醞釀成型。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的激進派發起了一連串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激勵農村工業發展、促進糧食生產，並且在全國各地都建立起大規模的農村社會主義集體，但因為太多的投資浪費、受人詬病的農村幹部「五風」、⁵³還有包產到戶的聲浪越來越高，這階段的農村工業化終究宣告失敗。⁵⁴

人民公社下的社隊企業可說是今日鄉鎮企業的前身。在開放包產到戶後，增加了農民生產的動機、將生產自主權下放回歸到家庭單位，但對農民而言並不是全然有利的；雖然家庭聯產承包制釋放出許多個體農戶，卻也造成分散的農戶在市場上議價能力的弱勢。⁵⁵因此，村和鄉政府開始建立和擁有鄉鎮企業，以往的農村集體轉化成工業集體，也開啟了鄉鎮企業快速增長的時期。以下則介紹鄉鎮企業延革的概況。

（一）人民公社的農業集體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央發布政策要求人民公社全力發展農村工業，保證在為期十年的期限內，每年由中央財政撥款十億元，專門用於推動農村工業化；到了一九五九年中，中國農村已經有了七十萬

⁵² 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New York: M.E. Sharpe, 1999), 23-50.

⁵³ 「五風」包括共產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以及高指標風。

⁵⁴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頁五二至七。

⁵⁵ Walter E. Nicholson,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7th ed. (Orlando: The Dryden Press, 1997), 252.

個社辦企業，號稱產值七十億，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百分之十。⁵⁶而後的全民大煉鋼、超英趕美、大躍進計畫也發生在這個時期的背景下。

但由於公社企業的生產過程有太多無效的投入、無用的產出，而當時的投資形式也多沒有採計貨幣計算，無法確切的了解實際的投入產出情況。由於農村大量勞動力投入工業化的運動，造成了當時的糧食產量銳減、人口增長率甚至呈現負成長；⁵⁷因此政策緊急轉向，要求農村勞動力主要為農業生產，社隊企業也因而沒落。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公社下的社隊企業成為中國大陸農村經濟的主要動力之一。由於沒有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相關統計數據，以一九七一年為例，社辦企業達到四萬七千四百家，約為一九六五年一萬二千家的三倍；而產值方面，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七一年分別為，五億三千萬元及二十六億六千萬元。⁵⁸足見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村集體經濟與集體工業的發展及貢獻。

但對於這個時期社隊企業的蓬勃發展的原因，各家有不同的解讀方向。⁵⁹第一種解釋認為，社隊企業是趁國家計畫癱瘓之際發展起來的；⁶⁰另一方面則由江蘇社隊企業發展模式，強調社隊企業發展應歸功於省委的領導。⁶¹第二種觀點則認為，知識青年的下鄉幫助了社隊企業的興起，⁶²不過此一說法後來也遭到反駁。

⁵⁶ 馬杰三等編，*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七至三八。

⁵⁷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資料顯示，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及一九六一年，分別為百分之一點七、百分之一、負百分之零點四六，以及百分之零點三八。

⁵⁸ 張毅，*中國鄉鎮企業：艱辛的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二一。

⁵⁹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頁七二至七四。

⁶⁰ 馬杰三等編，*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四六。

⁶¹ 吳祥鈞主編，*鄉蘇鄉鎮企業管理經驗千例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八九七。

⁶² 馬杰三等編，*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四六至四七；

⁶³第三種說法則認為，一九六〇年代被遣返回鄉的城鎮工人隊後來社隊企業有極大的貢獻。⁶⁴最後一種解釋則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營部門無法順利完成國家目標，因而提供必要的技術與設備給社隊企業，由社隊企業來協助生產任務，但這其實是特殊的案例。以上多種解釋，都無法全面性的說明社隊企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興盛的原因，但此時期的社隊企業確實為當時中國大陸經濟的重要貢獻者。

（二）鄉鎮企業的工業集體

中國大陸一九七八年的經濟改革實起於農村的改革，除了熟知的包產到戶之外，也是社隊企業體制轉變的重要時期。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間，中央政府正視了社隊企業為農村工業主體，因而明定了社隊企業的經營範圍、集體所有形式、產銷通路以及利潤稅收等細項。⁶⁵直到一九八四年初，正式改社隊企業為「鄉鎮企業」。⁶⁶

鄉鎮企業在八〇年代的快速成長中，也出現了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發展模式，學界的相關研究甚多。最著名的「溫州」模式，是以家庭工業為主，企業規模偏小，而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也著重在金錢與行政便利性上，可說是以

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一九六七 - 一九八四*（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頁一六二；David Zweig, "Rural Industry: Constraining the Leading Growth Sector in China's Economy," in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edited by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E. Sharpe, 1991), 420.

⁶³ 楊智元編，*知青檔案：一九六二 - 一九七九*（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此書收納許多知青回憶錄，卻都沒有提及與社隊企業相關的活動。

⁶⁴ 張毅，*中國鄉鎮企業：艱辛的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九〇），頁十九。

⁶⁵ 宋洪遠等編著，*改革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二八七至二九一。

⁶⁶ 一九八四年一月，農牧漁業部以及部黨組提出《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提及社隊企業的迅速發展，並建議更名為「鄉鎮企業」；同年三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更名為「鄉鎮企業」，並且明確規定鄉鎮企業包括社（鄉）隊（村）舉辦的企業、部分社員聯營的合作企業、其他形式的合作工業和個體企業。

金錢和地方官員的私利將這些企業與基層政權聯繫在一起。⁶⁷其二的「蘇南」模式，是以集體形式的企業為主，透過地方官員的直接干預管理，因此具有較為發達的產品家工業。第三種是珠江三角洲的「兩江」模式，由於地近香港，便發展出中外合資型的企業，實施進口替代、以出口加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地方政府也多站在與投資者共享管理權的地位。第四種則是「阜陽」模式，主要以戶辦、聯戶辦企業為主，多從事農副產品的加工，早期依賴市場調節及地方政府的引導，帶動傳統農業經濟的發展。⁶⁸另外，在四川盆地尚有一種經營模式，企業的資本主要依賴集體出賣耕地，並且透過地方幹部直接且深入的干預企業經營。⁶⁹

鄉鎮企業在本研究中的定義是指：鄉或村政權全部或部分所有的企業，或至少是在這兩類「基層政權」庇護下運作的鄉鎮企業。⁷⁰由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中，可以發現歷史、地理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企業形式，有集體所有、私人企業、合資企業等，鄉鎮企業至今已不再保有以往社隊企業的原始風貌。因此，在本研究中所指的鄉鎮企業囊括了所有形式的鄉鎮企業；而企業的成員除了村民、企業經營者之外，尚有地方政府官員與黨幹部，各類成員在鄉鎮企業中扮演的腳色也常常成為研究的標的。

鄉鎮企業的發展與農村改革息息相關，從一九六、七年代的農民運動開始，直到一九七八年開始鬆綁糧食價格、推行家庭生產責任制等；這些都顯示出了政府在農村的發展上，實際卻是被動的跟隨者。⁷¹農業改革釋放出大量勞

⁶⁷ 項光盈主編，*世紀之交看溫州：解讀溫州模式與溫州現象*（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四四至七四。

⁶⁸ 同前註，頁七五。

⁶⁹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頁二五五至二七七。

⁷⁰ 同前註，頁六。

⁷¹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動力，也提升了農村的工業化速度，再加上地方政府幹部的貪污腐化、還有農業的去集體化（decollectivization）及財政改革帶動的資金財務流動，⁷²鄉鎮企業便得以延續以往社隊企業的遺產而迅速成長，並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穩定因素，與農村主要成長動力。⁷³

第三節 指標應用的相關理論

本研究在指標的選用上，主要是由經濟現代化理論為切入點，採用可以、或已被量化的數據作為計算評估的資料。然而在指標與數據的解釋說明上，除了現代化理論之外，尚配合以下兩個理論來輔助、補充實證的論述，並有助於延伸至鄉鎮企業本身結構與地方政權關係的探討。

（一）二部門剩餘勞動力模型（Two-Sector Labor Surplus Model）

一般而言，開發中國家往往具有兩個部門，一是僅族糊口的農業部門，另一個是工業部門。並且擁有充沛的勞動力，但是資本卻極度缺乏，因此導致了雙重經濟（dualistic economy）的過剩勞動特性。過剩勞動落後經濟的特徵，就是作為主體的農業部門，遍佈著隱藏性的未充分就業勞動力（disguised underemployment）；因此，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重心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故藉著勞動力在兩個部門間重分配的作用，使農業與工業部門做最有效率的生產。⁷⁴

1996), 1-17.

⁷²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 14-15.

⁷³ 有關鄉鎮企業增長與貢獻的數據，請參看本文第一章部分。

⁷⁴ John C. Fei and Gustav Rains, *Development of Labor Surplus Economy* (Homewood, Ill.: Irwin, 1964).

此模型中，最重要的是剩餘勞動力的概念。由於農村中的勞動力過多，沒有足夠的可耕地分配，使得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出現水平區段，此段即稱為剩餘勞動力，⁷⁵農村中的勞動力越多，在技術固定、可耕地固定的情況下，只會變成剩餘勞動力區段延長。⁷⁶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開發中國家在工業化開始後，工業部門擴大、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工資提升的作用下，會吸引農村勞動力大批湧入城市工業化地區。⁷⁷

只是，中國大陸的情形又略有不同。一般開發中國家的工業與農業部門，很容易按照城市與鄉村來區分，中國大陸則不然；一九七八年後的中國大陸，除了城市屬於工業部門之外，農村並不完全屬於農業部門，鄉鎮企業即為農村中的工業部門代表，因此在操作二部門剩餘勞動力模型前，必須將模型先做修正（圖 2-1）。

鄉鎮企業的出現，則表示農村的勞動力需求增加，相對的則減少對城市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中國大陸在一九七八年之後，由於戶口制的鬆綁，城市中出現大量的盲流、農民工尋求更高的薪資所得，鄉鎮企業的興起則減緩了城市吸納這些外來勞工的壓力。西方國家在現代化及工業化過程中，並不注重鄉村地區的發展，因此城市中出現過多的外來勞動力，衍生出許多勞資糾紛，城市的公共衛生設施、住房環境、交通設備也因人口遽增而倍感不足。⁷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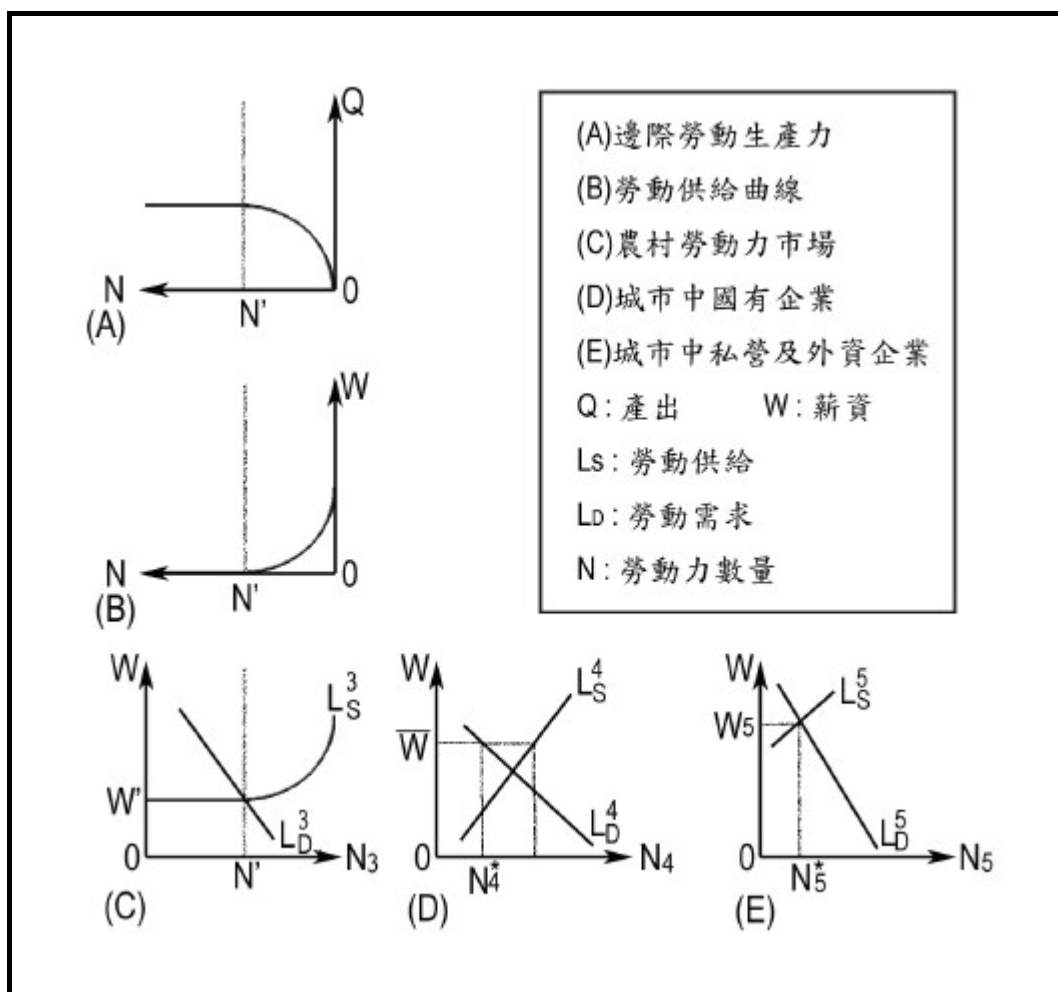
圖 2-1、二部門剩餘勞動力模型修正圖

⁷⁵ Malcolm Gillis, Dwight H. Perkins, Michael Roemer and Donald R. Sn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52-57.

⁷⁶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omewood, Ill.: Irwin, 1955)

⁷⁷ John R. Harris and Michael P. Todaro,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 1970): 126-142.

⁷⁸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7-1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鄉鎮企業之於中國大陸現代化過程，雖仍無法完全免除這些盲流與農民工，但就其雇用的勞動力人數，二〇〇二年為一億三千二百八十八萬，佔全國勞動力人數的百分之十八點零二，已是很大的比例。無可諱言的，鄉鎮企業在減低城市現代化問題上的重要功勞。

(二) 勞動力分配模式 (Labor Allocation Patterns)

而為了觀察這些農村勞動力的分佈情況，Fei-Ling Wang 的勞動力分配模式⁷⁹便是極佳的工具。在此模式下將勞動力區分為三種：

⁷⁹ Fei-Ling Wang, *From Family to Market: Labor Allo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2.

1.傳統的勞動力分配模式

主要是指以國家或政治體制為基礎，並且以個人勞動力為主的分配模式。而在此模式下又可區別為兩種。第一，傳統社會型的勞動力分配，以家庭及社區為基礎，勞力組織呈現明顯個人化，但對家庭的依賴很深。第二，傳統政治型勞動力分配，為特定政治制度下的奴隸體系。

2.權威式的勞動力分配模式

主要由政府對國家所有勞動力，採取政治性及強制性的工作分配管理，國家或政黨取代了市場機制，使得勞動力在經濟、社會、政治層面對國家或政黨極度依賴。基本上，這種勞動力分配模式，也是社會主義體制結構的要素。

3.以個人意志及勞工自由流動為主的「勞動力市場」

在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中，勞工的工作能力被視為商品，每一位勞工均享有自由意志，可以跨地區、跨行業，甚至跨國界進行勞動力流動，並且可經由供需原則決定勞動力的價格。

檢視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的勞動力市場，最明顯的是「勞動力市場」的出現：戶口制鬆綁後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尤其鄉村人口流入城市中的三資企業工作是最明顯的例子。⁸⁰其次，城市中的國有企業並沒有因三資企業的出現而消失，它仍然是權威是勞動力分配模式的最佳典範。經濟改革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商業型態的出現——個體戶，這是一種以家庭為基礎的勞動力分配模式。最後，在農村中的社隊企業，隨著開放的腳步，轉變為仍保持集體所有、但可自行決定經濟行為的鄉鎮企業，這種延續人民公社社區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

⁸⁰ Dorothy J. Solinger, "The Impac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n the Danwei: Shifts in the Patterns of Labor Mobility Control and Entitlement Provision," in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Xiaobo Lu and Elizabeth J. Perry (London: M.E. Sharpe, 1997), 195-222.

對於農村經濟的發展上有極大的貢獻。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下，本研究選擇了四種模式來觀察一九四九年後至今，勞動力分配模式的持續與轉變，分別是：傳統以家庭為主的勞動力模式、社區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權威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以及勞動力市場。

鄉鎮企業在中國大陸發展相當快速，主要特點除了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之外，鄉鎮企業所雇用的勞工是以簽定合同方式管理的，同時也具有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特色。另外一方面，鄉鎮企業中特別是個體企業發展很快，其所佔數額比重不斷上升。⁸¹鄉鎮企業雖承續人民公社社區型勞動力分配的性質，但實際上也包含了勞動力市場，以及其中個體企業的傳統家庭式勞動力分配模式。嚴格來說鄉鎮企業是一種新的、混和型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

最後，有關勞動力分配模式的轉變方面，改革之前城市地區是以權威式勞動力分配模式為主，農村則是以集體化的社區勞動力分配為主。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權威式的勞動力分配模式相對削弱。在一九九五年，鄉鎮企業雇用了一億二千萬勞工，而權威式勞動力分配模式，則雇用了一億零六百萬員。此後，鄉鎮企業所雇用的從業人員，在全中國大陸以高於國有企業，成為最主要的一種勞動力分配模式。⁸²

第四節 鄉鎮企業與基層政權相關文獻

由於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基層政權的關係，並不單純的是企業與政府的腳色互動；鄉鎮企業的體制結構中，除了經營者與村民之外，地方政府官員或是黨幹部也多少涉入企業活動中。因此，在整理鄉鎮企業相關的文獻之前，必須

⁸¹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農業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⁸²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四二八至四三三。

先釐清這些理論的中心觀念；故在本節中，將利用國家與社會的概念來引導出相關的理論與文獻。

（一）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方法尚，學者們通常有兩種切入方向：一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state-centered perspective），著重在國家引導社會變遷的過程；另一種觀點則著重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 perspective），認為社會因素會制約及影響到國家的行為。⁸³但以上兩種觀點往往形成國家與社會兩者概念上的對立，而後也衍生出許多著重在國家與社會兩者互動的理論模式，以下便作簡單介紹。

1. 集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此理論強調國家的角色，試圖將政治上的獨占與壟斷極大化，並且滲透到各個角落，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根據集權主義採取的不同方式，又可以細分為政治的集權主義與經濟的集權主義。在集權主義的特徵方面：國家（執政黨）以意識形態信仰為前提，藉而尋求民眾心理情感上及政治目標上的認同，對群眾的號召動員並不是物質利益的誘惑，而是心理需求的驅使；另外，在集權主義社會中，人際關係是完全被隔絕的，認為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主要是要確保集權主義國家「群眾動員」的權利、防止民眾效忠執政政權以外的對象。⁸⁴

2. 多元主義（pluralism）

強調政治的本質是：人們藉由選舉競爭以及利益團體的活動，並且經由各種不同的團體彼此競爭、妥協、互動的模式。社會存在著不同、相互競爭的利

⁸³ 同前註，頁八。

⁸⁴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

益團體，他們彼此相互影響是民主政治動態平衡的基礎；同時，公共政策也因此朝向令人滿意的方向發展。多元主義的模型裡，權力的分佈不是金字塔般的層級結構；相反地，它是一種多頭競爭的局面。各個不同的利益團體，例如商業工會、勞工組織、道德團體、學生、女性團體、教會等總是不斷地互動、協商、相互牽制。政府則扮演協調、仲裁等中介角色，處理各團體間的紛爭時，政府要謹守中立，不要捲入利益爭奪的糾紛。當然，有時候政府的某個單位為了爭奪有限資源，亦可能成為一個利益團體，參與權力競逐的過程。民主國家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各團體競逐、妥協、互動的結果；此種以「利益團體」為主軸的開放競爭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是西方社會穩定、成熟的表徵，人民對政府效忠、服從的重要原因。⁸⁵

3. 組合主義 (corporatism)

在組合主義的理想形式中，國家被界定成代表著公眾利益，並且透過授權給某些利益團體來達成公眾利益；這裡的組合主義並不是反民主的，而是國家領導著所理解的公眾利益，並不一定要詢問選民的意見。Philippe C. Schmitter 將組合主義界定為：「一種利益匯集的系統，其構成單位被組織成少數獨佔性、強迫性、無競爭性、層級分明而又功能分化的領域，經由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授權後，它們在各自的領域內獲有完全的代表性壟斷，而國家機關則對它們的選任領導、表達需要和支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組合主義著重在解釋國家和團體之間的關係、強調彼此之間的上下關係，國家與團體之間是互動的、協調的、互惠的、合作的，並且有法定的、正式的垂直溝通管道，國家賦予社會團體所應享有的權利與合法地位，並且也認可這些團體的自主性。⁸⁶

以上三種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模式各不相同，集權主義主張的概念是由上而

⁸⁵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3-39.

⁸⁶ *Ibid.*, 39-42, and Douglas A. Chalmers,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dited by Howard J. Wiard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56-79.

下命令式的服從；多元主義焦點放在利益團體間的水平競爭；而組合主義則著墨於國家與利益團體間的互動模式。在理論的應用上，國家幾乎不可能全方位的以意識形態來控制及動員群眾、更難以隔絕人與人之間的人際網絡，集權主義過度簡化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多元主義的基礎是以西方民主價值觀為背景，認為民主是一種市場機制，而選民是消費者、政客是企業家，⁸⁷而這套論述顯然並不符合中國大陸的狀況；因此，組合主義似乎是比較有可能的發展方向。

而根據 Philippe C. Schmitter 的看法，中國大陸的國家社會關係比較傾向「國家的組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而非「社會的組合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⁸⁸國家的組合主義，比較強調國家層面對社會團體利益的提供，而非著重在團體利益的表現；⁸⁹並且一黨專政其實對於政治發展以及經濟的現代化上，具有雙重的角色。⁹⁰

(二) 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係

在前項討論中，國家的組合主義確實比較適用在中國大陸的國家社會關係上，但是卻不適合用來解釋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由於組合主義是政府授權給企業或利益團體，而該被授權者則可以等同視為國家的代理人，從事或執行某個範疇的事務，組合主義應比較適合運用在國有企業上；而在鄉鎮企業中卻不然，先不論有多種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地方政府不全然代表國家

⁸⁷ C.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9.

⁸⁸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The New Corporatism*, edited by Fred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4), 99-105.

⁸⁹ 原文應為：... gives greater weight to "interest-licensing" than to "interest-representing."

⁹⁰ Peter Nan-Shong Lee,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Corpora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Brantly Womac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5-156.

的角色、而鄉鎮企業比起國有企業也享有更多的自主決策空間。因此，以下便針對，各方學者提出詮釋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關係的理論分項整理。⁹¹

1.財政改革與產權私有化誘因論

這個論點的主要代表人為 Jean C. Oi 與 Andrew G. Walder 兩位學者，而以 Oi 的地方政府組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最為著名。由於中國大陸一九八〇年代的財政改革，使地方政府上下層級關係重新建構：財政改革提供了地方政府新的財政誘因，並且越基層的政府層級其生產誘因就越強烈。財政改革的主要內容：企業依據固定的稅率上繳賦稅⁹²，下級政府再按契約合同中的固定稅收額度上繳至上級。因此企業與各級政府可以保留上繳額度之外的利潤與稅收，⁹²Walder 便指出政府官員的私人誘因（private incentives）是促成中國大陸工業化的動力。

中國大陸農村地區的企業發展，主要在於財政改革建立起了企業創造利潤與政府官員個人收入之間的關聯；因而上下層級的地方政府可以被視為公司企業的網絡關係，政府官員的行為就像企業家一般。然而，Oi 仍然堅持鄉鎮企業是一種真正的政府所有的體制，因此無論村、鄉鎮、縣政府的層級，政府官員在農村工業發展上都扮演著直接的角色，不管是集體所有制或是私有制；⁹³而這些官員涉入企業事務的做法，其實並不危害到企業的競爭力，反而有助於企業的發展。

2.利潤分享與產權非正式私有制

⁹¹ 分類與內容參考：陳淳斌，「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發展與地方政府職能：回顧學界對相關理論的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四卷第七期（民國九十年七月）：頁八四至九二。

⁹²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7-57.

⁹³ Jean C.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1138.

主要代表學者有 Victor Nee、Yusheng Peng、Barry Naughton、North 以及 Weingas 等人。他們共同的論點都強調，產權私有制和市場競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 Jean C. Oi的看法不同，中國大陸農村的集體經濟被認為是一種實質的私有制、半私有制，或是一種混合的所有權形式（hybrid forms of ownership），這種公有制中隱含著非正式或隱匿性私有制的企業形式，才是促進農村工業化發展的主要原因。並認為中國大陸的漸進式改革的成就是在於市場競爭的私有制企業穩定的增加，而最具生產力的地區則是在市場機制運作較為完全的地方，故農村集體企業比起城市中的國有企業更具生產力。

後來 Victor Nee 和 Sijin Su 又提出「利潤分享」作為理論的補充。由於財政改革後，鄉鎮企業可以和地方政府根據契約分享利潤，而雙方也透過這種機制重新確認彼此的權責範圍；地方政府在利潤分享的配置下，會賦予企業較大的財政自主權及經濟盈餘的分配權。利潤分享因而開啟了非正式私有化的途徑，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減少、提升企業自主性，這種制度使得地方政府與企業家們都努力尋求較高的生產效率。

3.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

大部分的學者都同意，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政策是農村經濟成長的主要關鍵；Jean C. Oi的地方政府組合主義，使許多學者開始重視政治結構的經濟角色；Victor Nee 和 Sijin Su 則提醒，中國大陸各地存在著相當的差異性及不同的統治結構，社會制度在經濟成長的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被重視。

Nan Lin 並以大邱莊為例，提出「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local market socialism）的觀點，除了總體層面的政策之外、個體層面的地方制度也同等重要：大邱莊就像一個公司，經濟主要依賴在家族的社會網絡上，權威領導強調的是個人魅力，並透過傳統文化力量的動員來追求社區的經濟發展。另外一個學者 Chih Jou Chen 則針對「晉江模式」的「集體為名、私營為體、親友合夥、地方

協力」的經濟組織模式做調查：大多數私人企業均以集體登記，主要是為因應國家政策所做的變通，但地方官員對企業的營運介入極少；這也間接支持了 Victor Nee 的非正式私有制與產權明確化在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⁹⁴

無論是「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或是「晉江模式」皆強調地方性社會制度及社會資源在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企業建構在宗族的傳統網絡上，強化了社區認同的與集體行動的力量，並表現的企業的經濟活動上。

4. 合作文化論與合作式的集體行動論

傳統的產權理論 (property rights theory) 主張明確的產權界定才能提升所有權人的投資行為。但在鄉鎮企業上並不然，因而 Martin L. Weitzman 和 Chenggang Xu 認為產權理論忽略了團體內部有自行解決衝突的能力，一個社會或團體如果充滿「合作性文化」，則即使該社會沒有明確的契約或產權，在互信的環境之下也能經由重複的互動產生合作性文化。

Xiaolin Pei 針對合作文化進一步提出「合作的聯合行動論」，村民的合作精神並非建立在模糊的文化上，而是村內的某種特殊因素上；中國大陸農村人地狹人稠，農業的產出無法滿足人口需求，因而轉向發展工業，激勵了村民合作性的聯合行動 (joint action)⁹⁵ 來發展鄉鎮企業。Robert Wade 認為，出現團體的合作式行動主要原因是村民對於集體行動利益的預期；而預期的利益並不一定是金錢，有可能是工作權、社會保障等。Pei 和 Wade 的論點更著重在「理性選擇」的基礎上，村民的集體行為與合作精神建立在可預期的利益上，而不是抽象的道德經濟上。

⁹⁴ 晉江市的村辦企業比較貼近於私有經濟為主體的發展模式，與 Victor Nee 的非正式私有化理論稍有不同，不過兩者所描述的企業，均點出私有經濟及明確的產權化在經濟上的重要性。

⁹⁵ 聯合行動 (joint action) 是個別行動導向，而不是集體行動導向；聯合行動與集體行動 (collection action) 是稍有不同的。

第五節 小結

在本章中，依序介紹了現代化理論的概念與範疇、鄉鎮企業的沿革、還有實証指標分析時可利用的理論，以及最後有關於鄉鎮企業與基層政權的各家研究。

各個領域的現代化理論不可避免的都肯定：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經濟發展狀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並且與政治、文化、社會的現代化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何本研究要由經濟的現代化來著手的原因之一。其次，中國大陸從一九七八年的經濟改革至今，經濟體制、市場結構還未發展完全，鄧小平推動的現代化「三步走」策略也是以經濟發展為先。因此，由可獲得的統計數據、容易操作評量的經濟面來著手，應該是從事中國大陸現代化研究可行的方式。

鄉鎮企業的成功，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如同鄉鎮企業的組織形式、所有權、經營模式，也並非在經濟改革之後才重新建立起來；經濟改革之前農村裡的人民公社、社隊企業，遞移了許多改革前的資源或是制度到鄉鎮企業上。鄉鎮企業的蓬勃固然是受到經濟改革的鼓舞，卻也不能忽略掉這些歷史留下來有形或無形的資產。因而，本研究雖旨在觀察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模式，以及鄉鎮企業的角色，仍然必須對過往的制度沿革有相當了解。

本研究除了關切鄉鎮企業對於總體經濟、農村方面的貢獻程度外，也從個體層面來延伸探討鄉鎮企業在政治、社會方面的地位。因此，在本章第四節中介紹了許多有關鄉鎮企業與基層政權的理論，無論是 Jean C. Oi 的地方政府組合主義、非正式私有制的解釋，或者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合作是集體行動論，各個論述都無法將兩者之間的關係做全面性的解釋，卻也可以引導本研究從不

同面向來觀察，發現鄉鎮企業在經濟現代化之外其他方面的現代化發展模式。

第三章 經濟現代化分析

觀察經濟現代化可以分為許多面向，在本研究中選定了四種觀察指標，分別是工業化的水準、國內企業產權結構的轉變、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變化，以及內生性的經濟成長因素。

工業化可以直接揭露出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狀態，資料也最容易取得；而有關企業產權結構的部分，可以藉產權結構的轉變來觀察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顯示企業的生產效率；除了經濟成長與效率的問題之外，城鄉二元經濟是否產生轉變，則用來觀察經濟成長過程中是否出現經濟體的整合情況；最後的內生性經濟成長因素，近來被視為重要的經濟發展課題，一國能否長期的持續性發展、以及是否能成功的提升產業體質，便可由此觀察。

以下各段即分別以四種觀察指標來闡述，並且以中國大陸全國的發展狀況與鄉鎮企業的成長相互比較。

第一節 工業化水準

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以來，經濟方面的成就尤其受國際注目。與其他前共產國家相比較，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時間早於其他國家約十年左右，但在政治上仍維持共產黨專政的體制，而其「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雖不能說是完美的經濟轉型模式，卻也因創造了高度的經濟成長維持了政治上的穩定。⁹⁶本節中各段便就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就業人數，以及三級產業之間，尤其是工業部門的相互增長、削減的關係，並且對照鄉鎮企業的產業成

⁹⁶ Gérard Rolan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0), 15.

長結構，由此分析鄉鎮企業對於中國大陸工業化的貢獻程度。

（一）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

就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而言，一九七八年僅有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元，至二〇〇二年底已超過十兆元，二十五年來總產值的成長幅度將近三十倍之多。⁹⁷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的年增加值也由一九七八年的二百零八億元，成長至二〇〇二年底的三兆二千餘億元，成長幅度超過一百五十倍以上。而鄉鎮企業的年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快速增加，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點七五，提升至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三十點九一；以上足見鄉鎮企業的成長對於中國大陸整體經濟成長的影響力越來越高（表 3-1）。

表 3-1、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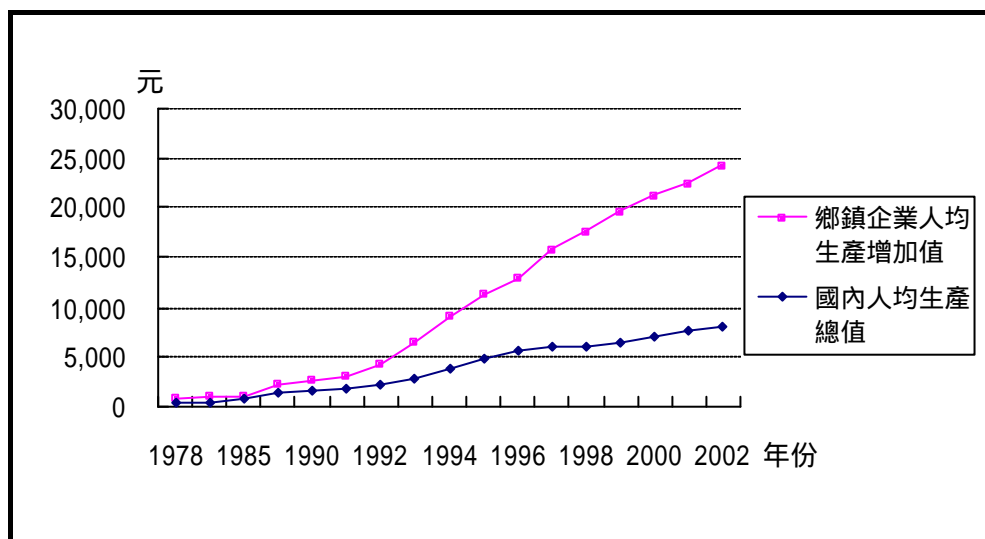
年份	國內生產總值 (億元)	鄉鎮企業增加 值(億元)	鄉鎮企業增加 值佔國內生產 總值比重(%)	國內生產總值 成長率(%)	鄉鎮企業增加 值成長率(%)
1978	3624.1	208.32	5.75		
1980	4517.8	285.31	6.32		
1985	8964.4	772.31	8.62		
1989	16909.2	2083.16	12.32		
1990	18547.9	2504.32	13.50	9.69	20.22
1991	21617.8	2972.15	13.75	16.55	18.68
1992	26638.1	4485.34	16.84	23.22	50.91
1993	34634.4	8006.83	23.12	30.02	78.51
1994	46759.4	10928.03	23.37	35.01	36.48
1995	58478.1	14595.23	24.96	25.06	33.56
1996	67884.6	17659.3	26.01	16.09	20.99
1997	74462.6	20740.32	27.85	9.69	17.45
1998	78345.2	22186.46	28.32	5.21	6.97
1999	82067.5	24882.56	30.32	4.75	12.15
2000	89468.1	27156.23	30.35	9.02	9.14
2001	97314.8	29356.39	30.17	8.77	8.10
2002	104790.6	32385.8	30.91	7.68	10.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⁹⁷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資料皆使用名目數據，幣值為人民幣，不將物價膨脹等因素計入平減。

在觀察經濟成長的指標方面，除了國內生產總值之外，尚會再就國內人均生產總值來分析，以排除掉勞動力數量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更能顯示單位勞動力的產值提升與否。中國大陸的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七十九元，逐年成長至二〇〇二年達到八千一百八十四元，此數值也翻漲了近二十二倍之多。而在國內生產總值佔有越來越高比重的鄉鎮企業，其企業人均生產增加值由一九七八年的七百三十七元，至二〇〇二年達到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三元，鄉鎮企業人均生產增加值的成長幅度及額度遠遠高於全國平均值（圖 3-1）。

圖 3-1、中國大陸國內與鄉鎮企業人均生產總值（增加值）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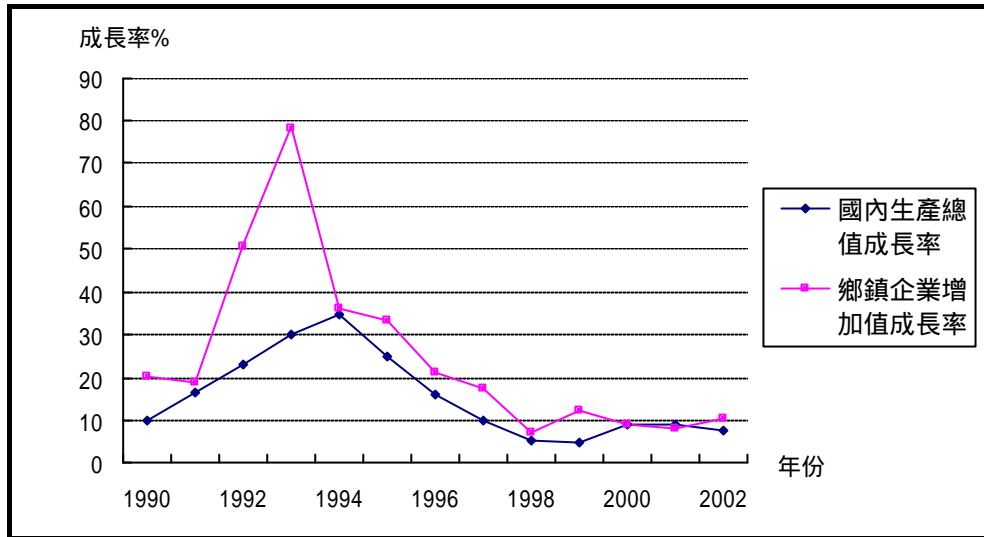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仔細觀察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的成長率，可以發現鄉鎮企業增加值大多以高於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的速度快速成長；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除了鄉鎮企業之外，包含國有企業、私營與三資企業等，而在兩方成長率差距的背後，所隱含的便是「企業經濟效益」高低的問題。因此，由鄉鎮企業人均生產增加值的高額度，以及企業增加值的較高成長率，可以假定鄉鎮企業在中國大陸各企業部門中，是屬於較高經濟效益的一群，這方面的探討將

在後段詳加分析（圖 3-2）。

圖 3-2、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成長率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二）三級產業的消長

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家計單位的收入來源、以及國家的生產總值估算，多是屬於農林漁牧等的第一級產業，生產要素完全依賴勞動力與土地。在這個階段中，農業用具、畜牧方式、水利建設、人丁多寡便是提升產量極為重要的因素；在以第一級產業為主的社會中，也存在著極小比例的輕工業與服務業。隨著資本的累積、技術擴散，機械的力量逐漸取代人力，得以減少投入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並且轉而發展二、三級產業，因而伴隨經濟成長的過程，會產生產業結構的消長轉變。⁹⁸

中國原本就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並且具有高度人口集中、可耕地狹小的特色。在人民公社時期開始推動農業機械化運動，不過由於當時的集體所有體制，再加上城鄉以戶口制的分隔，農業機械化自然無法順利的將多餘的勞動力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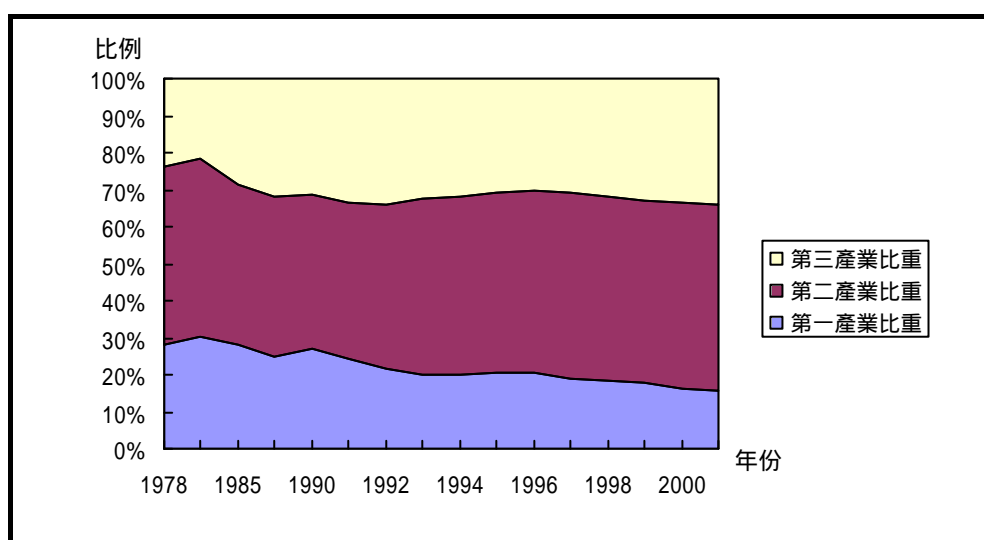
⁹⁸ Malcolm Gillis, Dwight H. Perkins, Michael Romer, and Donald R. S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47-51.

二、三級產業的生產要素，當然也形成了農業生產的無效率。

1. 產業產值與增加值

改革開放後，農村地區落實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提升了農民生產的誘因，農業產量自然提升，同時也釋放出許多勞動力。並且外國投資、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的興起，誘使農村中的勞動力轉向第二級或第三級產業的工作。以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大陸為例，當時第一產業產值比重佔國內生產總值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一，直到二〇〇二年資料顯示，比重下滑到百分之十五點三八；相對的，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則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一點九，增長到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六二（圖 3-3、表 3-2）。

圖 3-3、中國大陸三級產業比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但第一產業的產值並沒有隨著產業比重縮減而下滑，反而從改革之初的一千零十八億元，以近十六倍的比例翻漲為一兆六千一百十七億元。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產值更達到八兆八千六百餘億，較一九七八年成長了三十餘倍。在這些數字背後則顯示出，產業結構的重新配置也牽動投入資源的比重，使產出要

素的利用率提升，⁹⁹並且市場漸趨自由化的結果，創造了三級產業產值共同成長的收穫（表 3-2）。

表 3-2、中國大陸三級產業產值比重趨勢表

年份	國內生產								
	總值 (億元)	第一產業	第一產業 比重 (%)	第二產業	第二產業 比重 (%)	*工業	*工業比 重 (%)	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 比重 (%)
1978	3624.1	1018.4	28.10	1745.2	48.16	1607	44.34	860.5	23.74
1980	4517.8	1359.4	30.09	2192.0	48.52	1996.5	44.19	966.4	21.39
1985	8964.4	2541.6	28.35	3866.6	43.13	3448.7	38.47	2556.2	28.52
1989	16909.2	4228	25.00	7278.0	43.04	6484	38.35	5403.2	31.95
1990	18547.9	5017	27.05	7717.4	41.61	6858.0	36.97	5813.5	31.34
1991	21617.8	5288.6	24.46	9102.2	42.11	8087.1	37.41	7227.0	33.43
1992	26638.1	5800	21.77	11699.5	43.92	10284.5	38.61	9138.6	34.31
1993	34634.4	6882.1	19.87	16428.5	47.43	14143.8	40.84	11323.8	32.70
1994	46759.4	9457.2	20.23	22372.2	47.85	19359.6	41.40	14930.0	31.93
1995	58478.1	11993	20.51	28537.9	48.80	24718.3	42.27	17947.2	30.69
1996	67884.6	13844.2	20.39	33612.9	49.51	29082.6	42.84	20427.5	30.09
1997	74462.6	14211.2	19.09	37222.7	49.99	32412.1	43.53	23028.7	30.93
1998	78345.2	14552.4	18.57	38619.3	49.29	33387.9	42.62	25173.5	32.13
1999	82067.5	14472	17.63	40557.8	49.42	35087.2	42.75	27037.7	32.95
2000	89468.1	14628.2	16.35	44935.3	50.22	39047.3	43.64	29904.6	33.42
2001	97314.8	15411.8	15.84	48750.0	50.10	42374.6	43.54	33153.0	34.07
2002	104790.6	16117.3	15.38	53540.7	51.09	46535.7	44.41	35132.6	33.53

*工業產值與工業比重屬於第二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鄉鎮企業的增加值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點九一，而鄉鎮企業的經營範圍也包含三級產業。與中國大陸全國的產業發展趨勢不同的是，鄉鎮企業自發展之初，第一產業所佔總增加值的比例就不高，僅有百分之七點三八，並且更逐年下降至二二年的百分之一點零六；而第二級、第三級產業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九四。這主要是因為鄉鎮企業發源於農村地區，在改革開放前，第一級產業原本就是農村經濟的主體，故鄉鎮企業的發展範疇便往二、三

⁹⁹ The Harrod-Domar Model 為研究資本產出率的模型，重要著作：Roy F. Harrod,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1939): 14-33, and Evsey Domar, "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Econometrica* (1946): 137-147, and "Expansion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7 (1947): 34-55.

級產業擴張，吸納農村地區的剩餘勞動力。也可以說，鄉鎮企業的興起，為農村地區帶來第一級產業以外的經濟形式，成為三級產業共存的態樣（表 3-3）。

表 3-3、鄉鎮企業三級產業增加值比重趨勢表

年份	鄉鎮企業增								
	加值(億元)	第一產業	第一產業 比重 (%)	第二產業	第二產業 比重 (%)	*工業	*工業比 重 (%)	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 比重 (%)
1978	208.32	15.37	7.38	172.12	82.62	159.6	76.59	20.83	10.00
1980	285.31	17.41	6.10	242.68	85.06	218.18	76.47	25.23	8.84
1985	772.31	18.62	2.41	614	79.50	518.08	67.08	139.69	18.09
1989	2083.16	24.39	1.17	1767.84	84.86	1562.17	74.99	290.93	13.97
1990	2504.32	36.72	1.47	2095.93	83.69	1855.4	74.09	371.66	14.84
1991	2972.15	44.58	1.50	2500.59	84.13	2227.15	74.93	426.98	14.37
1992	4485.34	56.48	1.26	3780.32	84.28	3350.14	74.69	648.54	14.46
1993	8006.83	103.03	1.29	6222.64	77.72	5935.74	74.13	1681.17	21.00
1994	10928.03	207.63	1.90	9048.41	82.80	8086.74	74.00	1671.99	15.30
1995	14595.23	279.82	1.92	12085.4	82.80	10804.04	74.02	2230.01	15.28
1996	17659.3	344.69	1.95	14064.77	79.65	12627.66	71.51	3249.85	18.40
1997	20740.32	321.81	1.55	16182.93	78.03	14517.99	70.00	4235.59	20.42
1998	22186.46	346.16	1.56	17311.3	78.03	15530.27	70.00	4529	20.41
1999	24882.56	338.65	1.36	19318.73	77.64	17374.11	69.82	5225.18	21.00
2000	27156.23	313.85	1.16	20913.2	77.01	18812.41	69.27	5929.17	21.83
2001	29356.39	286.62	0.98	22508.18	76.67	20314.66	69.20	6561.58	22.35
2002	32385.8	341.77	1.06	25060.81	77.38	22773.03	70.32	6983.22	21.56

*工業產值與工業比重屬於第二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而就鄉鎮企業各產業對全國三級產業的貢獻程度來看，則可以發現到鄉鎮企業第一級產業佔全國第一級產業的比重僅僅維持在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左右，波動幅度很小；而其第三產業則佔全國第三級產業百分之十九點八八，自一九七八年至今，呈現微幅的上升趨勢。三級產業之中，最值得深入觀察的則是鄉鎮企業的第二級產業佔全國二級產業的產值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七十二億元佔百分之九點八六，快速增加到二〇〇二年的二兆五千餘億元佔百分之四十六點八一；無論是產業增加值或是佔全國比重，都遠遠超過第一級與第二級產業的重要性（表 3-4）。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第二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可以視為由靠天地吃飯、勞動力賺取的第一產業，轉為以機械代替、資本及勞動力配合生產的產業。鄉鎮企業的二級產業佔全國二級產業將近一半的產值，高於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許多，雖不能說鄉鎮企業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但在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則不能沒有鄉鎮企業的推動，其貢獻並不只在於產值的部分，更在於生產要素的跨產業移轉。

表 3-4、鄉鎮企業增加值佔全國三級產業比重

年份	鄉鎮企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 (%)	鄉鎮企業			
		第一產業比重	第二產業比重	*工業比重	第三產業比重
1978	5.75	1.51	9.86	9.93	2.42
1980	6.32	1.28	11.07	10.93	2.61
1985	8.62	0.73	15.88	15.02	5.46
1989	12.32	0.58	24.29	24.09	5.38
1990	13.50	0.73	27.16	27.05	6.39
1991	13.75	0.84	27.47	27.54	5.91
1992	16.84	0.97	32.31	32.57	7.10
1993	23.12	1.50	37.88	41.97	14.85
1994	23.37	2.20	40.44	41.77	11.20
1995	24.96	2.33	42.35	43.71	12.43
1996	26.01	2.49	41.84	43.42	15.91
1997	27.85	2.26	43.48	44.79	18.39
1998	28.32	2.38	44.83	46.51	17.99
1999	30.32	2.34	47.63	49.52	19.33
2000	30.35	2.15	46.54	48.18	19.83
2001	30.17	1.86	46.17	47.94	19.79
2002	30.91	2.12	46.81	48.94	19.88

*工業產值與工業比重屬於第二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2. 產業從業人員

勞動力充沛是中國大陸生產要素市場的主要特徵，全國的從業人員高達七億三千七百四十萬人。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比例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七十點五三，滑落至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五十；而同時期的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

則由百分之十七點三，微幅增長至百分之二十一點四；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例增長幅度更大，由百分之十二點一八，達到百分之二十八點六（表 3-5）。

表 3-5、中國大陸三級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趨勢表

年份	全國從業人員（萬人）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第一產業	第一產業比例（%）	第二產業	第二產業比例（%）	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比例（%）
1978	40152	28318	70.53	6945	17.30	4890	12.18
1980	42361	29122	68.75	7707	18.19	5532	13.06
1985	49873	31130	62.42	10384	20.82	8359	16.76
1989	55329	33225	60.05	11976	21.65	10129	18.31
1990	64749	38914	60.10	13856	21.40	11979	18.50
1991	65491	39098	59.70	14015	21.40	12378	18.90
1992	66152	38699	58.50	14355	21.70	13098	19.80
1993	66808	37680	56.40	14965	22.40	14163	21.20
1994	67455	36628	54.30	15312	22.70	15515	23.00
1995	68065	35530	52.20	15655	23.00	16880	24.80
1996	68950	34820	50.50	16203	23.50	17927	26.00
1997	69820	34840	49.90	16547	23.70	18432	26.40
1998	70637	35177	49.80	16600	23.50	18860	26.70
1999	71394	35768	50.10	16421	23.00	19205	26.90
2000	72085	36043	50.00	16219	22.50	19823	27.50
2001	73025	36513	50.00	16284	22.30	20228	27.70
2002	73740	36870	50.00	15780	21.40	21090	28.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同時與上段的產業比重相比較（表 3-2），第一產業擁有全國半數的從業人員，但其產值比重僅佔全國的百分之十五點三八；而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員比例僅有百分之十七點三，卻創造出百分之五十一點零九的全國生產總值；第三級產業也以佔全國百分之二十八點六的從業人員數，創造出佔全國百分之三十三點五三的產值。雖然勞動力並不是產出的唯一投入要素，但以上數據則明顯的傳達出，第一級產業的勞動力投入與產出極不相稱的情形！相對於第二級產業的表現，除了顯示出第一級產業的生產效率有待改進之外，也可觀察到一級產業的從業人員還可以繼續移轉到第二、第三級產業，提供更多的勞動力投入，

從事較高效率的工作。

而在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比例的部分，自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二年期間，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比例由百分之二十一點五三，縮小到百分之一點五五；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員比例沒有明顯的變動，由百分之六十九點六九到百分之六十八點六九，期間最高達到百分之七十五點零三；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例增長明顯，由百分之八點七八增長到百分之二十九點七六（表 3-6）。

表 3-6、鄉鎮企業三級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趨勢表

年份	鄉鎮企業從業 人員(萬人)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工業	*工業比 例(%)	第三產業	
		第一產業 比例(%)	第二產業 比例(%)	第一產業 比例(%)	第二產業 比例(%)			第三產業 比例(%)	第三產業 比例(%)
1978	2826.56	608.42	21.53	1969.97	69.69	1734.36	61.36	248.16	8.78
1980	2999.68	456.07	15.20	2276.97	75.91	1942.30	64.75	266.63	8.89
1985	6979.00	252.38	3.62	5150.50	73.80	4103.65	58.80	1576.11	22.58
1989	9366.78	239.30	2.55	7027.83	75.03	5624.10	60.04	2099.65	22.42
1990	9264.75	236.06	2.55	6918.54	74.68	5571.69	60.14	2110.15	22.78
1991	9613.63	243.17	2.53	7200.29	74.90	742.67	7.73	2170.17	22.57
1992	10624.71	261.82	2.46	7888.82	74.25	6336.40	59.64	2474.07	23.29
1993	12345.31	285.36	2.31	9086.49	73.60	7259.56	58.80	2973.46	24.09
1994	12017.47	260.46	2.17	8583.55	71.43	6961.51	57.93	3173.46	26.41
1995	12862.06	313.52	2.44	9497.24	73.84	7564.72	58.81	3051.30	23.72
1996	13508.29	336.00	2.49	9808.98	72.61	7860.14	58.19	3363.31	24.90
1997	13050.42	276.96	2.12	9335.58	71.53	7634.87	58.50	3437.88	26.34
1998	12536.55	273.91	2.18	8967.98	71.53	7334.23	58.50	3294.65	26.28
1999	12704.09	247.38	1.95	9008.78	70.91	7395.32	58.21	3447.93	27.14
2000	12819.57	222.04	1.73	9047.82	70.58	7466.73	58.24	3549.71	27.69
2001	13085.58	200.03	1.53	9179.52	70.15	7615.11	58.19	3706.03	28.32
2002	13287.71	205.37	1.55	9127.98	68.69	7667.61	57.70	3954.36	29.76

*工業從業人員與工業從業人員比例屬於第二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鄉鎮企業年鑒

並且與鄉鎮企業的產業增加值相對照（表 3-3），鄉鎮企業第一產業增加值占總增加值的百分之一點零六，第二級產業為百分之七十七點三八，第三級產業則為百分之二十一點五六；大致上與鄉鎮企業三級產業從業人員的比例相

符，沒有較大的差距出現。這些顯示了鄉鎮企業的三級產業結構的發展，與全國結構相比是較有生產效率的，較無要素投入的浪費現象。

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佔全國從業人員比例，自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七點零四，逐年升高至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十八點零二；並且企業總增加值佔有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點九一，再度印證鄉鎮企業勞動力投入產出效率較高的論點。另外，在吸納全國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上，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二年期間，鄉鎮企業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數量，佔全國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的百分之二點一五到百分之零點五六；而鄉鎮企業第二級產業則由百分之二十八點三七成長到百分之五十七點八五，吸納了全國過半的二級產業就業人數！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佔全國比例，則是從百分之五點零七，爬升至百分之十八點七五（表 3-7）。

表 3-7、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佔全國三級產業比例

年份	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佔全國比例（%）	鄉鎮企業		
		第一產業比例	第二產業比例	第三產業比例
1978	7.04	2.15	28.37	5.07
1980	7.08	1.57	29.54	4.82
1985	13.99	0.81	49.60	18.86
1989	16.93	0.72	58.68	20.73
1990	14.31	0.61	49.93	17.62
1991	14.68	0.62	51.38	17.53
1992	16.06	0.68	54.96	18.89
1993	18.48	0.76	60.72	20.99
1994	17.82	0.71	56.06	20.45
1995	18.90	0.88	60.67	18.08
1996	19.59	0.96	60.54	18.76
1997	18.69	0.79	56.42	18.65
1998	17.75	0.78	54.02	17.47
1999	17.79	0.69	54.86	17.95
2000	17.78	0.62	55.79	17.91
2001	17.92	0.55	56.37	18.32
2002	18.02	0.56	57.85	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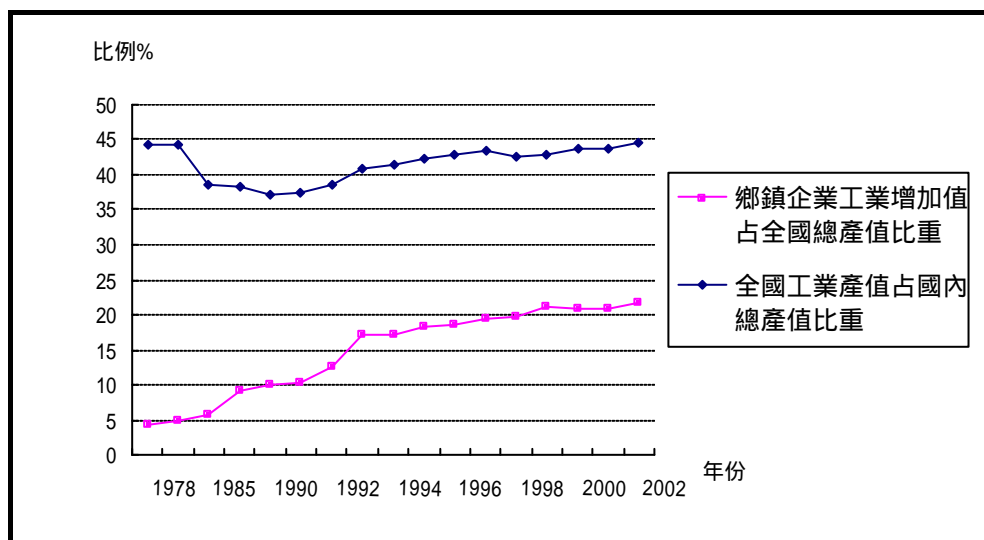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鄉鎮企業年鑒

(三) 鄉鎮企業與工業化

工業化指數是判別工業化程度最主要的指標，按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計算準則。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指數趨勢是逐步上升的，一但到達最高的臨界點，工業化指數便趨下降，如此便進入了以開發國家的行列，而呈現「倒 U」型的發展；¹⁰⁰主要是由於第二產業中的資源再度移轉至第三產業，在此階段產值比重會著重在第三產業的發展。

中國大陸的工業化指數變動趨勢，自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二年有逐步成長的趨勢，工業增加值也從一千六百零七億元增加到四兆六千五百三十五點七億元，大約是整個第二級產業的八成以上產值（表 3-2）。另一方面，農村中的鄉鎮企業發展，第二級產業是主要的重心，從經濟改革之始的一百五十九億六千萬元，成長到二億二千七百七十三億元之多，其工業增加值占總企業增加值也有百分之七十點三二，甚至高達其第二產業增加值的九成以上（表 3-3）。

圖 3-4、中國大陸工業與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趨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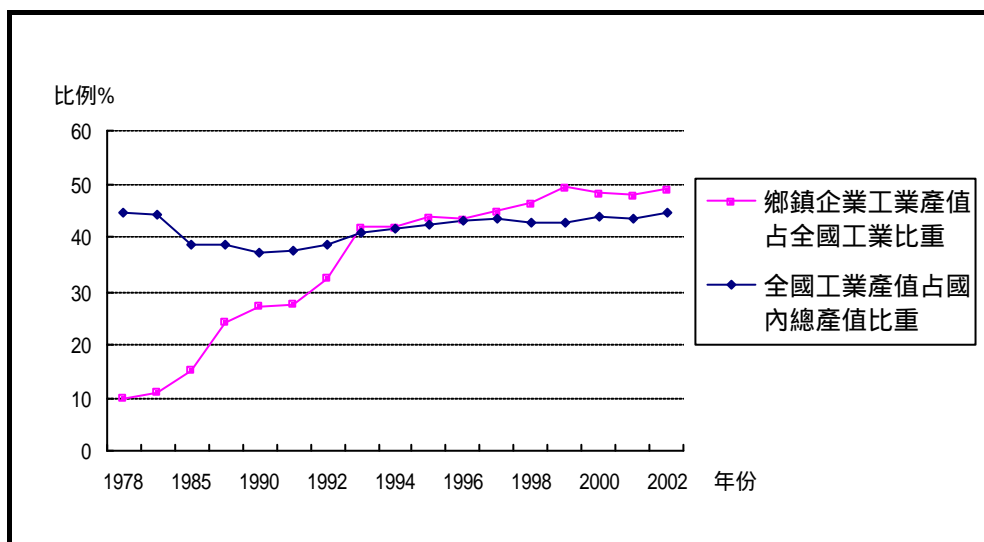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¹⁰⁰ Malcolm Gillis, Dwight H. Perkins, Michael Romer, and Donald R. S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481-486.

再觀察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可以看出較明顯的增長幅度，自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四點四成長到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七三。與全國工業化指數相互對照，兩者皆呈現出逐步成長的趨勢，以此可以判斷，中國大陸的工業化程度正位於「倒 U」曲線的左側部分（圖 3-4）。

若要再進一步了解鄉鎮企業對中國大陸工業化發展的貢獻程度，則可觀察鄉鎮企業工業部門增加值佔全國工業部門增加值比重。鄉鎮企業的工業部門在一九七八年時，只佔全國工業部門增加值的百分之九點九三；直到二〇〇二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其比重已高達百分之四十八點九四，鄉鎮企業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工業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圖 3-5）。

圖 3-5、中國大陸工業與鄉鎮企業工業貢獻程度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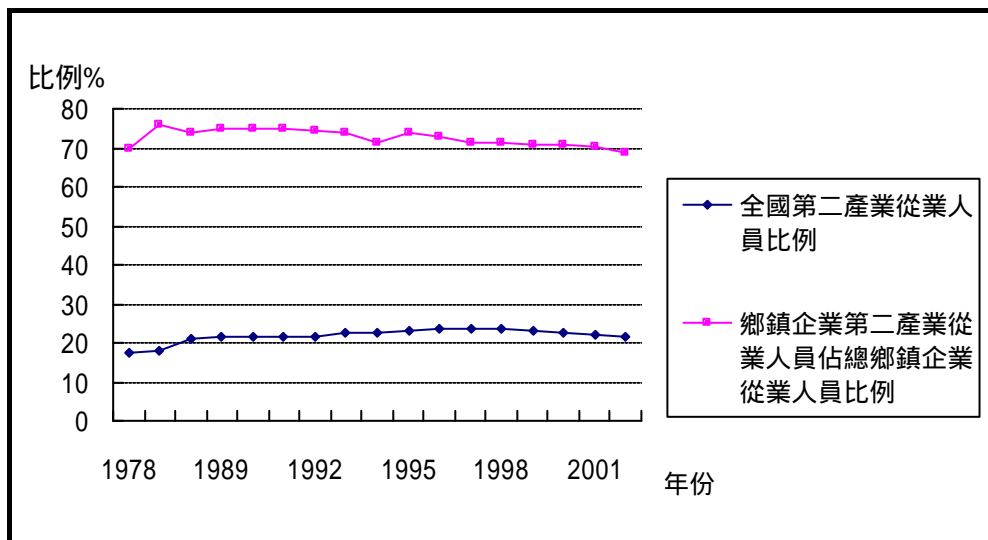
由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鄉鎮企業的貢獻，中國大陸全國的工業比重雖達百分之四十四點四一，但其自一九七八年來的成長幅度僅僅只能說是「微幅成長」；反而鄉鎮企業工業部門佔全國工業部門的產值快速攀升，甚至在一九九一年以後，其比重高於全國工業比重（圖 3-5）。這裡間接說明了，雖然中國大陸的工業部門相較於第一產業有較高的經濟效率，但在此部門中卻也實際存在著「無

效率」的部分。

而在鄉鎮企業工業部門對於勞動力的雇用貢獻方面，一九七八年的鄉鎮企業工業部門從業人數為一千七百三十四萬餘人，至二〇〇二年統計從業人數為七千六百六十七萬餘人，佔鄉鎮企業總從業人員比例分別是百分之六十一點三六、及百分之五十七點七的高雇用比例（表 3-6）。

由於全國性的從業人員統計數據中並沒有調查工業部門的從業人數，要觀察鄉鎮企業對全國工業部門雇員比例的貢獻程度，勢必尋找出可以替代、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指標來研究。工業部門屬於第二產業的分類項目下，在全國性資料中，工業部門的產值佔第二部門的總產值皆有八成五到九成以上的比重（表 3-2）；而鄉鎮企業的工業部門增加值佔其第二部門增加值比重也高達將近九成以上（表 3-3）；並且其工業部門從業人員佔第二級產業比例超過八成到九成以上（表 3-6）。因此以下則選用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員數作為衡量指標。

圖 3-6、全國與鄉鎮企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個別比例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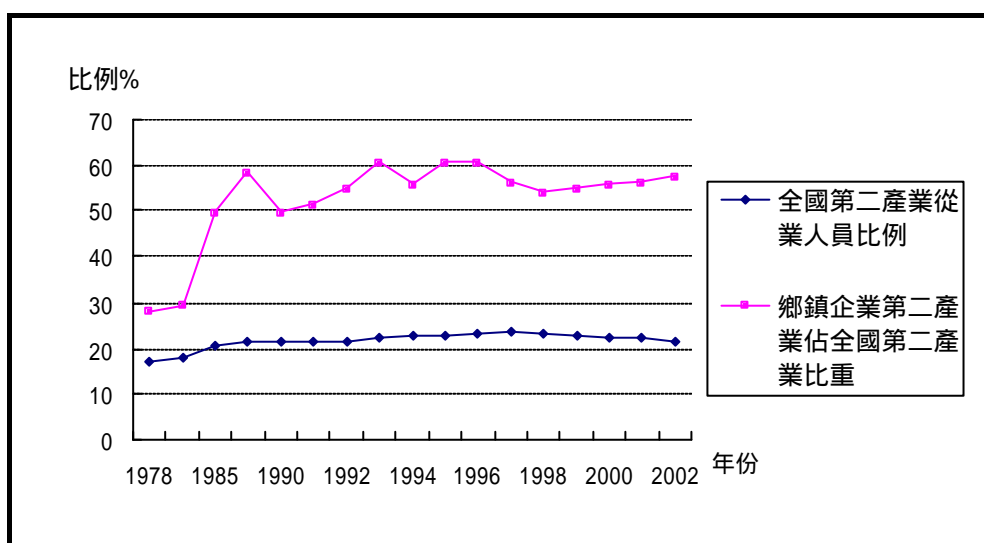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鄉鎮企業年鑒

將鄉鎮企業從事第二產業的人員數與全國第二產業人員數來做比較，全國從事第二產業的人員比例大約徘徊在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之間，二〇〇二年為

百分之二十一點四；鄉鎮企業則不然，從事第二產業人員比例高達了百分之七十左右，二〇〇二年則是百分之六十八點六九。可以說鄉鎮企業將大多數勞動力投入第二產業的發展，工業部門的從業人員比例也有百分之五十七點七之多；反之，全國第二產業雇員比例則遠遠低於鄉鎮企業，而全國工業部門的從業人員比例就更低了（圖 3-6）。

因此，鄉鎮企業第二部門的從業人數對全國第二部門的貢獻程度的衡量方面，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三七，成長至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點八五，最高的一九九三年則為百分之六十點七二；顯示出鄉鎮企業在吸納全國第二產業及工業部門從業人員數量的重要角色（圖 3-7）。

圖 3-7、全國與鄉鎮企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鄉鎮企業年鑒

將鄉鎮企業的貢獻分為投入面與產出面來觀察，從業人數可以作為投入勞動力的數量，而工業增加值則視為產出的額度。在上述的資料分析裡，可以發現鄉鎮企業在中國大陸工業化過程中，無論是投入面、或是產出面都有極高的貢獻比例，因此，若說鄉鎮企業主導支持中國大陸工業化發展成長，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第二節 企業產權結構的轉變

從產權結構來觀察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主要是由「經濟制度」的層面為出發點來說明：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除了會經歷產業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企業產權比重也會發生變化，經濟越發達、市場追求效率的聲浪越高，因此私營企業的數量與比重也會提升，相對的，國營或者國有的企業會逐漸減少。而國營、國有企業的身分就像是政府的代理人，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會漸漸退出市場，轉變為維持市場正常運作的角色。¹⁰¹

（一）經濟自由化與國家干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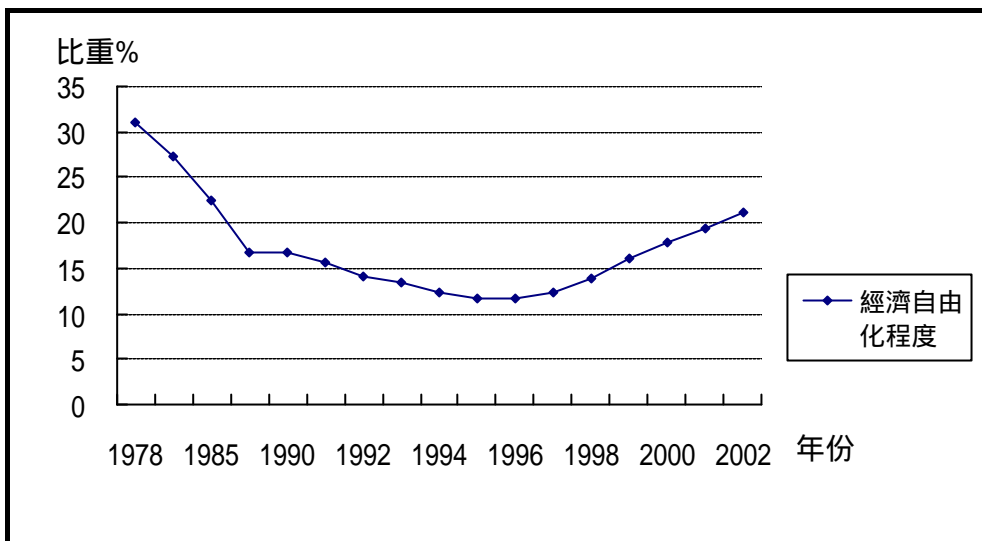
中國大陸目前仍維持一黨專政的政治型態，改革開放前的計畫經濟體制是結合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合一組織結構、戶口制度、配給制度等運作下的產物，透過城市中的國有企業及鄉村的人民公社，以達到完全的政治與經濟控制。改革開放後，國有企業的改造、開放外資、開放個體與私營企業都成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議題，而中國大陸政府在市場經濟上的角色是否也隨著經濟發展而改變？

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估是以政府財政預算支出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判定的。政府財政預算支出的比重越高，顯示國家干預經濟的行為較多，經濟自由化程度也較低；反之，政府的財政預算支出比重越低，經濟自由化程度就越高。但是，經濟自由化指數也無法完全表述市場與國家間的關係，政府的財政預算支出比重其實也常受到景氣循環、選舉等政治因素的影響；¹⁰²但此評估方式因操作方便、概念清楚，仍有參考的價值。

¹⁰¹ *Ibid.*, 118, 124.

¹⁰² Andrew B. Abel and Ben S. Bernanke, *Macroeconomics*, 3rd ed. (Bost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8), 287-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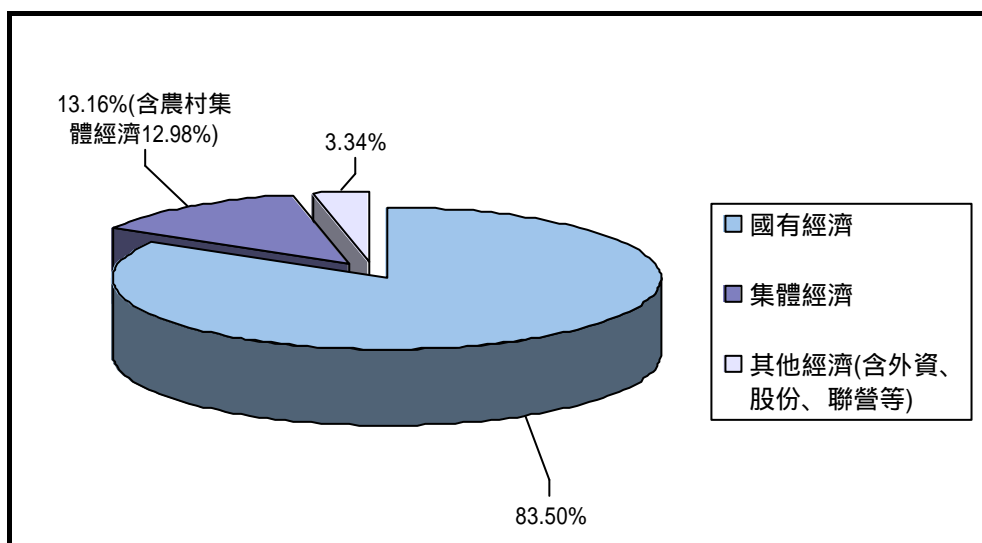
圖 3-8、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程度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的指數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點九六，逐年下降到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十一點六七，而二〇〇二年的指數則為百分之二十一點零四。雖然指數在一九九五年之後攀升，但與一九七八年相比較，其經濟還是朝著越趨自由化的方向行進（圖 3-8）。

圖 3-9、國家干預各類經濟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再深入分析政府干預的經濟類型，以二〇一〇年的統計資料為例，該年全社會固定投資的項目中，國家預算內資金總共是三千一百六十億九千六百萬
元，而投入國有經濟的額度就高達二千六百三十九億三千九百萬元，佔了預算
內資金的百分之八十三點五；而集體經濟與其他經濟類型的投資則只佔了百分
之十三點一六，及百分之三點三四（圖 3-9、表 3-8）。這還不包含政府透過融資、
貸款方式間接干預各經濟的部分，不過透過政府投入資金的額度，可以看出國
家對於國有企業的干預程度還是很高；特別相較於個體經濟、聯營、外商及港
澳台企業，政府個別投資比重都不足百分之一的現象（表 3-8），就可以顯示中
國大陸政府著重透過國有企業的控制來干預市場的模式。

其次，在國家預算內資金中，對於農村中的企業投資比重也極小。有關農
村經濟的預算資金，只有集體企業部分的四百一十億一千五百萬元，僅佔總預
算資金的百分之十二點九八，甚至對於農村中其他型態的經濟預算都掛零（表
3-8）；顯示出中國大陸政府對於農村經濟干預程度很小，並且也只針對從村中的
集體經濟從事資金投入。

表 3-8、二〇一〇年國家干預經濟比例表

經濟類型	國家預算內資金（億元）	國家干預比例（%）
總計	3160.96	100
國有經濟	2639.39	83.50
集體經濟	416.12	13.16
*農村	410.15	12.98
其他經濟	105.45	3.34
(含外資、股份、聯 營等)		
個體經濟	1.1	0.03
*農村	0	0
聯營經濟	0.51	0.02
股份制經濟	92.78	2.94
外商投資經濟	4.33	0.14
港澳台投資經濟	2.55	0.08
其他經濟	4.18	0.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以國家預算資金來觀察政府干預經濟類型的比重，主要是站在國家的角度來分析的，若要進一步研究個別市場自由化的程度，則必須將個別經濟的總產值列出計算。由於國家預算資金僅僅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其中一種方式，因此估計出來的自由化程度會有低估的情形、也無法確實的表達市場狀況，但「國家預算資金」是政府最直接的干預方式，可也藉此估計出的數值差異程度來判斷個別經濟的自由化程度。

以二〇一〇年的統計資料來估計，農村中的集體經濟就是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並且在國家預算資金中對農村中的其他形式企業並沒有投入額度，以下便採用鄉鎮企業的總增加值來做經濟自由度的估算，並取全國的估算作為對照組。經估計後的經濟自由化指數，鄉鎮企業部分為百分之一點二六六、全國則為三點零一六；顯示了鄉鎮企業的經濟自由程度較全國高，但由於指數低估，並無法呈現鄉鎮企業經濟的實際自由化程度，僅能表示鄉鎮企業擁有較全國平均自由的經濟環境（表 3-9）。

表 3-9、國家對鄉鎮企業經濟自由度比較表

	全國	鄉鎮企業
總產值/增加值（億元）	104790.6	32385.8
國家預算資金（億元）	3160.96	410.15
估計經濟自由化指數（%）	3.016	1.2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二）產權結構比例

在觀察一國家的產權結構，通常採用企業的資產總值來估計，但就中國大陸的官方統計資料中，有關企業資產總值的數據相當缺乏。因此得以選用其他統計資料來代替，如企業單位數、產出總值、從業人員數量、投資額度等；在全國性的統計數據中，以企業產權區分的單位數量、產出總值方面也不完全，故也造成資料整理與分析上的困難，資料較完全的則是各類型企業的從業人

數、以及全社會的固定投資得額度。

根據澳洲政府國外事務及貿易部門在一九九七出版有關中國大陸經濟的報告書中，對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九四年的企業產權結構做了簡單的整理，報告中主要是以企業產值作為估計。一九七八年時，國有企業產值佔了百分之七十八，其次是百分之十三的城市集體經濟，鄉鎮企業佔百分之九，而其他經濟則無比例；到了一九九四年全國產業結構出現大幅變動，國有企業仍是最大部門，比重卻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四，而鄉鎮企業以百分之三十居次，私有企業佔了百分之十二、城市集體經濟只剩百分之十，其他類型經濟則佔了百分之十四。在報告書的說明中也特別提到鄉鎮企業的快速成長顯著、非國有部門比例快速增加、國有企業表現在整體經濟中最差。¹⁰³

1. 各類型企業從業人員

在從業人員的資料中，一九七八年時的外資、其他與私營企業從業人員數量皆為零，當時以國有單位的從業人員數最多、鄉鎮企業次之，集體單位¹⁰⁴為第三。但在歷年的從業人數增減趨勢中，國有單位自一九九五年後實際從業人員保持減少的狀態；同樣的狀態發生在一九九一年後的集體企業身上。而鄉鎮企業、外資、私營、個體與其他企業的從業人員則呈現增長的情況。各類型企業從業人員的增長、削減趨勢大致與報告書的分析吻合，顯示出非國有部門的快速成長（表 3-10）。

而在從業人員比重趨勢方面，國有單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六十點三八，減少到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一七；同樣比重減少的還有集體單位，由百分之十六點六變為百分之三點四七。在同樣的時期，鄉鎮企業從百分之二

¹⁰³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China Embraces the Market: Achievements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Barton ACT,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7), 25-26.

¹⁰⁴ 這裡的集體單位是指城市中的集體單位，農村的集體單位已經計入鄉鎮企業中。

十二點九一成長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一三；個體企業由百分之零點一二提高到百分之十四點六八；私營企業由無至百分之十點五五的比重；外資企業也成長為百分之二點三五；而其他部分則為百分之五點六五。全國的非國有部門總合由百分之三十九點六二持續擴大為百分之七十七點八三（圖 3-10）。

表 3-10、全國從業人員統計表—以企業產權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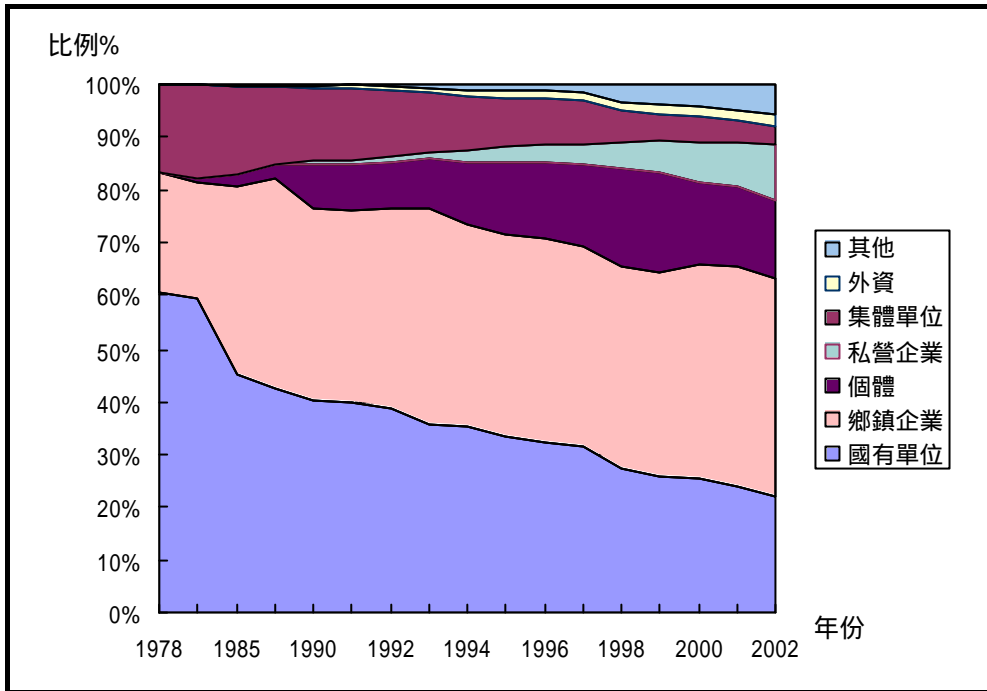
年份	*國內從業人員 (萬人)							
		國有單位	集體單位	外資	私營企業	個體	鄉鎮企業	其他
1978	40152	7451	2048	0	0	15	2827	0
1980	42361	8019	2425	0	0	81	3000	0
1985	49873	8990	3324	6	0	450	6979	38
1989	55329	10108	3502	47	0	648	9367	82
1990	64749	10346	3549	66	170	2105	9265	96
1991	65491	10664	3628	165	184	2308	9609	49
1992	66152	10889	3621	221	232	2468	10625	56
1993	66808	10920	3393	288	373	2940	12345	230
1994	67455	11214	3285	406	648	3776	12017	344
1995	68065	11261	3147	513	956	4614	12862	370
1996	68950	11244	3016	540	1171	5017	13508	412
1997	69820	11044	2883	581	1350	5441	13050	511
1998	70637	9058	1963	587	1710	6114	12537	1078
1999	71394	8572	1712	612	2022	6241	12704	1213
2000	72085	8102	1499	642	2407	5070	12820	1341
2001	73025	7640	1291	671	2714	4760	13086	1522
2002	73740	7163	1122	758	3410	4743	13288	1827

*國內從業人員總數與各單位加總有誤差值，這是由於部分從業人員並不屬於企業或單位體制內，如農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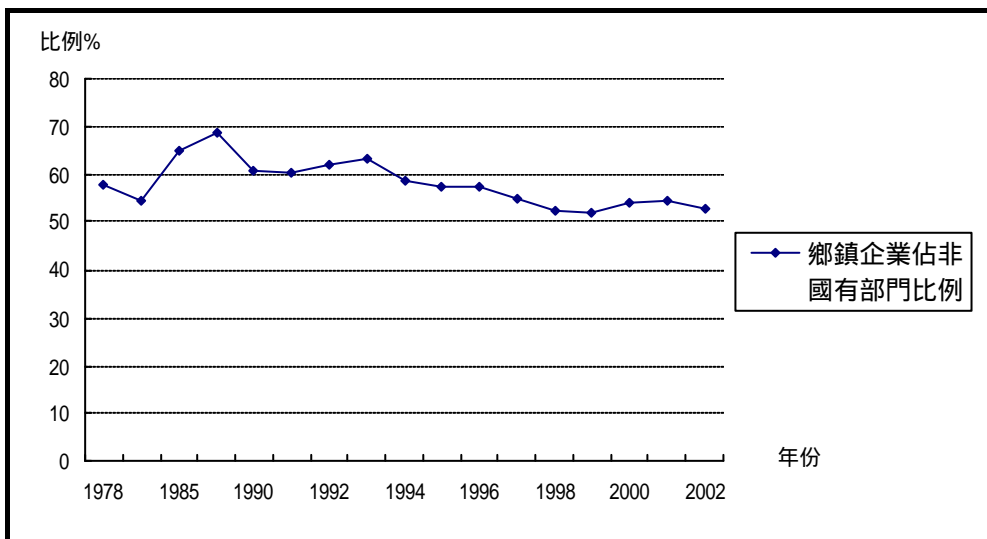
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佔整個非國有經濟的從業人員比例，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點八一，至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二點八四，比例大致穩定維持在五成到六成之間，一九八九年達到最高的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四（圖 3-11）。因此，由於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數佔非國有部門有過半的比重，在整個非國有部門的擴大發展的過程中，鄉鎮企業以和緩的擴張從業人數的方式，緩沖了個體、私營等企業從業人員快速增長的幅度，在社會產權結構比重改變的過程中扮演著穩定性的角色。

圖 3-10、全國各類型企業從業人員比重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圖 3-11、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佔全國非國有部門從業人員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2. 各類型企業固定投資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大陸的社會整體投資額度持續增加，顯示了各投資部門對於企業未來的獲利能力或市場開拓能力的樂觀預期，¹⁰⁵總額度由一九八 年的九百一十億九千萬元成長為四兆三千四百九十九億九千萬元。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無論是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或是其他類型的經濟，名目貨幣投資額數都呈現增加的狀態（表 3-11）。

表 3-11、全社會各類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表

年份	總計（億元）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個體經濟	其他經濟
1980	910.9	745.9	46	119	N/A
1985	2543.2	1681	327.5	535.2	N/A
1986	3120.6	2079.4	391.8	649.4	N/A
1987	3791.7	2448.8	547	795.9	N/A
1988	4753.8	3020	711.7	1022	N/A
1989	4410.4	2808.1	570	1032	N/A
1990	4517	2986.3	529.5	1001	N/A
1991	5594.5	3713.8	697.8	1183	N/A
1992	8080.1	5498.7	1359.4	1222	N/A
1993	13072.3	7925.9	2317.3	1476	1352.9
1994	17042.1	9615	2758.9	1971	2697.6
1995	20019.3	10898.2	3289.4	2560	3271.3
1996	22913.5	12006.2	3651.5	3211	4044.7
1997	24941.1	13091.7	3850.9	3429	4569.1
1998	28406.2	15369.3	4192.2	3744	5100.3
1999	29854.7	15947.8	4338.6	4196	5372.7
2000	32917.7	16504.4	4801.5	4709	6902.5
2001	37213.5	17607	5278.6	5430	8898.4
2002	43499.9	18877.4	5987.4	6519	12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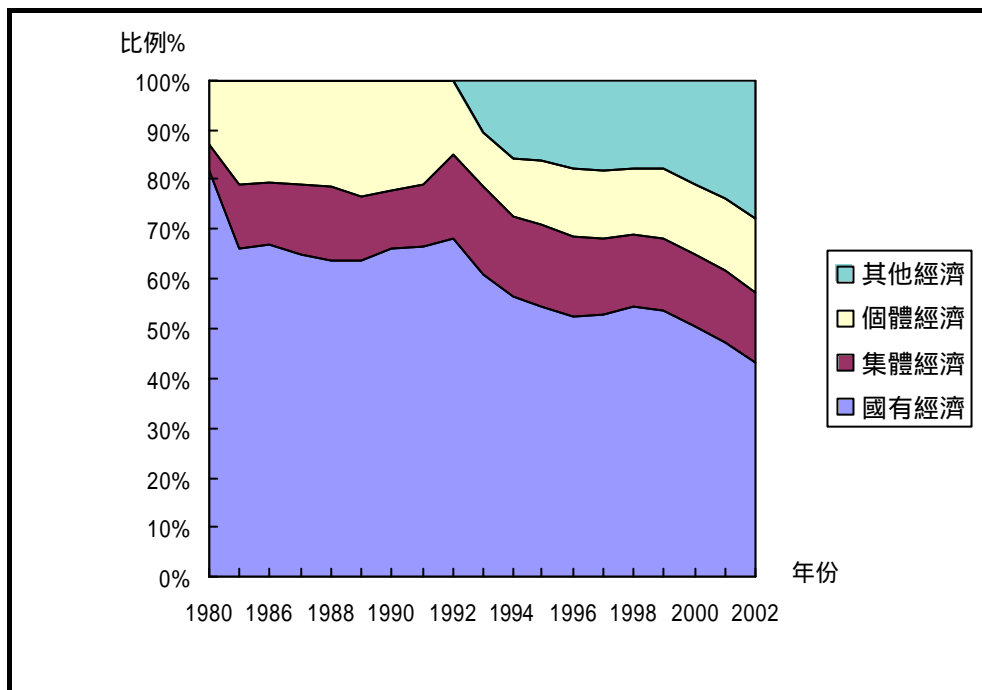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若將單一年度總投資額以百分之百估算，則可以發現一九八 年至二二年間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變動的趨勢。國有經濟比重由百分之八十八點八九減少為百分之四十三點四，集體經濟由百分之五點零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三點七六，個體經濟從百分之百分之十三點零六到百分之十四點九九，其他經濟則由

¹⁰⁵ Andrew B. Abel and Ben S. Bernanke, *Macroeconomics*, 3rd ed. (Bost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8), 118-130.

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十點三五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點八五（圖 3-12）。由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分部也可以看出相同的趨勢：社會的投資比重由國有部門轉向非國有部門，除了與前項從業人員比重的移轉趨勢吻合之外，也支持了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資源會向較高報酬率的部門流動，¹⁰⁶使得國有部門發展弱化、而非國有部門有擴張性成長的立論。

表 3-12、全社會各類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三）鄉鎮企業產權轉變

中國大陸總體的產權結構在一九七八年以後發生變化，非國有部門在產出、就業、資源的比重上逐漸增加，顯示市場開始著重朝向利潤取向的企業；而鄉鎮企業本身對於總體的就業與產出的貢獻程度極高，就鄉鎮企業本身而言，是否也有產權結構轉變的情形？又轉變的趨勢如何？

¹⁰⁶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基本假設中，要素會按照其商品報酬的高低選擇流動方向，要素也會追求其收益最大化，如勞動要素考慮工資、資本要素就考慮利息。

表 3-12、各類型鄉鎮企業單位數

年份	鄉鎮企業單位數（萬）	鄉鎮企業單位數（萬）		
		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個體企業
1978	152.43	152.43	0	0
1980	142.47	142.47	0	0
1985	1222.5	156.9	53.3	1012.3
1989	1868.63	153.51	106.94	1608.18
1990	1873.44	145.39	97.88	1630.17
1991	1908.74	144.23	84.9	1679.61
1992	2091.96	152.72	90.18	1849.06
1993	2452.93	168.52	103.85	2180.55
1994	2494.47	164.1	78.64	2251.73
1995	2202.67	162.02	96.02	1944.63
1996	2336.33	154.89	226.42	1955.02
1997	2014.86	129.19	233.24	1652.43
1998	2003.94	106.58	222.2	1675.15
1999	2070.89	94.08	207.58	1769.23
2000	2084.66	80.21	206.06	1798.39
2001	2115.54	66.88	200.71	1847.95
2002	2132.69	73.15	229.79	1829.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根據各類型鄉鎮企業單位數的統計資料顯示，鄉鎮企業在發展之初以集體所有形式為主；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央明定鄉鎮企業為社（鄉）隊（村）辦企業、社員聯營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工業與個體企業之後，鄉鎮企業下的私營企業與個體企業數量才迅速增加。尤其個體形式與私營形式的鄉鎮企業個數，在一九八五年的統計上就超過了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而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個數，反而在一九九三年之後漸漸減少（表 3-12）。這主要是由於集體形式鄉鎮企業本身存在發展上的瓶頸，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出現經營績效降低的情形，政府因此鼓勵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從事合併、或出售給私人經營。¹⁰⁷然而，以企業單位數量來衡量產權結構的變遷並不合適，主要是再於各類型鄉鎮企業的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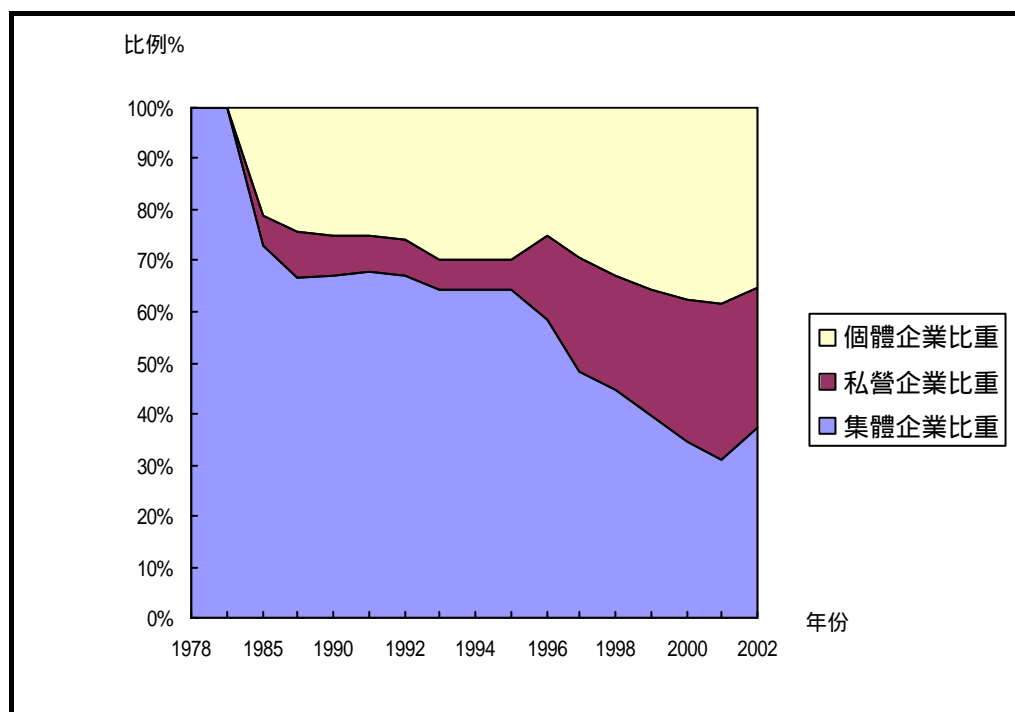
¹⁰⁷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81-89.

模差異極大；因此，在後段分析中將以鄉鎮企業企業增加值及從業人員數作為研究標的。

1. 各類型鄉鎮企業增加值

在本章第一節中以產業類別探討了鄉鎮企業增加值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程度；在本段中則著重在不同產權類型的鄉鎮企業與企業增加值之間的關係。由於一九八四年之前的鄉鎮企業皆屬於集體形式，故當時的鄉鎮企業總增加值就等於集體鄉鎮企業的增加值；一九八四年後，私營與個體形式的鄉鎮企業出現，集體鄉鎮企業佔總增加值的比重便逐年下降，直到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二六，增加值為一兆二千零六十七億三千五百萬元；而私營鄉鎮企業增加值自一九八四年後迅速增長，佔總增加值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二三；同樣的，個體鄉鎮企業增加值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五點五一（圖 3-13）。

圖 3-13、鄉鎮企業產權結構比重趨勢圖 - 增加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增加值佔總增加值比重有明顯的下降趨勢，造成比重

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集體鄉鎮企業使用的機械設備，有的甚至是從人民公社時代留下來的，設備老舊是原因之一；中國大陸市場越開放、企業間的競爭力就越強，企業經營者對行銷、經營的知識缺乏；一九九〇年代，地方政府鼓勵私營鄉鎮企業的發展，排擠了對集體企業的政策優惠與資源投入，因而壯大了私營鄉鎮企業的發展。¹⁰⁸總而言之，集體鄉鎮企業弱化發展的原因，除了來自整體經濟環境、也有本身組織及營運方式的缺點、政策效果的交互影響。

2. 各類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

另一方面，從各類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來觀察產權結構的變遷方向。在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二年間，集體鄉鎮企業由佔全體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百分之百的比重，下降到剩下百分之二十八點六一；而私營形式的鄉鎮企業則由一九八四年開始逐年增長，從業人員比重佔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三六；個體形式的鄉鎮企業也是由一九八四年開始，佔了百分之三十五點零四，為從業人員數最多的鄉鎮企業形式（圖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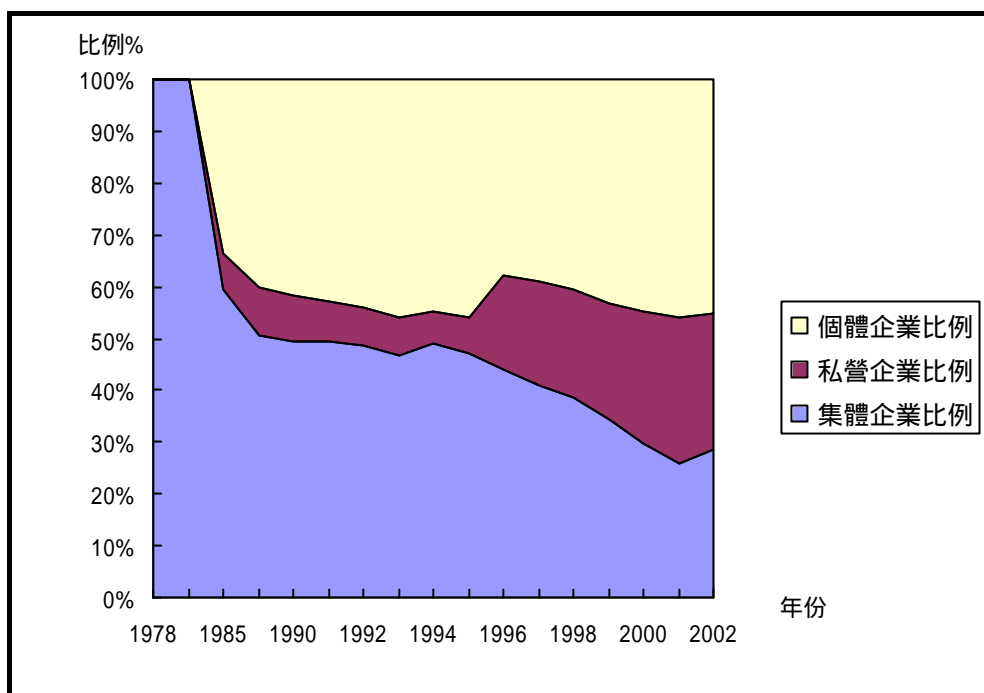
根據 Fei-Ling Wang 的勞動力分配模式，可以將鄉鎮企業下這三種產權形式做分類：集體企業可以視為社區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個體企業，是一種以傳統家庭為基礎的勞動力分配模式；而私營企業則是勞動力市場的最佳代表。因此，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比重減少，就象徵著社區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減弱，而家庭為基礎的勞動力分配模式與勞動力市場的型態逐漸強化。¹⁰⁹但在九〇年代後，地方政府政策轉向鼓勵私有化，並且推動股份制、租賃、共資與集團的方式，因此也有「假集體」的出現，即貼著集體企業的標籤，實際上卻是真正的私營企業，¹¹⁰這個事實更加削弱了社區型勞動力分配模式的權數。

¹⁰⁸ *Ibid.*, 128-137.

¹⁰⁹ Fei-Ling Wang, *From Family to Market: Labor Allo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2.

¹¹⁰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圖 3-14、鄉鎮企業產權結構比重趨勢圖 - 從業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第三節 二元經濟體的轉變

中國大陸在一九七八年前的計畫經濟體制之下，所有的經濟活動行為完全由國家控制，包括勞動力數量、薪資、產出、銷售、資源分配等。而運作機制則透過城市中的國有企業、農村中的人民公社，再加上延密的戶口制度、層層管制的各級政府，將城市與鄉村間資源、勞動力、商品自由流動的可能性切斷，因而造成了城鄉分隔的意象。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戶口制形同虛設、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以及農村工業化、外資企業進入市場，這些都成為促進勞動力市場流動的誘因與動力；並且價格體系逐漸彈性化，使要素市場的流通更快速；商品的銷售管道也多元化，

不再僅限於以糧票、布票向物資供應部門換取商品。這些改變使得城鄉之間的距離漸漸拉近，以往計畫經濟下的二元經濟體制也開始發生轉變。

（一）城鄉的新聯繫

在一九七八年之後，中國大陸的城市與鄉村開始產生人員或商品的流動，因此，研究改革開放後城鄉間的關係轉變，便可以透過這兩種資料來觀察。

1. 勞動力的流動

根據二部門剩餘勞動力模型的推論，勞動力會向工資較高的區域流動。相較於農村中從事農業的居民，農產品受統購統銷的價格限制，城市中國有企業的職工是享有較優渥的薪資與社會保障；為避免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因而豎立了戶口制度來控管。改革開放後，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進駐，產生了許多勞動力需求的空間，高薪資的誘因成為勞動力市場流動的推手。

由國家統計局對農村住戶勞動力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二年間，農村轉移勞動力佔農村勞動力比重由百分之十八點一，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點六；而當年農村總勞動力為四兆七千九百六十二萬餘人，可以推估算出外出勞動力約為一兆一千三百一十九萬人；並且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總遷移人口數量估計為一兆三千一百一十六萬人，而在省內由農村遷移到城市的人口大約是五千零五十六萬餘人，跨省遷移到城市約有二千六百四十六萬人；¹¹¹由農村移入城市的勞動力比重約佔總農村勞動人數的百分之十六點零六左右。

這些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具有幾個主要特徵：其一，在性別及年齡比例方面，以青壯年男性為主；其二，流動的農村勞動力教育水準提高，並且與遷入地的

¹¹¹ 蔡昉、都陽、王美艷著，*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

發展程度有正向相關；其三，有五成以上的流動人口從事第二級產業，約四成從事第三級產業，仍從事第一級產業的比重極小；其四，流動的勞動力仍須兼顧原住地的農業生產，也就是所謂的農民工。¹¹²

農民進城也促進了城市的發展，這些流動人口的年齡較輕、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屬於具有較高生產率的族群，但只能覓得較低階的工作，卻有助於推動城市就業體制的改革；另外，由於勞動力的流動帶來資源重新配置的效應，有助於改善城市的產業結構；農村勞動力的遷入，也抑制了城市職工薪資的提升程度，保持中國大陸勞力密集的優勢；城市為了負擔這些外來人口，便越重視城市本身的公共衛生與基礎建設。有關於城市的發展，在在都離不開這些農村勞動力的貢獻。¹¹³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國有企業改革，在城市中創造了許多下崗職工，這些下崗職工中有百分之七十七點五屬於三十到四十九歲年齡層，¹¹⁴除了轉到城市中的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覓職外，農村中的鄉鎮企業也吸納了部分的城鎮下崗職工。根據二〇〇二年底的統計資料顯示，鄉鎮企業吸納城鎮下崗失業人數達到三百七十萬二千六百四十七人，¹¹⁵雖然數量遠小於農村移入城市的勞動力人口，卻顯示了勞動力遷移不再只是由鄉入城的單一方向，驗證了修正後的二部門剩餘勞動力模型的操作。

2. 商品的流通

以往的統購統銷制度限制了農民的所得進出，農民必須向政府高價購買肥

¹¹² 范小玉，「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狀況分析」，《農村經濟調查研究文集》，朱向東主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四一 至一四二。

¹¹³ 蔡昉、都陽、王美艷著，《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二四至二六。

¹¹⁴ 《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¹¹⁵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料及農具，產出由政府統一收購、但農民的日常消費卻只能向國家的商業部門購買。由於政府的農產品倉儲設備與運輸不佳，即使是品質好的農產品，在經過政府統購儲藏之後也難以新鮮保存，造成城市人民的福利損失；另一方面，肥料價格剝削農民所得，國家提供的商品無法滿足農民的消費需求，則是降低了農民的福利；而對於政府來說，長期對於城市的補貼、以及農產品的收購，造成財政日趨惡化。¹¹⁶

包產到戶的政策除了提高農村的生產力，也促使農民對肥料的施用、耕作技術的提升、農機設備的更新做投資性的經濟行為；此外，由於包產到戶可以留下承包數額以外的數量，這些被保留下來的農作產出便成為農民的收入來源，促進了農村的商業發展。

最開始時，農民將所生產的農產品帶到城鄉交界販售，是不定時的、不定地點的販賣形式；後來漸漸也有以農產品換取城市的消費商品、形成較大規模的農產品市集；同時農村工業化的發展，也開始有了非農業產品的銷售。¹¹⁷透過農產品與其他商品的交換流通，建立起城鄉之間的市場性關聯，而非以往的計畫性銷售管道；除此之外，商業行為也滿足了城鄉居民的福利損失，農民獲得較高的所得收入與多樣化的消費性商品，城市居民則可購買到品質較好的農產品，減少的兩方的無謂損失。¹¹⁸

3. 鄉鎮企業的橫向連結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黨代表大會時提出「繼續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並且在政策安排上提及「城鄉聯合」：鼓勵國有中大型企業、三線國防工業企業，透過

¹¹⁶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77-79.

¹¹⁷ *Ibid.*, 85-92.

¹¹⁸ 有關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的解釋：Walter E. Nicholson,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 and Its Application*, 7th ed. (Orlando, Florida: the Dryden Press, 1997), 288.

零件生產、原材料開發以及加工的形式與鄉鎮企業合作，並且這些與鄉鎮企業合作的企業，可以實行鄉鎮企業的經營模式，並且享有當地的優惠政策。¹¹⁹這是以中央的角度，鼓勵城市國有企業與鄉鎮企業從事聯合生產的相關政策。

另一方面，再將重點放在地方政府上，由於從事鄉鎮企業經營的農民，對於行銷通路、市場資訊獲得管道不足；而地方政府官員擁有較廣大的人際網絡，並且掌握較多的市場資訊，因此可以引導鄉鎮企業與城市中的國有企業，或是其他形式的企業合作，或是代工生產、或者是銷售通路；舉例來說，國有企業提供原料或設計樣品，再由鄉鎮企業從事生產，透過簽訂的契約將銷售到大型企業，最後由消費者購買。¹²⁰總而言之，這些地方政府官員掌握了城鄉間市場關係的發展，因為這些市場資訊是流通在地方的官僚體系中。

在這種橫向的聯合關係下，農村中的鄉鎮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就像與城市中國有部門互為補充，互相信任下為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而城市與鄉村也透過鄉鎮企業與城市中大型或國有企業彼此間的經濟聯合行為，或者是資金、技術的轉移、共享利潤的基礎上，有了更深化的城鄉聯繫。

（二）非農化指標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的勞動力會逐漸轉移到工業或服務業部門，因此非農業部門會迅速擴張。而在農業社會中，農戶是因耕作、灌溉等農務而須依地而居，人口是散佈在農村各地的；在工業社會中卻不然，勞動力集中在工廠中生產，自然產生人口聚集的作用，這就是初始城市化的現象。觀察中國大陸二元經濟體制的改變，即可透過非農化與城市化的指標來對照，本段先就非農化指標探討，下段再針對城市化程度分析。

¹¹⁹ 宋洪遠等，*改革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三二一。

¹²⁰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34-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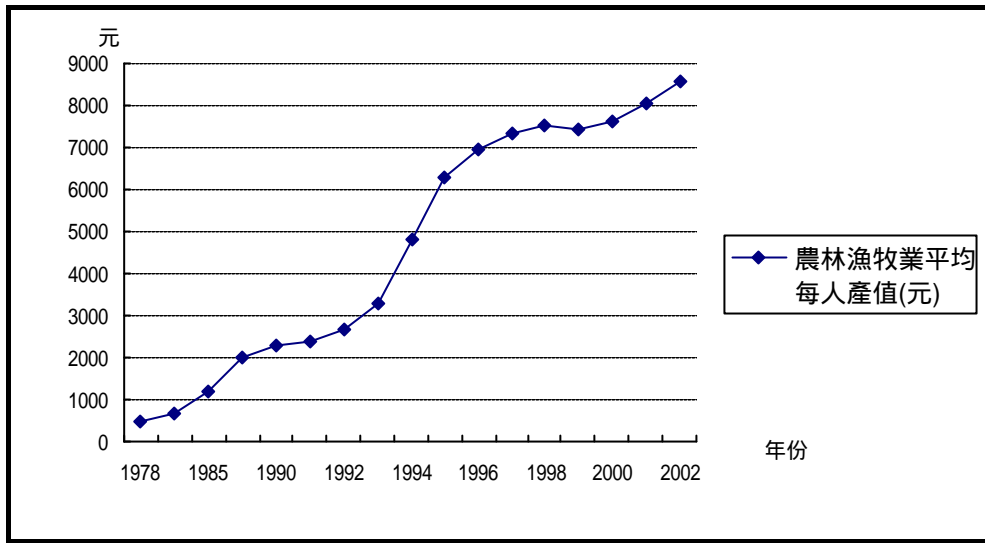
1.總體的非農化程度

通常，非農化程度通常是以第二級與第三及產業從業人員佔全體從業人員比例來判斷的，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二年，非農從業人員比重由百分之二十九點四八，成長到百分之五十（表 3-5）。非農從業人員比例的提高，自然顯示著二、三產業的擴大，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市場上，第一產業部門的生產效益也必須有同步的提升，否則即容易產生結構的失衡。¹²¹因此，有關這段期間第一產業生產效率的評估，可以觀察農林漁牧業的平均每人產值是否隨之提升；每人平均產值自一九七八年的四百九十一元，一直保持增長的趨勢，在二〇〇二年達到八千五百六十二元，成長幅度高達十七倍之多（圖 3-15）。數據顯示出，雖然第一產業部門的比重減少，但其生產產值卻逐年提高、越來越效益化。

而另一個觀察的方向則是非農業人口的比重，由於從業人口並不包括兒童、退休及失業，非農業人口的比重則可以顯示全國的非農化狀況。根據二〇〇二年的資料，中國大陸當年的農業人口有九億三百零一萬人，非農業人口有三億四千九百三十四萬人，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八（表 3-16）。與從業人員的數據相較，沒有或尚未從業的農業人口非常多，因此，未來中國大陸的非農化發展是必要著重在這些農業人口中。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從業人員來看，中國大陸的確是朝著非農化的步伐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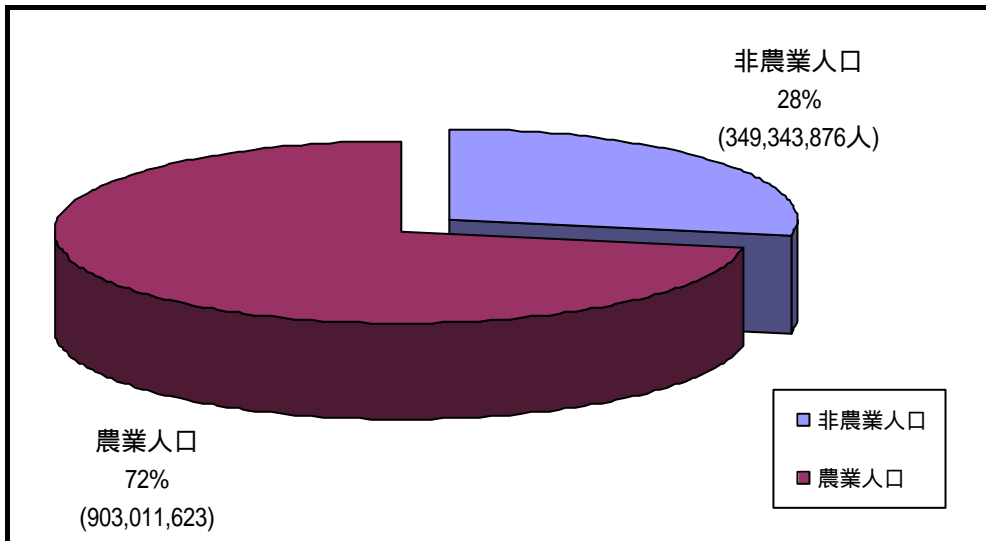
¹²¹ 以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為例，為追求農村工業化，勞動力大量投入工業發展，卻造成糧食產量減少，饑荒之說頻傳。

圖 3-15、農林漁牧業平均每人產值增長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圖 3-16、中國大陸二〇〇二年農業與非農業人口比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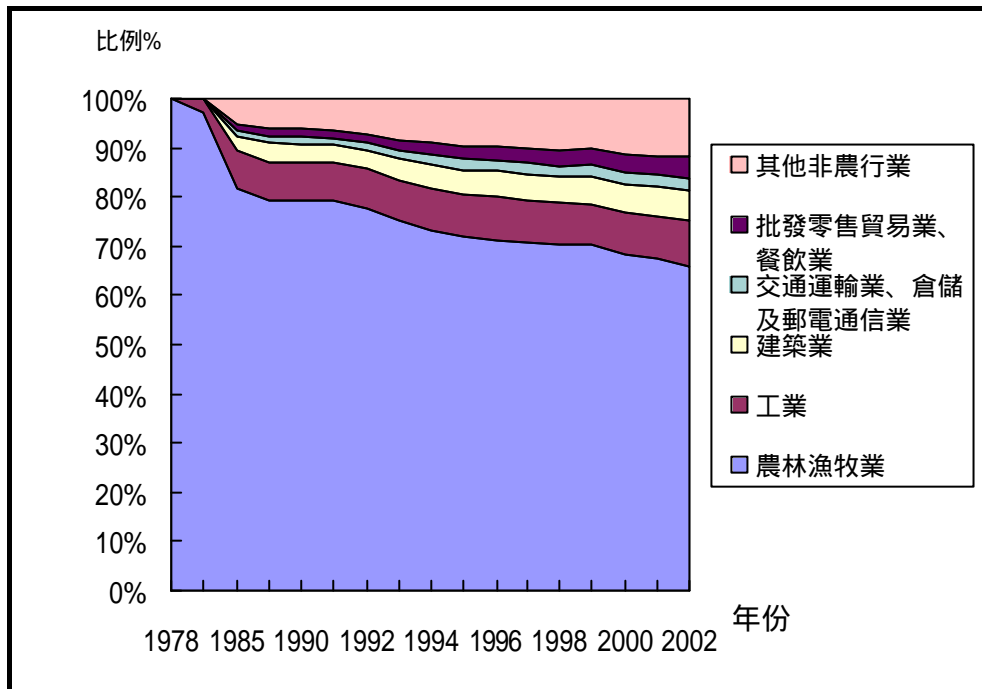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農業經濟統計

由於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多為農村居民，透過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狀況也可以發現非農化在農村地區的發展趨勢。農村中非農化的情形有漸漸擴張的趨勢，自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二年，非農從業人員比重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四點零

八（圖 3-17）。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較，美國非農從業人員比重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三、英國為百分之九十八點四，¹²²而台灣的非農化比例也有百分之九十二點五；中國大陸的非農化程度顯然還要再提升，尤其是針對有廣大勞動人口的鄉村地區。

圖 3-17、農村勞動力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2. 鄉鎮企業與非農化

在本章第一節中曾經針對鄉鎮企業三及產業的比重變化做觀察；同樣的，按二、三級從業人員數做非農化的指標，改革開放至今，鄉鎮企業非農化程度由百分之七十八點四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點四五（表 3-6）。由於農村地區還存在許多農業人口，鄉鎮企業高水準的非農化比例的確是提高農村或全國非農化程度的良好切入點；因此，許多學者也建議以健全鄉鎮企業體質、以優惠方

¹²² 此為二一年數據：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4—地區現代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四年），頁十七、三九。

式促進鄉鎮企業發展等方式，來幫助農村地區勞動力轉型。¹²³

另外，有關鄉鎮企業與農民收入之間關聯性的研究指出：鄉鎮企業的興起，以及其多元化的經營方式提高了農民的收入。¹²⁴如鄉鎮企業從事第一產業以及輕工業的企業，將農產品以產業的生產經營方式、或者透過食品及作物加工製成商品，間接的提高了農業的附加價值。又，根據二〇〇二年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的調查資料顯示，當年的農民純收入為二千四百七十六元，而非農業收入保持成長是支持純收入成長的主要力量；在非農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為八百四十元，並且工資性收入增長的原因是農民外出打工、及在本地鄉鎮企業或非企業組織中所得，而在本地鄉鎮企業打工的收入為二百四十元，較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四點五左右。¹²⁵

由農村經濟收益分配項目來看，二〇〇二年的農村經濟總收入為十一兆六千六百三十億三千四百八十二萬元，而鄉鎮辦的企業收入就佔了三兆九千一百七十九億一千五百九十八萬元，為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五九，這還不包含集體形式以外的鄉鎮企業收入。而扣除掉總費用，再加上投資收益、與農民外出勞務收入的可分配淨收入總額為二兆八千二百五十六億零五百九十八萬元，可分配淨收入中除了國家稅金級上繳相關部門等支出，企業本身可以有部分的保留利潤，與農村有關的經費項目包括鄉村提留統籌、鄉鎮統籌兩部分共計七百三十一億零九百二十七萬元，以及農民經營所得。並且，農民可以獲得從集體再分配的收入總額達四百四十五億二千八百九十七萬元。¹²⁶

¹²³ 范小玉，「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狀況分析」，*農村經濟調查研究文集*，朱向東主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四五。

¹²⁴ 國家統計局農調隊課題組，「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問題」，*農村經濟調查研究文集*，朱向東主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二九三。

¹²⁵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3 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五。

¹²⁶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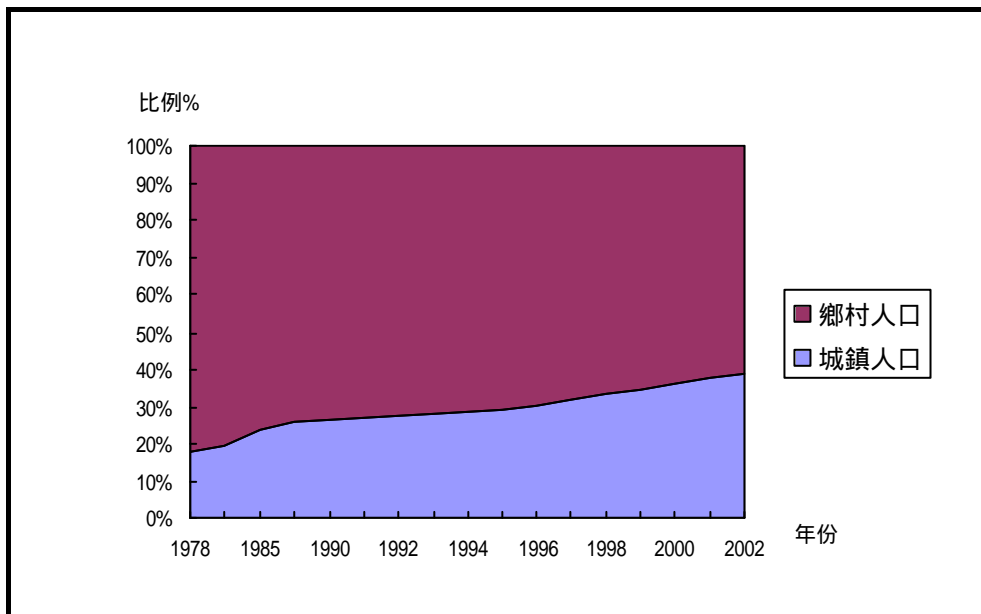
根據上述數據，鄉鎮企業的收入總額會被分配利用到鄉鎮本身的發展與建設上，項目有公基金、公益金、鄉村兩級辦學、計劃生育、優撫、鄉村道路建設等。因此，鄉鎮企業發展的越好，本地的統籌提留額度也會越多，更有助於農村本身的基礎建設、或是社會福利的提供。鄉鎮企業雖大多為第二、第三級產業，卻透過鄉鎮統籌留提的機制與農村、農業、農民一起發展。

（三）城市化指標

1.全國城市化概況

城市化為經濟現代化評定的重要指標之一，測量方式則是以城市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重為主。就中國大陸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二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城鎮人口從一億七千二百四十五萬人，成長到五億零二百一十二萬人，佔全國比例為百分之十七點九二，提高為百分之三十九點零九（圖 3-18）。同時，二〇〇二年全國的城鎮單位數達到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一個。

圖 3-18、中國大陸城鄉人口比例趨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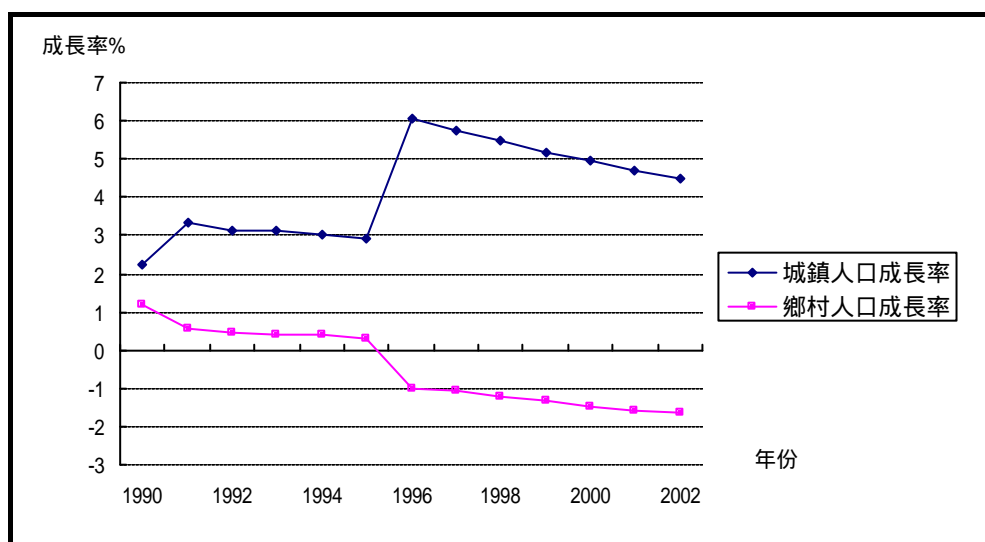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再觀察城鄉的人口增長率，在一九九〇年時，城鎮與鄉村的人口成長率分

別為百分之二點二二、及百分之一點一八，差距並不算太大；直到二〇〇二年為止，城鎮與鄉村的人口成長率是背道而馳，城鎮的人口成長率為百分之四點四七，農村則為負成長值：百分之一點六六；城鎮的人口成長率始終高於鄉村的人口成長率，這個發現也支持了中國大陸城市化的發展。除此之外，除了鄉村在一九九六年持續出現人口負成長的形況外，城鎮地區的人口成長率也自一九九六年後逐年降低（圖 3-19），這訊息透露著新增人口的生活成本提高；這也是城市化及現代化的現象之一。¹²⁷

圖 3-19、中國大陸城鄉人口成長率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2. 「鎮」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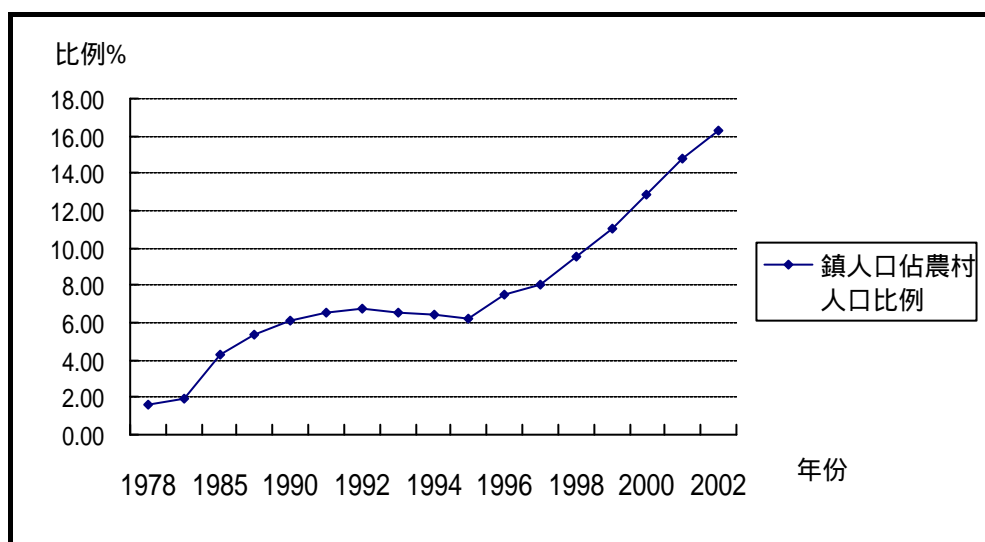
小鎮具有一定程度的城市特徵，為中國大陸城市體系中的最低層級，被視為是農村的區域經濟中心、社會文化中心。雖然鎮政府與鄉政府的行政職權相同，但在實際的執行上還是有所不同的，鎮政府主管工業、手工業以及商業，並且有城鎮發展規劃、市政建設等職能；而鄉政府卻是主管農業生產。並且，

¹²⁷ Malcolm Gillis, Dwight H. Perkins, Michael Romer, and Donald R. S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193-196.

在「市管縣」的原則下，¹²⁸鎮政府可以干預同級鄉政府的規劃發展；¹²⁹因此，觀察「鎮」的發展狀態，可以視為是農村城市化的研究角度。

鎮的人口總數由一九七八年的一千三百零六萬人，到二〇〇二年底為一億五千二百六十一萬五千人；而佔農村人口的比重則由百分之一點六三，逐年成長到百分之十六點三二(圖 3-20)，鎮的人口比重提升並且持續維持增加的狀態，清楚的顯示了農村地區也有城市化的現象。

圖 3-20、鎮人口佔農村人口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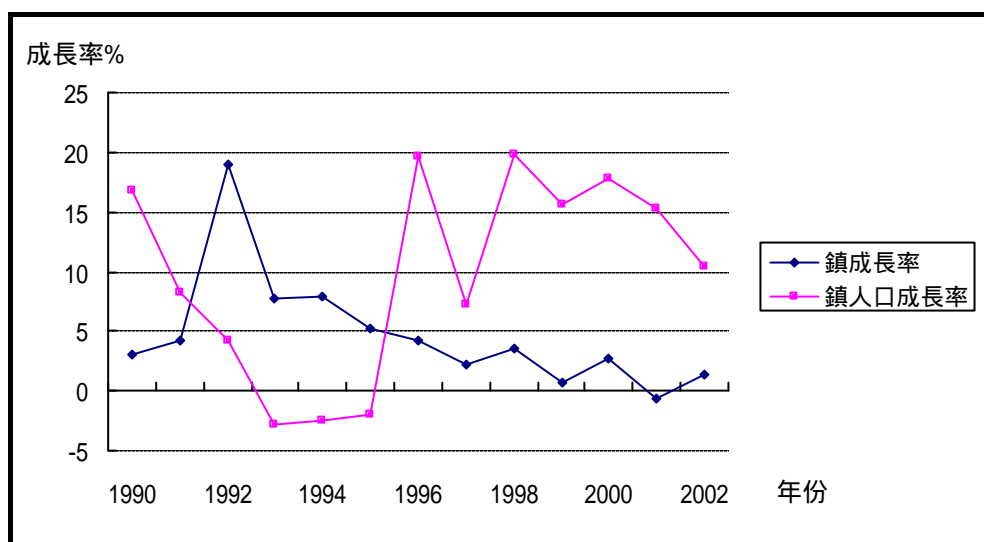
其次，鎮的數量從一九八五年的七千九百五十六個，成長到二〇〇二年的一萬九千八百一十一個；鎮的數量成長率這幾年來已漸漸趨緩，二〇〇二年的鎮成長率為百分之一點三一。反觀鎮人口的成長速度，在一九九六年以後都維持為正成長，而二〇〇二年的鎮人口成長率為百分之十點四三；這裡可以發現，

¹²⁸ 「市管縣」最初的用意是為了實現城鄉共治的願景，但由於城市與鄉村的工作重心不同，市政府便常處於「一手抓農村經濟、一手抓城市建設」的狀態，而管理方式也分成「城市管理、農村管理」；有些地區甚至已經出現重城輕鄉的傾向了。

¹²⁹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四三六至四三九。

由於鎮與鎮人口成長率存在的差距，平均每個鎮的人口數也不斷擴張，鎮的規模擴大。平均每個鎮的人口數由一九八五年的四千六百零四人，增加到七千七百零四人（圖 3-21）；顯示了鎮本身的人口聚集現象以及城市化發展趨勢。

圖 3-21、鎮與鎮人口成長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3. 鄉鎮企業與城市化

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是互為因果的正相關，¹³⁰工業化發展吸引資本與就業人口聚集，進而擴大工業化規模、城市化開始發展，因此工業化程度越高、同時的城市化程度也越高。¹³¹在一九七八年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有關農業發展的議題上提出了「鎮」的發展概念，欲將農村的工業部門集中在鎮裡；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央利用租稅政策，鼓勵農村的集體經濟參與鎮的建設。而在一九九四年，由建設部、國家計委、農業部等六個部委發行的圖書中，肯定了鎮作為農村經濟和社會進步的載體，同時也提出鄉鎮企業的崛起和迅速發

¹³⁰ Malcolm Gillis, Dwight H. Perkins, Michael Romer, and Donald R. S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486-488.

¹³¹ 聚集效應：可以分為內部與外部效應來解釋。內部效應部分是指因為要素的集中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外部效應則是指經濟主體之間形成的聚集效應，如工業化、城市化、產業集中等。

展，促進了城鄉經濟一體化的成就。¹³²

鄉鎮企業原起於農村各地，並且擁有特殊的社區特色，這些鄉鎮企業是分散座落的；隨著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中央注意到鄉鎮企業的佈局特性，不僅僅不利於產生聚集效應，也造成資源利用不經濟、企業經營成本提高，更不容易因工業化而推動城市化發展。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後，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引導鄉鎮企業適當集中，加速城市化的進程。

由於鄉鎮企業主要從事二、三級產業經營，尤其工業部門的發展特別突出，中央在發展「鎮」的策略上利用鄉鎮企業工業化的優勢，促進農村中的城市化發展。雖然城市化並不一定帶優良的生活環境，¹³³但鄉鎮企業聚集以後的確創造了許多的外部效應，根據一九九八年有關部門的估算，聚集的工業小區中再加建一個企業可以節省百分之十的投資額，並且減少佔用百分之十五左右的耕地面積，而污水、綠化等費用可降低百分之五；同時也減少了資源浪費與經營成本，促進企業間的資訊及技術流通。¹³⁴因此，不僅是鄉鎮企業對於「鎮」的城市化發展有貢獻，「鎮」的城市化也對鄉鎮企業的成長有回饋性的助力。

第四節 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

內生成長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為了修正 Solow Model 的內部缺失，這部分學者常釋透過經濟體系的內在因素來解釋每人所得成長率，或經濟成長率的決定因素，突破傳統生產函數的常用變數；因此，有從人力資本、研究發展、公共

¹³² 宋洪遠等，*改革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三三七至三四五。

¹³³ E. J. Hobsbawm, *The Pelic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3, Industry and Empire* (Baltimore: Penguin, 1969), 86.

¹³⁴ 宋洪遠等，*改革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二三四至二三五。

建設，甚至是自然環境、政治制度等方向來探討的。由於內生成長理論發展未臻完全，部分需要的衡量方式很難量化，在本節中便選擇幾個較易著手的指標做探討，主要分為生活質量、知識傳播以及知識創新三部分。

（一）生活質量

生活質量的評價方式主要透過醫療服務水準來觀察。相關的研究也指出，一國人民的健康狀態與經濟發展之間為正向相關，而且經濟越發達的國家也會著重醫療、國民營養的投資；¹³⁵因此可以觀察到，已開發國家國民的平均期望壽命大約七十五歲以上，尤其日本更高達八十一點六歲，而中國大陸為七十點七歲。¹³⁶

1. 醫療服務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大陸的衛生機構人員以及床位數量呈現緩慢的成長；其中每一千人口所能分配到的衛生機構人員，由一九七八年的三點二三人，微幅成長到二〇〇二年為止的四點零八人。而每一千人口能夠分配到的床位數量則由二點一二個，增為二點四四個（表 3-13）。由於醫療服務人員需要長時間的培養，不可能在短期間內驟升；而床位數量的增幅也必須配合醫療人員的數量。因此，雖然中國大陸的醫療服務提升幅度很小，卻也繼續保持著成長狀態，慢慢突顯衛生醫療的重要性。

將焦點轉移到農村地區，根據二〇〇二年的統計資料，平均每千人擁有的醫療衛生人員大約是一點八人；¹³⁷而每千人擁有的鄉鎮生院機構床位數僅有零點七四張，這些數字皆低於全國平均許多。在相關農村調查中指出，農戶的健

¹³⁵ Malcolm Gillis, Dwight H. Perkins, Michael Romer, and Donald R. S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272-276.

¹³⁶ World Bank Data Base, 2002.

¹³⁷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3 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三），頁五二。

康狀況與農村的醫療現況是令人擔憂的，而生病時無法即時就醫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佔了百分之六十五點八；其次是因為醫院太遠，佔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七。¹³⁸

表 3-13、全國衛生醫療服務概況表

年份	衛生機構數	衛生機構人員數 (萬人)	衛生機構床位數 (萬張)	每千人衛生 機構人員(人)	每千人床位數(?)
1978	169732	310.6	204.2	3.23	2.12
1980	180553	353.5	218.4	3.58	2.21
1985	200866	431.3	248.7	4.07	2.35
1989	206724	478.7	286.7	4.25	2.54
1990	208734	490.6	292.5	4.29	2.56
1991	209036	502.5	299.2	4.34	2.58
1992	204787	514	304.9	4.39	2.6
1993	193586	521.5	309.9	4.4	2.61
1994	191742	530.7	313.4	4.43	2.61
1995	190057	537.3	314.1	4.44	2.59
1996	322566	541.9	310	4.43	2.53
1997	315033	551.6	313.5	4.46	2.54
1998	314097	553.6	314.3	4.44	2.52
1999	310996	557	315.9	4.43	2.51
2000	324771	559.1	317.7	4.41	2.51
2001	330348	558.4	320.1	4.38	2.51
2002	306038	523.8	313.6	4.08	2.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表 3-14、二 二年農村地區衛生醫療概況表

二 二年各地區農村鄉鎮衛生院機構及床位、人員數				
衛生機構數(個)	床位數(張)	衛生人員數(人)	每千農業人口床位 (張)	每千農業人口衛生 人員(人)
44992	671295	1065276	0.74	1.18
二 二年各地區村衛生室及人員數				
村衛生室數(個)	設置衛生室的村佔 總村數(%)	鄉村醫生和衛生人員(人)	每千農業人口鄉村醫生和衛 生人員(人)	
698966	89.7	1290595	1.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二 三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¹³⁸ 同前註，頁三二。

除此之外，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情形也受到關切。如日常飲用水，有百分之五十一點七的農戶可以使用自來水以及深井水，但卻有百分之十五點四的農戶生活在飲用水水源污染地區，而有百分之十九點八的農戶取得飲用水有困難。農村地區也有一些流行傳染病，如肺結核、B 型肝炎、地方性氟中毒、愛滋病、血吸蟲病等，除了顯示公共衛生建設的落後，農村居民的衛生常識也不足。還有，衛生機構的基本設備條件不佳、醫護衛生人員素質低，甚至還有百分之十三點二的醫療點沒有血壓計，而有百分之四十點五沒有消毒鍋；而擁有本科以上學歷的衛生醫護人員只佔百分之一點四。¹³⁹

2. 嬰兒存活率

嬰兒存活率的計算是以一減掉嬰兒死亡率，這裡的嬰兒是指一歲以下，而新生兒是甫出生的嬰兒。比較中國大陸城鄉的嬰兒死亡率，兩者皆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在二〇〇一年的資料中，農村的嬰兒死亡率為千分之三十三點八，遠高於城市的千分之十三點六；再比較五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農村為千分之四十點四，城市為千分之十六點三，兩者的差距更加拉大（表 3-15）。

表 3-15、中國大陸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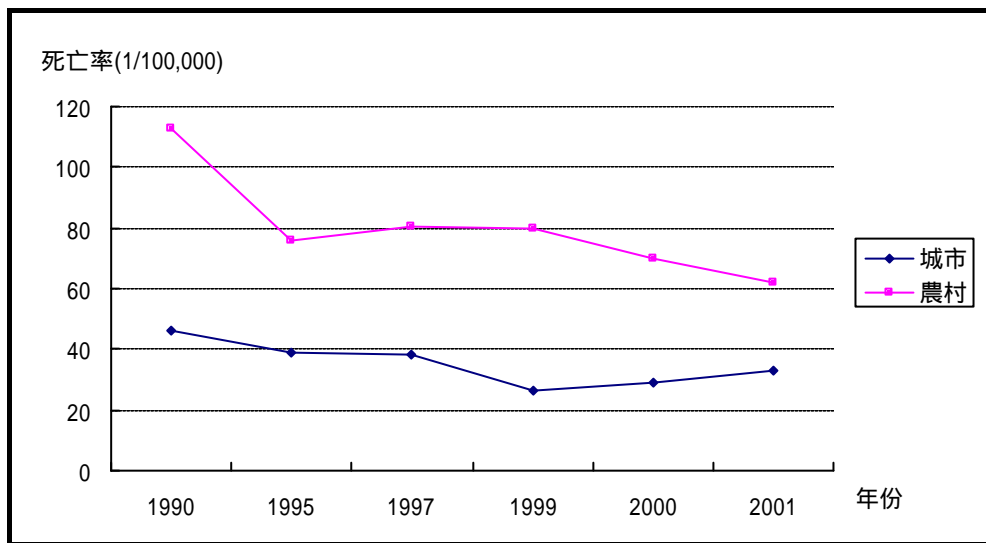
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年份	1991	1995	1997	1999	2000	2001
全國新生兒死亡率(%)	33.1	27.3	N/A	22.2	22.8	21.4
全國嬰兒死亡率(%)	50.2	36.4	33.1	33.3	32.2	30
全國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61	44.5	42.3	41.4	39.7	35.9
城市						
新生兒死亡率(%)	12.5	10.6	N/A	9.5	9.5	10.6
城市嬰兒死亡率(%)	17.3	14.2	13.1	11.9	11.8	13.6
城市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20.9	16.4	15.5	14.3	13.8	16.3
農村						
新生兒死亡率(%)	37.9	31.1	N/A	25.1	25.8	23.9
鄉村嬰兒死亡率(%)	58	41.6	37.7	38.2	37	33.8
鄉村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71.1	51.1	48.5	47.7	45.7	4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二〇〇一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¹³⁹ 同前註，頁五四至五五。

嬰兒及兒童死亡率有這麼大的差距，顯示了農村衛生醫療設備與城市之間的落差；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農村婦女住院分娩的比例不高、也沒有產前檢查的醫療行為，這也連帶牽動了婦女？娠的死亡率。農村地區的婦女？娠死亡率也是高於城市的情況，二〇〇一年的農村婦女人人死亡率為十萬分之六十一點九，而城市為十萬分之三十三點一（圖 3-22）。

圖 3-22、城鄉婦女？娠死亡率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二〇〇三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除此之外，兒童的健康狀況調查也出現令人擔憂的情形。二〇〇一年的中國食物營養監測數據顯示，農村五歲以下兒童體重不足的比率為百分之十三點八，城市只有百分之三；同年關於五歲以下兒童成長遲緩的數據，農村有百分之二十點三，而城市僅有百分之二點九。¹⁴⁰兒童是未來市場的勞動力來源，也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主力，有關於兒童的健康、營養甚至教育、生活環境的品質，早已經受到高度發展國家的重視；中國大陸政府也漸漸注意到相關問題，但農村幅員過於廣大、投入的資金數量不多，這些都考驗著未來農村生活品質及經濟發展的能量。

¹⁴⁰ 同前註，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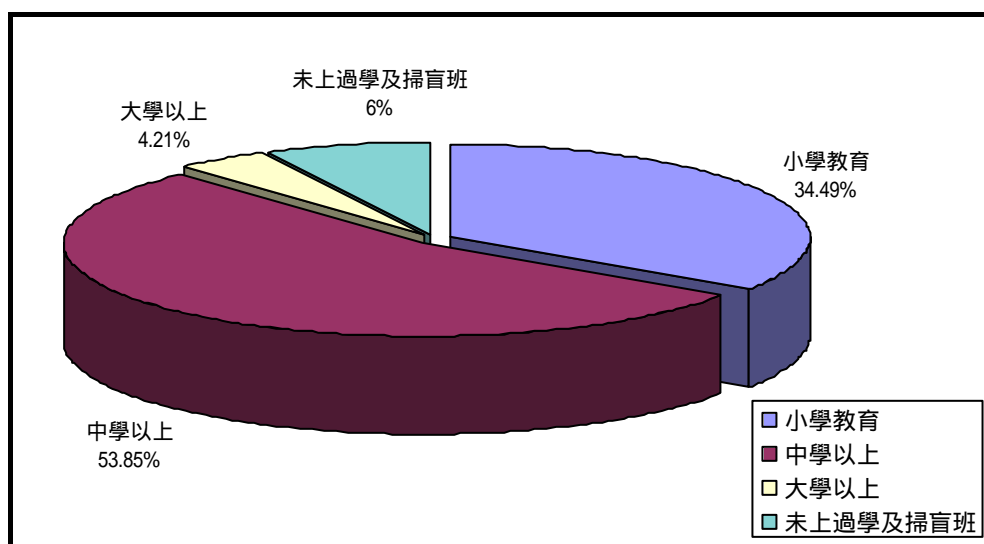
(二) 知識傳播

1. 教育程度

在經濟學上有關教育程度與所得收入的研究文獻相當多。就總體層面來說，教育可以提升勞動力的素質。在農業社會，耕作技巧可以依賴代代相傳的方式傳播；進入工業化時代，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與科技密集型產業，所需的人力素質及專業自然又不相同；在服務業中，賺取的是對「人」服務的附加價值。經濟學家原本著重「文盲」比率與國家發展的關係，但發展中國家很容易以基礎教育的方式掃除文盲，這樣的實際情況使得學界開始尋求新的研究指標；有學者以「大學畢業」的比例、或是對「新文盲」從事定義。

教育程度顯示在勞動力上的訊號是：學習能力、組織能力、創新能力。因此，一個國家在做長期的經濟發展規劃時，便會針對教育部門從事科系、數量的調整，以免於未來國家產業轉型時產生人力資源需求供給之間的落差。

圖 3-23、二 年中國大陸教育人口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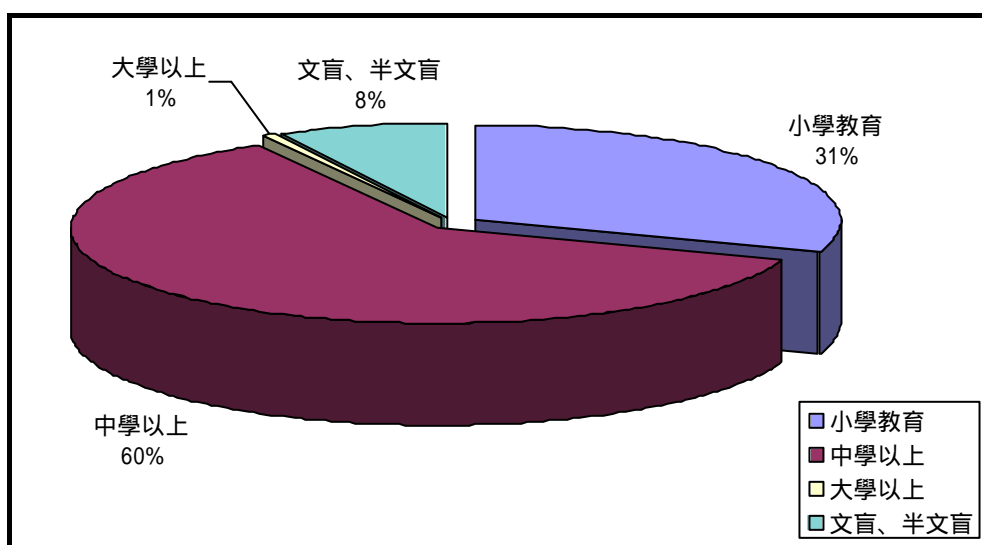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二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

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大陸目前仍有百分之六的人口沒有上過小學，而受過小學與中學教育的比重分別為百分之三十四點四九、及百分之

五十三點八五，為全人口最主要的教育水準；而大學以上的人口僅有百分之四點二一（圖 3-23）。以市場結構來說，中國大陸還是以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最具優勢，著重在機械化、重複性的動作程序；也由於中小學人口比例極高，而且教育的培植期間很長，總體經濟結構要短期內轉型並不容易，必須再培養更多高教育水準的人才。

農村的勞動力教育情況與全國比重相差不多，只是大學以上教育比例更低，僅佔百分之一；而文盲及半文盲數量略高，為百分之八（圖 3-24）。但在勞動力結構中，有百分之五十三點二七為男性；而農村的男性教育程度普遍高於女性，其中文盲或半文盲的從業人員中就有百分之七十一為女性，而受過高中或高中以上教育的女性從業人員只佔了不到百分之二十。¹⁴¹因此，農村勞動力教育程度的調查結果背後，其實還隱藏著性別歧視的社會問題，無法顯示出真正的農村教育狀況。

圖 3-24、二 年全國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全國農村住戶調查

根據二 四年中國鄉鎮企業年鑒的統計，鄉鎮企業職工中具有中專與技

¹⁴¹ 同前註，頁三三。

校教育程度的數量有九百三十八萬一千六百六十二人，佔總從業人員的百分之七點零六；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職工有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一百六十八人，佔總從業人員的百分之三點三。¹⁴²鄉鎮企業的職工教育分佈狀態大致與農村相同，多是中學小學以下教育水準的從業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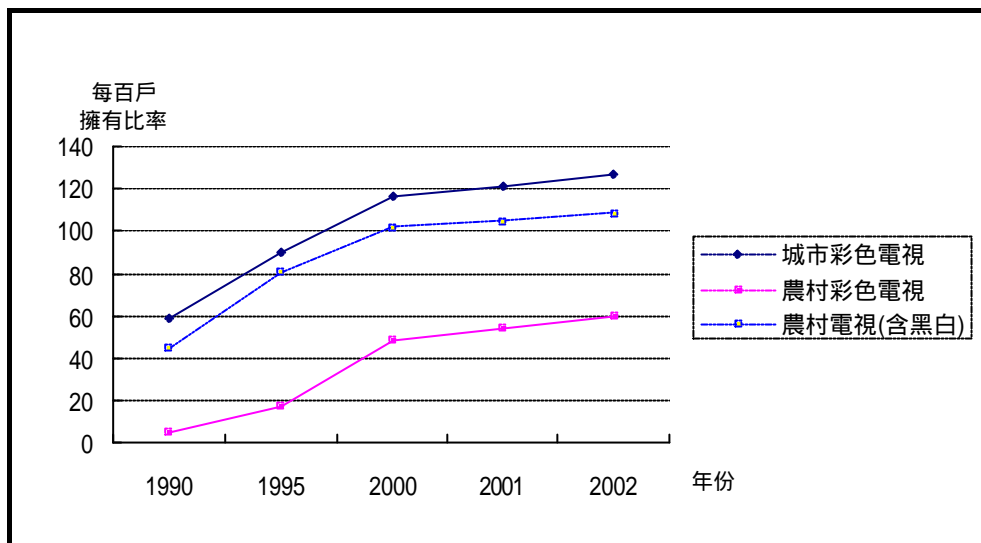
2. 電視與網路普及率

電視機與網路的普及率代表著資訊傳播的管道，擁有者可以最快速的獲得大量的訊息；這也是評估現代化程度的指標之一。由於電視的發展早於電腦及網路，一般開發中國家較著重在電視的普及率；而且電腦的使用必須具備一定的教育程度，網路的鋪設也得耗費龐大的財政支出，比較適合用在評估已開發國家的狀況。

中國大陸城市地區的電視機普及率已由一九九〇年每百戶五十九台，增加到二〇〇二年的二百二十六台；一般的電視機普及率是針對彩色電視機做統計，不過大陸農村比較特殊，雖然彩色電視機的普及率遠低於城市地區，每百戶擁有六十台；但是在計入黑白電視的普及數，就達到一百零九台（圖 3-25）。顯示出城鄉間的電視普及率相差不大，並且保持持續成長。另一方面，黑白電視佔的比重約有四成五，說明了農村居民對高價位消費財的更新速度緩慢，城市與鄉村之間還是存在著一段所得差距。在電視節目的接收率方面，二〇〇二年農村中已經有百分之九十八點四的村可以接受到電視節目；但還是有百分之八點六的農戶沒有電視機。

¹⁴²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圖 3-25、中國大陸城鄉電視機普及率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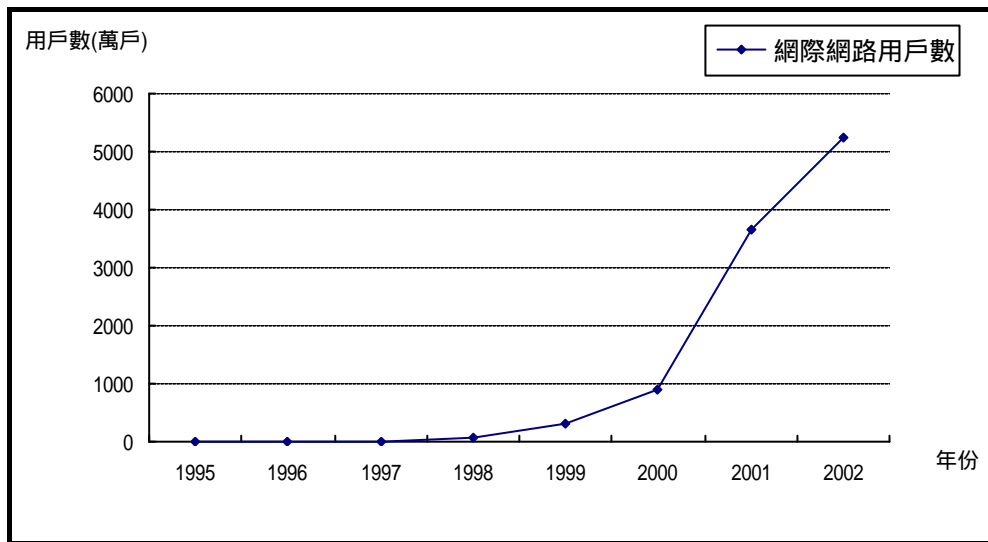
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用戶才大幅攀升，一九九五年時僅有七千二百一十三戶使用，二〇〇一年達到九百零二萬戶，到了二〇〇二年網際網路用戶已有五千二百五十四萬戶之多（圖 3-26）；從以上數據很難辨讀網際網路的普及率，而用戶數中也沒有將商業、一般、學術用戶做較清楚的分類，只能了解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用戶數持續成長的趨勢。

在有關農村地區網路發展的文獻中，指出農業與農村的資訊化尚處於起步階段。根據二〇〇一年中國戶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報告，在行業的分佈上，農林漁牧業上網用戶是僅佔總用戶數的百分之一點五；而在職業的分佈上，接觸網路的農林漁牧工作人員僅佔百分之一點二；¹⁴³也就是說，有絕大多數的涉農人員還沒接觸到網路。農村網路的普及性受到許多因素的侷限：首先是農民的教育水準較低，無法使用網路資源；以及網路本身鋪設成本高，難以普及化；另外，農業的產業化程度不高，很難提高農民對網路的需求。

¹⁴³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3 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三），頁五八。

以美國為例，百分之四十一點六的家庭農場、百分之四十六點八的牧場，及百分之五十二的年輕牧場經營者都有電腦及網路的設備，並且透過相關的農業網站銷售農牧產品，利用網路營造一種新型態的銷售方式。但中國大陸情況卻不然，網際網路用戶的增長與使用大多是在城市地區，城市的網路普及率是農村的七百四十倍；¹⁴⁴而且，中國大陸的電子商務市場仍處於萌芽階段，要利用網路來促進農業產業化還是一條漫漫長路。

圖 3-26、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用戶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三) 知識創新

研究發展經費的投入比重是最常用來評估該經濟體提供知識創新的空間，不同於勞動力、資金、土地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研究發展經費的投入與知識創新程度是無法用投入產出比、或是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來量化的。由於知識創新本身的不可預期性、無法按照計畫與時間表來「製造」出經費投入者想要的「產品」；唯有透過不斷的學習、知識交流才有「可能」產生知識創新。而經濟體本身可以做的，就是提供研究人員足夠的時間、空間、資金來促進新知識

¹⁴⁴ 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四七。

的產生。

既然投入大量經費，又不一定有新知識的產生，為何知識創新這麼重要？由於知識本身具有相當的外部性效果，無論是基礎科學或是市場性的研發，透過傳播網路、市場網路將新知識迅速擴散與商品化，短期內便能創造高度的效益，或甚至改變整個產業結構。以美國新經濟為例，以網路科技為基礎的知識創新，帶動了網路經濟的發展，是知識經濟的最佳典範，為美國帶來了十年沒有通貨膨脹壓力的經濟成長歲月。¹⁴⁵

就中國大陸國家研究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自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一點四六，期間的比重波動幅度很小，到二〇〇二年的百分之零點七八（表 3-16）。由於知識本身具有強大的外部性效果，尤其是基礎科學的研究，這種類似公公財性質的「產品」，最適合由公部門「政府」來提供，並引導私部門投入研究發展領域，才能發揮最大的知識經濟效益。

由於國家對研究發展經費的投入比重不高，也難以誘發私部門從事研發工作。因此在研究貢獻上，多以學校等學術機構為主，政府的研究機構貢獻比率只展百分之二十一，而企業貢獻度則更小，只佔百分之七點二。¹⁴⁶另外，在鄉鎮企業相關資料方面，有關研究發展的相關數據文獻很缺乏，根據鄉鎮企業統計年鑒的資料顯示，二〇〇二年全國二千一百三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個鄉鎮企業，所建立的技術創新中心及研發機構數為四萬六千三百二十八個，平均每四百六十個企業才有一個研發單位；足見研究發展與知識創新的概念，並未受到農村與鄉鎮企業普遍的重視。

¹⁴⁵ 關於美國新經濟網路產業的興盛，學界有相當多的爭論；但大多肯定知識創新的貢獻。

¹⁴⁶ 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六九至一七〇。

表 3-16、國家科學研究經費支出表

年份	國內生產總值（億元）	國家科學研究經費支出（億元）	科學研究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
1978	3624.1	52.89	1.46
1980	4517.8	64.59	1.43
1985	8964.4	102.59	1.14
1989	16909.2	127.87	0.76
1990	18547.9	139.12	0.75
1991	21617.8	160.69	0.74
1992	26638.1	189.26	0.71
1993	34634.4	225.61	0.65
1994	46759.4	268.25	0.57
1995	58478.1	302.36	0.52
1996	67884.6	348.63	0.51
1997	74462.6	408.86	0.55
1998	78345.2	438.6	0.56
1999	82067.5	543.85	0.66
2000	89468.1	575.62	0.64
2001	97314.8	703.26	0.72
2002	104790.6	816.22	0.7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第五節 小結

中國大陸目前仍有廣大的農村人口，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聚集效應使得國家資源的分配、外來資金的投入都著重在城市地區的發展；而鄉鎮企業在農村的興起，進一步帶動了農村工業化，巧妙的平衡了城鄉之間傾斜發展的現象，也減緩了城市化過程中所帶來的龐大人口、以及基礎建設的壓力。並且，中國大陸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在改革開放後才漸漸減淡，隨之而來的市場化改變了計畫經濟下的城鄉關係，城市與鄉村建立起商業的、經濟的新互動模式；農村的發展與鄉鎮企業息息相關，企業投入地方辦學、社會福利、管理經費，農村提供充沛的勞動力、集體資金的投入幫助企業發展。鄉鎮企業的發展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現代化，扮演著獨特、又舉足輕重的角色。

鄉鎮企業對於中國大陸工業部門的發展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由其工業部門增加值與從業人員佔全國的比重、以及高於全國平均的生產效率；除此之外，鄉鎮企業的發展一開始便以工業為主軸，更是農村地區工業化的重心。這些研究結果都顯示，鄉鎮企業提供了農村大量的就業機會、創造了快速增長的增加值，促進了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的成長，更推動了全國以及鄉村地區的工業化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私營企業、三資企業以及個體企業也開始與國有企業爭食市場大餅；國有企業本身沉重的社會主義包袱，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也迫切的尋求改革。以往國家都是透過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干預，但現今國有部門的經營效率不佳，國家透過企業干預市場的機制弱化，使得市場有越來越自由化的趨勢。而農村中又有不同的風貌，鄉鎮企業源於集體形式的創設，不屬於國有資產，中央對企業的干預原本就比較少，再加上一九九〇年代後的私營、個體企業比重增加，農村反而有較高的經濟自由。非國有部門的比重漸漸提升，除了歸功於三資企業、私營以及個體企業的成長之外，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佔全國非國有部門從業人員比重很高，也可以說是促進非國有部門發展的重要動力。

有關產權結構的移轉，可以根據 Fei-Ling Wang 的勞動力分配模式來分析：國有部門的從業人員屬於權威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國有企業從業人員佔全國從業人員的比重逐年下降，顯示了權威型勞動力分配模式的弱化；同時，私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代表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個體戶為主體的家庭基礎的勞動力分配模式，都與權威型勞動力分配模式反向的逐年擴張。而鄉鎮企業是混合著社區型的勞動力分配模式、勞動力市場、以及家庭基礎的勞動力分配模式，這三種勞動力分配模式在鄉鎮企業下互有結合、互有消長，也屬於非國有部門下的勞動力結構。代表國有部門的權威型勞動力分配模式，是受到較多國家控制、

生產較無效率的部門；因此，權威型勞動力模式的弱化也顯示了國家控制減小、市場朝向自由化、效率化的發展趨勢。

在二部門剩餘勞動力模型中，發展中國家往往具有廣大的農村人口，以及剛開始萌芽的城市工業，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廣佈在農村裡的隱藏性未充分就業勞動力就會開始往工業部門移動，並且連帶引發資源的移轉與聚集；原本互動不多的城市與農村，便藉由勞動力、資源、商品的流通而開始產生緊密的關係。而中國大陸的情況又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大陸以往的城鄉部門聯繫是透過計畫方式運作的，無論是城市中的工業部門、或是農村中的農業部門，全都依賴中央規劃、中央分配、以及中央管制，市場機制完全不存在；改革開放象徵著去除城鄉間的藩籬，農村勞動力得以進入城市工作，開啟了城市與鄉村間的市場性關係。

改革開放前的社隊企業是今日鄉鎮企業的前身，其發展也要歸功於計畫經濟的城鄉隔離：農村居民不能任意進入城市部門工作，而被允許發展的社隊企業雇用了當地勞動力，從事農村的工業化。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之前並沒有嚴密的城鄉隔離，人員、商品、要素仍然能自由流通，只是工業化後流通的速度及數量快速往城市地區增加，也因為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並沒有發展出類似的農村工業。

鄉鎮企業的興起對於二元經濟轉變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農村內的影響，二是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影響。鄉鎮企業以第二、第三部門為主，大多雇用本地的勞動人口，減少了農村地區部份的隱藏性未充分就業勞動力，使農村非農化程度提高。另外一方面，鄉鎮企業除了提供工資給這些從業員工，部分營業收益會由地方政府再加利用，促進農村地區的建設、教育以及福利工作，形成農村中農業與工業部門共榮的景象。在農村工業化過程中，加上政府引導「鎮」的設立，城市化現象也發生在農村裡；可以說鄉鎮企業促進「鎮」

的城市化，並且城市化的聚集經濟效益同時幫助企業的成長。

城市中的預期收入是吸引農村勞動力遷移的誘因，這些農村勞動力的流入造成了城市中勞動力市場的區隔情況，他們大多是從事較低層次的工作、福利保障、薪資配給、甚至居住環境都不如城市職工；由於中國大陸戶籍制的關係，這些流動的勞動力進入城市，只是為了賺取工資，而不是為了在城市中定居。因此，中國大陸外出農民工將工資匯回原住地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國家，這些匯回的工資也能夠實質的提升家庭生活。¹⁴⁷流動的勞動力不僅促進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也間接的改善農村的生活水準。除了勞動力改變城鄉關係之外，城市生產的消費財與農村的農產品得以自由流通，提高了城鄉的消費福利；鄉鎮企業與城市中的國有企業或其他非國有企業進行橫向的商業合作關係，更加緊密了城鄉之間的互動。

無論是城市與鄉村、或是鄉村內部的發展，彼此的互動關係已經由計畫管道轉為市場網絡。透過鄉鎮企業的運作，農村中的各級產業可以共榮發展；鄉鎮企業也開始吸引了城市勞動力投入，並且透過企業間的橫向聯合使城市與農村的發展更具整體化。

新成長理論將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以及私部門的創新研發能力視為經濟成的因子。著重對於「人」本身的提升，如營養、教育、健康，透過學校、在職訓練、或是改善生活水準的方式；私部門的創新研發能力顯示將基礎科學創新市場化、商品化的程度越高，學者也贊成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的觀點可以提升研發能力。¹⁴⁸已經有許多相關的研究驗證了這些內生因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緊密關聯性。有更甚者，還將政治制度、自然環境、文化背景、社

¹⁴⁷ 蔡昉、都陽、王美艷，*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二七六至二七八。

¹⁴⁸ Andrew B. Abel and Ben S. Bernanke, *Macroeconomics*, 3rd ed.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8), 207-208.

會秩序等納入研究，提出永續成長的概念。此外，在現代化理論的發展中，將生活水準的提高、知識創新等指標歸納為更深層的經濟現代化條件。¹⁴⁹

由於鄉鎮企業的勞動力雇用多是當地農村的勞動力人口，而在本章第四節中相關的數據研究發現：農村地區的醫療資源、衛生設備補偏缺乏，醫療品質也不佳，嬰兒及兒童的存活率偏低，兒童的成長狀況遲緩情形與城市地區相比嚴重許多；而在教育方面，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比例還很小，教育年限也有男女之分、職工雇用也以男性為多；電視普及率是內升成長指標中表現較佳的，但網際網路的普及率就顯的貧乏許多；至於在研究創新方面的發展，由於政府本身投入的經費比例很小，難以帶動私部門的投入，而目前多屬於勞動力密集型工業的鄉鎮企業，似乎也不注重知識創新的高附加價值。

鄉鎮企業在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工業化、產權結構的轉變、以及二元經濟轉為一元經濟等方面的貢獻程度與比重很高，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中國大陸廣大的農村人口，在資源大量投入城市地區時，鄉鎮企業在農村中發展起來，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提高所得、並建設農村公共設施等，反而使農村成為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的穩定因子。但在深層經濟現代化條件中，雖然鄉鎮企業對當地的公共衛生、教育辦學、社會福利有相當貢獻，但鄉鎮企業與農村的表現對於未來的人力資本素質、研究發展能力確實令人感到憂心。這些內生性經濟成長因子沒有繼續加以提升，對於未來的鄉鎮企業、農村經濟，甚至是全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可能在到達一定水準後停滯不前，這也是目前許多新興工業國家（NIC）所遭遇到的問題。

¹⁴⁹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4—地區現代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七一。

第四章 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

在本章中主要透過對鄉鎮企業本身結構分析，以及地方政府、黨對鄉鎮企業發展的影響因素，來支持鄉鎮企業在經濟現代化上的成就。這種具有中國大陸地方性色彩、延續人民公社時期集體主義的意識的企業形式，在經濟改革後能為農區地區創造龐大的財政收益，並且也是促進農村工業化的主要動力，這些成就都與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有密切關聯。

首先，由地方分權的概念娓娓道來，說明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改革前後的轉變，而引起學界開始注意到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並且透過 Jean C. Oi 的地方政府組合主義、所有權轉制的實際情況，來了解黨、企業、地方政府間的交互關係；輔以個體與總體的案例來支持理論的闡述。最後，中國大陸的村民選舉實際上是黨、企業、社區的彼此掛勾，並由此來觀察中國大陸是否藉由經濟現代化推進到政治現代化，民主的種子是否在農村地區發芽茁壯。

第一節 中央地方關係的轉變

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帶來高度的經濟成長，而這亮麗成就背後是一連串的財政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吸引外資政策、西部大開發等經濟效益導向的政策，同時也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央背負著全國建設的重擔、國有企業虧損的包袱、金融問題、社會福利問題，只好將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地方，由地方自主從事經濟發展，以舒緩中央財政壓力。

地方分權的概念迅速擴展到行政最基層的單位，甚至到非正式政府機構「村」。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網絡轉變為經濟網絡，體現了「地方組合政府」的運作模式；並且，由於地方分權的趨勢，社會結構的中間層級開始受到重視，

企業或政府不在是黨或中央的代理人，而是擁有自主能力、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者。因此，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分析途徑方面，也不斷受到學界的修正，開始重視地方政府、企業資本家的影響力；對於農村經濟的運作結構，可用來解釋鄉鎮企業經營者、政府官員、民眾以及黨的交互作用。

（一）地方分權（decentralization）

中國大陸地方分權的開始，可以追溯到改革之前的三線工程。除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的圍堵之外，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更逢中蘇關係交惡，中國大陸切斷了來自前蘇聯的經濟援助，以戰略為考量，將資源建設集中於「防禦性工業」並且移往內地，利用內陸豐富的原料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著重在國防、軍火及重工業的發展。¹⁵⁰三線工程的開展，配合「自力更生」（self-reliance）的口號，中央提供補助鼓勵地方設立工廠，將政策由中央迅速拓展至地方，頓時大大小小的三線工程在各地興起，形成一種封閉的細胞結構（cellular structure）。

由於毛澤東將資金設備集中在內陸地區，但資源位置地處偏遠、缺乏基本建設；並且各地的三線工程有嚴重的重複配置現象，缺乏經濟效益；而重點是發展軍火以及重工業，這些都無法有效的帶動當地經濟與公共建設的發展。由於政策忽略「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結果，造成投入資金的浪費，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用在正確的投資項目上。¹⁵¹

三線工程對中國大陸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無論是從事國有企業改革，或是區域經濟規劃、外商投資優惠政策等，都必須考慮到以往三線工程資源配置錯誤的轉變方向。另外一方面，與三線工程同生的「自力更

¹⁵⁰ Dali L. Yang, *Beyond Beijing: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egions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6-26.

¹⁵¹ *Ibid.*, 23.

生」的影響力也持續到今日，為「地方分權」的前身。

當時的自力更生是中央將部份權力下放到地方，但仍以中央計畫為指揮核心。在城市地區是透過國有企業部門，全面進行三線工程建設；而在農村地區則透過人民公社制度，落實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一九五八年實施的人民公社制度，實際上是農村基層單位的黨政合一，加深了農民對黨的依賴關係，不但在經濟上是農業合作社、也是農村的基層政權組織；¹⁵²由於當時中國大陸外敵環伺，公社體制也被建設成為「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運作模式。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中國大陸的地方基層組織也學會了在封閉體系中發展生存的能力。

一九七八年後，地方分權的態勢逐漸浮現。中央將經濟自主的權力下放給地方，一改過去自力更生由中央計畫的經濟模式，而由「宏觀調控」方式取而代之；中央對於地方控制力減弱，而地方自主性提升，並且開始重視地方利益。¹⁵³改革開放以來，各省開始擁有經濟的自主權，從商品價格放寬、開放外匯經營、稅收留存的政策來看，各省無不汲汲於趕上市場化、國際化的腳步。另一方面，省也不再完全依賴中央的補助，特別是沿海區域；中央控制地方的力量減少、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有新的轉變。¹⁵⁴

雖然諸侯經濟興起、各省的自主權也越來越強大，但要注意到一點：中央實質上只下放經濟決策權，並沒有下放政治的權力給地方。以地方首長為例，大多都是由黨所指派的人選，而往往真正的權力是掌握在「書記」的身上；甚

¹⁵² 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頁二三七至二七七。

¹⁵³ David S. G. Goodman,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in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edited by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5.

¹⁵⁴ David S. G. Goodman,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7), 4-6.

至於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的成員或經營者，都不乏黨幹部及黨員。雖然監督機制不如以往嚴密，但仍然可以看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仍然很嚴格。¹⁵⁵

另外，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威是不可被挑戰的，尤其各省的經濟發展情況各不相同，而地方利益也不盡相同。舉個簡單的例子：貧窮省份需要中央更多的補貼與資金、富有省份希望中央減少上繳稅收比例，有的省份為了保護其幼稚產業發展廣設貿易障礙、有的省份卻追求全國性行銷網絡的建立。¹⁵⁶因此，基於以上原因，再加上中國大陸民眾的層次性認同：由個人出生地延伸至縣或地區，再擴及省級層次到國家。¹⁵⁷經濟改革後，雖然地方分權的趨勢明顯化，但並沒有跡象顯示出中國大陸會出現政治分裂的情況。

改革開放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可以從財政改革的角度來探討。一九八十年代初期，中央引進契約責任體系，各省與中央簽訂契約，明定上繳的稅額、並且超過規定的稅收地方可以留成運用，以提升地方從事經濟發展的誘因。直到一九九四年，分稅制（tax-sharing system）的正式引進取代了契約責任制，中央與地方可以按照「?種」的特點，劃分各自收入和管理的權限。¹⁵⁸地方可以分別與中央就上繳稅額、所屬?種、分稅比例，或是資源分配、財政預算等進行協調，使中央與地方關係形成一種討價還價的、協商的、遊說的、交換互惠的互動形式。

¹⁵⁵ David S. G. Goodman,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in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edited by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4.

¹⁵⁶ Hans Hendrichske, "Provinces in Competition: Regi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truc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ited by Hans Hendrichske and Feng Chongyi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4-20.

¹⁵⁷ David S. G. Goodman,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7), 6.

¹⁵⁸ Si-ming Li,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Issue," in *China in Transition: Issue & Policies*, edited by David C. B. Teather and Herbert S. Ye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144-147.

在省層級以下的地方單位也同樣受到財政改革的影響。財政改革授與縣及鎮政府對收入的使用權，¹⁵⁹成為這些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主要誘因。在地方政府的收入部份，可以分為預算內以及預算外收入兩部分：在計畫經濟時期，預算外收入是極小的，並且會受到上級的控制。而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預算外資金是促使地方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這顯示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地方可保留的資金大幅成長，並且減輕了來自於中央的上繳壓力；二〇〇〇年全國預算外收入，地方政府所佔的比重就高達百分之九十三點五，較資料起始的一九八五年成長許多（表 4-1）。相對應的一方面，這也說明了地方各級集體鄉鎮企業為何會有這麼多需支付的「非？」款項。¹⁶⁰

表 4-1、中央與地方預算外收入比較表

年份	全國（億元）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1985	1530.03	636.1	893.93	41.6	58.4
1986	1737.31	716.63	1020.68	41.2	58.8
1987	2028.8	828.03	1200.77	40.8	59.2
1988	2360.77	907.15	1453.62	38.4	61.6
1989	2658.83	1072.28	1586.55	40.3	59.7
1990	2708.64	1073.28	1635.36	39.6	60.4
1991	3243.3	1381.1	1862.2	42.6	57.4
1992	3854.92	1707.73	2147.19	44.3	55.7
1993	1432.54	245.9	1186.64	17.2	82.8
1994	1862.53	283.32	1579.21	15.2	84.8
1995	2406.5	317.57	2088.93	13.2	86.8
1996	3893.34	947.66	2945.68	24.3	75.7
1997	2826	145.08	2680.92	5.1	94.9
1998	3082.29	164.15	2918.14	5.3	94.7
1999	3385.17	230.45	3154.72	6.8	93.2
2000	3826.43	247.63	3578.79	6.5	9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縣與鎮政府預算外資金來源包含了地方財政部門的收入、未被計入制度內

¹⁵⁹ 這裡的收入是指「剩餘」(residual)：是一種經濟上的盈餘，地方政府可以在繳納給上級政府一定額度之外，另外保留這些剩餘，並且擁有處置這些剩餘的權利。

¹⁶⁰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8-42.

及行政單位內預算內的資金、國有企業與指導機構的特殊資金，以及地方所有企業收入，和未被計入預算內資金的中央部門收入；除此之外，地方稅收也是地方政府可支配資金的重要來源；或甚至是直接提取獲利較高企業的利潤，以滿足地方的收入。地方也設有經濟委員會，其資金來源是在課稅或交租之前，先從企業的毛利中依規定扣取額度。¹⁶¹在正式行政層級之外的「村」，對於上級縣、鄉、鎮政府沒有直接的收入分享與預算分配的關係，支出收入都可由村自己處理；但村辦企業的稅收卻得全額轉入上層地方政府，村並無權保留。

透過稅收與剩餘層層上繳的機制，層級越下層的地方政府就有越強的經濟發展誘因。這種多層級的地方政府模式，各個層級都自成系統的獨立運作，並且也有各自的組織利益、以及資源掌控，整個體系的關係網絡是經濟導向、企業經營型態的；Jean C. Oi將這種地方組合政府視為一個大型財團，共同目標為追求農村經濟與工業的成長，頂端的縣政府為財團的指揮總部，鄉鎮政府為區域性指揮部門，村則為財團的子公司（圖 4-1）。¹⁶²

地方分權化的結果相對削減了中央對於地方全面性的控制能力，但中央下放的權利也只限於「經濟自主」的部分；各省都在追求自身的經濟發展，極大化可以留用的稅收、及預算外資金額度，並且與中央協議上繳比率，因而形成一種新、非計畫型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胡鞍鋼對地方幹部的調查顯示：地方政府的目標是多樣化的，但以追求本級政府財政收入、經濟產出最大化為最主要目標。¹⁶³由於各省追求本身的利益極大，這種地方分權的模式也延伸到省級以下的行政階層，縣、鄉鎮、及非正式政府層級的村，以垂直的行政關係轉化為經濟關係，形成「地方組合政府」的概念；三個層級也非別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利用政府特有的行政資源辦起集體所有形式的鄉鎮企業，共同目標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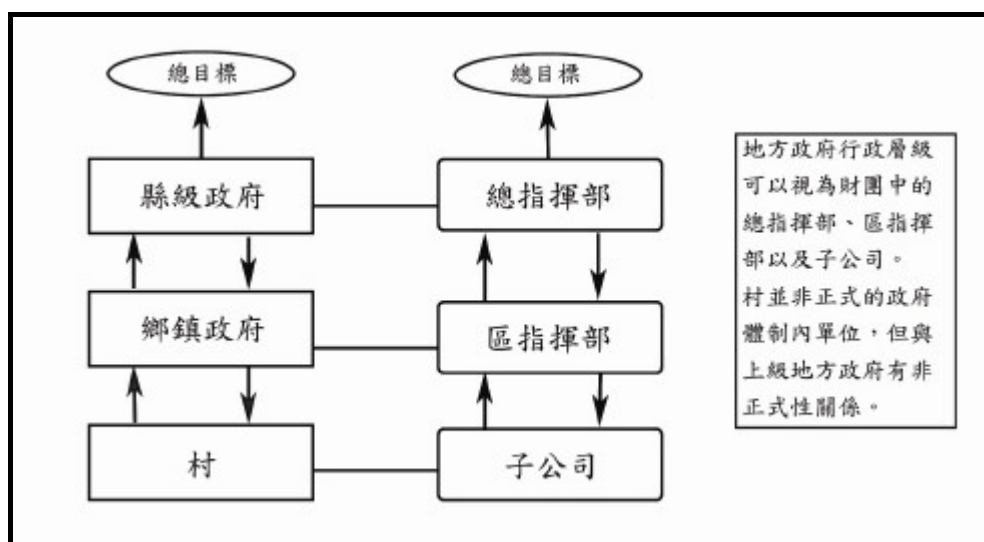
¹⁶¹ *Ibid.*, 42-48.

¹⁶² *Ibid.*, 99.

¹⁶³ 胡鞍鋼，*中國發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一二六至一二七。

創造農村經濟的繁榮、促進農村工業化。地方分權透過行政關係的連結，上至中央、下至省區內的縣、鄉鎮、村，造就了一種新的全國性經濟網絡。

圖 4-1、地方組合政府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理論的轉變

在本文第二章第四節中曾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相關理論做介紹；由於國家中心或社會中心的分析途徑，容易造成國家與社會概念上的二元對立，如國家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等相對的概念。¹⁶⁴但就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來觀察，兩者之間並不完全是對立的角度，而是存在協商合作、互惠交換的模式。

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發展演變有其獨特性存在。首先是國家與社會在某些領域是走向分化，而某些領域則走向結合重疊；而西方國家則不然，其公民社會的形成是由於國家與社會的分化結果。其次，在研究國家與社會關係時，通常分別將國家與社會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但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地

¹⁶⁴ 柳金財，「當前中國大陸村民自治研究相關途徑與理論適用之探討」，《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一期（民國九十二年一月）：頁六七。

方分權的結果使得國家與社會各自的組成因子，並不存在著一種統一的關係，以國家體系內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為例，其所追求的利益導向就不相同了。¹⁶⁵因此，在研究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時，必須由二元對立的概念走向關注兩者間的互動關係。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其社會結構是統一且行政上下連接的，國家的力量透過「單位」(unit)制度完全滲透到社會中，甚至取代了社會本身。¹⁶⁶由於毛澤東時期的自力更生政策，下放了部分決策權給地方，農村村落「自治體」具有相當的自主性，結成一種「蜂窩狀的結構」(honeycomb-structure)，¹⁶⁷但仍以貫徹中央政策為中心任務。改革該開放後的中國大陸，以上的國家社會關係模式難以正確描述現存的互動狀態，Jean C. Oi認為現今的中國大陸社會結構「既不是完全分割的，也不是完全統一的，而是經由中介連接國家和社會雙方的結構」。¹⁶⁸

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以計畫經濟的方式控制國家的各種資源，民間不再有掌握與支配資源的力量，社會高度國家化、以及黨政合一的結果使得中國大陸社會結構成為「國家 - 民眾」的兩層結構。隨著經濟改革的腳步前進，中央逐漸釋放出資源的控制，價格體系市場化、勞動力自由流動、地方分權下放經濟自主權，使得以往的「國家 - 民眾」的兩層結構產生轉變，逐漸形成「國家

¹⁶⁵ 社會學研究編輯部，「98 社會學：研究進展狀況與熱點難點問題」，《社會學研究》(北京)，一九九九年第一期：頁一一二。

¹⁶⁶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8-22.

¹⁶⁷ 參考說法：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但 Vivienne Shue 認為中國社會結構是上下分隔的，權力中心實際存在於社會基層。

¹⁶⁸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7.

- 民間統治菁英 - 民眾」的三層結構。¹⁶⁹然而，這三層結構並沒有明確定義國家究竟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三層結構的分析方式經過許多學著的修正，並且引用在不同的研究問題上。如崔之元以「上中下三層」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資本大戶、百姓的互動來觀察民主制度的建立；Kevin J. O'Brien 運用三層分析來說明，國家與農民形成聯盟關係，共同制約中間層的地方幹部其權力濫用與尋租活動；三層分析法也被運用在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眾在村民自治制度形成的決策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除了分析總體的國家、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關係之外，三層結構分析也被用來觀察個體層面的村級政治權力結構運作。¹⁷⁰

以上關於理論與分析方法轉變的相關整理，顯示出在中國大陸新的國家社會關係結構下，中央與地方、地方與下層組織、或是民眾與政府的互動型態改變。透過不斷修正的分析途徑，可以發現地方分權後中間層級的行為逐漸受到研究重視，由兩層結構分析發展為三層結構。這些研究途徑應用在鄉鎮企業的探討上，提供了另一種解釋農村經濟發展的分析方式，透過組織結構層面的互動進行探討，可以在經濟成長的眾多實證數據背後，了解其他非經濟因素的運作方式。

第二節 一九八 與一九九 年代的政企關係

自一九五八年實行人民公社化以來，農村工業的發展一直與農村集體有密切相關，農村工業源自於人民公社初期，最初被稱為公社企業；一九六一年開始在人民公社之下設大隊與生產隊，此後的農村工業就改名為「社隊企業」。而

¹⁶⁹ 柳金財，「當前中國大陸村民自治研究相關途徑與理論適用之探討」，《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一期(民國九十二年一月)：頁六九。

¹⁷⁰ 同前註，頁七 至七一。

這個時期的人民公社和大隊既是經濟單位，也是行政機構。

經濟改革以後，農村集體經濟仍然繼續存活下來。第一種是村或鄉集體為耕地的所有者，農村集體出讓土地、聚集資金，為集體經濟的發展創造初始條件；第二種是村和鄉政權興辦及擁有企業，以鄉鎮企業的收入來支持社區各項發展。因此，農村的基層政權若是沒有興辦鄉鎮企業，就是空有耕地的所有權的「空殼經濟」；反之，興辦獲利良好的鄉鎮企業，農村集體就成了工業集體，鄉和村也因而公司化了。¹⁷¹

鄉鎮企業自源起之初便與基層農村政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以下便首先介紹農村基層政權的組織狀況，再分別闡述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這些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地方行政層級

農村地區的最高行政機關是「縣」人民政府，其下設置「鄉」、「鎮」人民政府，這兩者是中國大陸最基層的行政機關；而在鄉人民政府以下，則有自治形式的「村民委員會」，主要從事村內的公共事務。以下則分別介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權。

1. 縣人民政府

縣人民政府是縣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由縣長與副縣長由縣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每屆任期五年。在職權方面，縣人民政府不能制定行政規章，主要工作重點是農村的管理與調節：第一，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指導與協調。第二，強化對農業生產過程的服務功能。第三，促進各部門結合工作特點、轉變職能。

¹⁷¹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頁八至九。

縣人民政府下設有各種部門，在委、局職能部門方面，有計畫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教育、科技、計劃生育、體育運動委員會，以及各產業、交通、資源、財務、稅務、土地管理多種部門。另外還有直屬的辦事機構，以及局級公司，包括物資、輕重工業、建築農機等管理公司。在雙重領導單位方面，有人民銀行支行、保險公司支公司、供銷合作社、氣象、郵電等局。¹⁷²

2. 鄉人民政府

鄉人民政府是中國大陸農村基層行政機關，鄉長、副鄉長由鄉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三年。鄉人民政府下設有民政、公安、司法、財政、文教衛生、計劃生育等部門，部分屬於上級部門業務指導性質、或是雙重領導，尤其稅務、財政、工商機構是由鄉、縣人民政府雙重領導形式。

在職權方面：第一，執行鄉人民代表大會決議是項與上級機關交辦事項。第二，執行區域內經濟社會發展計畫及預算。第三，保護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的財產，及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第四，保障各種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第五，保障少數民族權益。第六，保障男女平等、薪酬平等與婚姻自由。¹⁷³

3. 鎮人民政府

鎮人民政府的行政地位相當於鄉人民政府，由鎮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鎮長、副鎮長，每屆任期三年。雖然法律規定鎮人民政府的職權與鄉政府一樣，但實際上仍有不少區別。鎮政府主管並非農業生產，而著重在工業、手工業與商業管理，以及城鎮發展規劃、市政建設等；鎮作為農村地區的輻射中心，甚至發展城鎮領導鄉的體制，發揮城鎮帶動農村經濟的功能。在鎮政府的機構設置方面，經濟較發達的鎮會設置計生、衛生、文教、
、外來人口等二十餘個

¹⁷²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四二。

¹⁷³ 同前註，頁四六至四八。

機構。¹⁷⁴

4.村民委員會

村民委員會不是政權機關，也不是農村基層政權附設的機構，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因此，鄉鎮人民政府對於村民委員會應站在給予工作上當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角度。村民委員會按需要可設置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專門委員會。

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會議選舉產生，主要任務包括：第一，辦理本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第二，調解民間糾紛、維護治安、促進村民團結。第三，向人民政府反應村民意見。第四，支持合組織村民依法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和其他經濟，促進農業生產、擔任協調、服務的工作。第五，維護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各種經營體制的財產權、權利和權益。第六，管理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財產。第七，國家法令、政策的宣導，發展文化教育等項。第八，引導村民團結、相互尊重與幫助。¹⁷⁵

縣人民政府為農村地區事務的主管機關，鄉與鎮人民政府上承縣人民政府的交辦事項，彼此有垂直的行政關係；而村民委員會屬於村民自治組織，與鄉、鎮人民政府並沒有直接的行政關係，而是指導關係；因此，村民委員會成員的給薪不由國家支付，而是由該村收入中提撥。在各基層政權的職權方面，縣在地方稅務方面能自主決策、並且與金融單位有行政關係；鄉鎮政府可以向居民課徵農業[?]、工業[?]，村民委員會的收入則多仰賴村辦企業的剩餘。並且可以由各機構職權中發現，中央下放給地方的自主權著重於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如保障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財產、發展農村經濟等項。

¹⁷⁴ 同前註，頁四三六至四三八。

¹⁷⁵ 同前註，頁七五 至七五四。

在地方收入的系統中，各級基層政權皆可透過各項地方稅收以及由鄉鎮企業獲取預算外收入。組合政府中的指揮總部「縣」，由於可以自行決定地方稅務，並且從管轄下的鄉鎮收取上繳稅收，由於收入的來源廣泛，對於向鄉鎮企業獲取其他收入的動機也較弱；而在鄉鎮部分，由於部分稅收必須上繳縣級單位，有較強的動機對鄉鎮辦和村辦企業徵收財政收入；村則由於必須自我經營村內建設、各項公共衛生、人事支出，村辦企業的稅收全額轉入上層單位，面對村內的預算壓力，村辦企業的動機也是三層級中最強的。¹⁷⁶

（二）一九八〇年代 - 集體制鄉鎮企業的榮景

在中國大陸從計畫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行政資源的運用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商業化的行政資源，黨幹部、政府官員、企業家都可從尋租行為中獲取利益，鄉鎮企業的發展也不例外。由於經濟自主權下放給地方，地方政府在從事經濟規劃、選擇投資或扶植標的時，便會考慮到對本身的回饋與貢獻。而回饋與貢獻的定義並不侷限在利潤數額，可能是對當地的社會福利提供、或是就業機會、競爭力等，會隨著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量。¹⁷⁷

1. 選擇性配置

一九八〇年代計畫經濟色彩尚未完全退去，在「縣」層級能夠掌握較多的資金與稅賦，因而便針對特定形式的企業制定優惠政策，這種行為稱為選擇性配置。如允許特定企業購買數量管制原料、物品，或以低於公定價格購買；另外，也有提供特權企業取得非管制，但為稀少性要素的機會。¹⁷⁸這些多是透過

¹⁷⁶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99-115.

¹⁷⁷ 陳淳斌，「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發展與地方政府職能：回顧學界對相關理論的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四卷第七期（民國九十年七月）：頁九一。

¹⁷⁸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18-119.

企業、政府與黨幹部之間的非正式關係網絡運作。

其次，鄉鎮企業的資金來源也是選擇性配置項目之一。鄉鎮企業的募資管道，除了透過集體資金的運用、也可向企業本身的成員以保證金或借貸的方式獲得；還有另一種資金獲取管道則是信用貸款，由於銀行、信用社、財政、稅務機關與地方政府有行政關聯，企業要獲得信用貸款的申貸程序中，必須提出擔保人，銀行也透過評等系統來衡量企業的償債能力；而鄉鎮辦、或村辦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由於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再透過與金融機構間行政資源的運作，在資金取得方面比較順利。反之，由於當時的民營銀行經營尚未開放，私人興辦企業在擔保與政黨關係上薄弱，而難以獲得銀行與信用社的青睞。在四川，銀行不給新開辦的鄉鎮企業貸款，而選擇與有地方政府支持的鄉鎮辦的企業打交道。¹⁷⁹

2. 資訊網絡

農村地方政府除了對資源、資金的掌控之外，鄉鎮企業所需要的市場資訊與生產技術也必須經由官僚體系獲取。地方官員及黨幹部常透過行政例行的活動，進行人脈交誼與資訊交換，使得有關新產品、科技、市場通路等資訊流通在官僚體系中；因此，官僚層級較高的「縣」擁有最寬廣的關係網絡，除了垂直關係之外，橫向的也擴及外縣地區的發展資訊。故在資訊的需求上，往往是由企業向村尋求幫助，村再向上級的鄉鎮求助，若無法提供協助，則再上溯至縣。

在地方政府的資訊階層中，企業永遠是最終的客戶與受益人。就協助的型態來看，各級政府可能提供鄉鎮企業會談、專家協助、研習團或是與設備供應公司交換技術的方式，來獲取市場偏好、科技發展、產品設計、技術學習或管

¹⁷⁹ *Ibid.*, 119-122, and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三年），頁一六八至一六九。

理方式的資訊。¹⁸⁰以企業合作為例，鄉鎮企業籌備最初的技術多是來自於國有企業，甚至需要國有企業在市場、資本配置方面的經驗，鄉鎮政府便扮演牽線者的角色，安排國有企業的工程技術人員調往鄉鎮企業；在馬戎所調查的 A 鎮醫用高分子製品總廠（鄉鎮企業），廠中技術副廠長，原為市塑料廠（國有企業）的技術科長，為了勸說市塑料一廠和塑料公司批准調動，鎮長和鎮書記九次出面聯繫。¹⁸¹

3. 扶植集體制鄉鎮企業誘因

一九八〇年代的鄉鎮企業中以集體形式企業的發展最受注目，主要當然是擁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集體的縣辦、鄉鎮辦、村辦鄉鎮企業廠長是由地方政府任免的，透過與銀行體系、國有企業的資金供給及資訊交換，還有針對集體鄉鎮企業的特殊優惠政策，扶持鄉鎮企業的成長。除了延續公社時代的集體意識之外，地方政府透過集體辦的鄉鎮企業較容易課徵稅收，並且可以兼顧地方的經濟發展。

由於農業去集體化之後，地方官員與黨幹部的權力不再直接由中央賦予，而是透過掌控資源的發展優劣來評判表現。透過對集體企業的控制，企業發展越好、對地方經濟越有貢獻，黨幹部與官員的權利與升遷機會就越大，而透過集體制鄉鎮企業也可以同時維持黨在農村經濟與政治上的雇傭關係，因而這些黨幹部選擇以管理集體鄉鎮企業來領導地方的成長，換取在政治上的績效與晉升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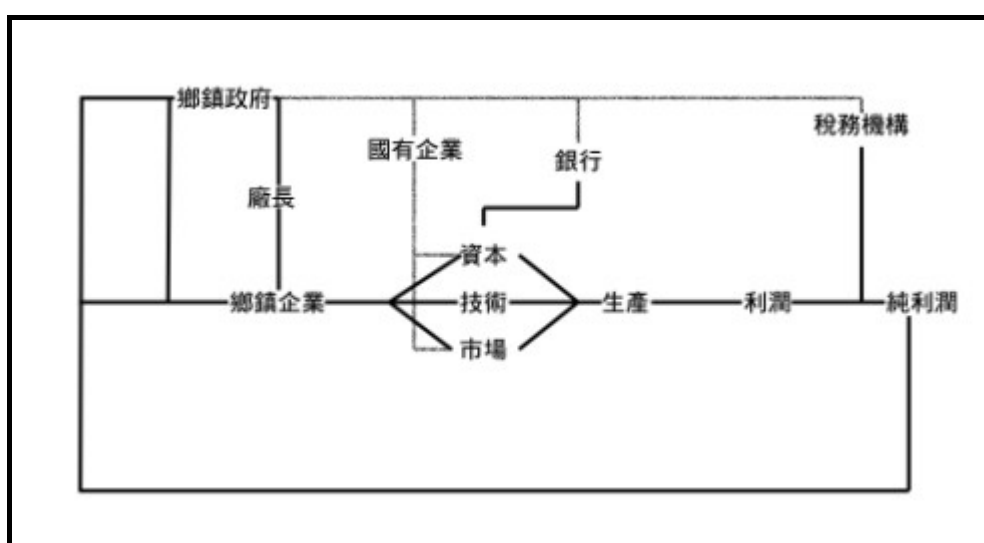
就縣的層面來說，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透過派任廠長制度，企業監督容易；並且可以行政方式訂立目標來規範集體制企業，同時也增加了稅收、預算外資

¹⁸⁰ *Ibid.*, 123-128.

¹⁸¹ 楊沐，「討論：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蹟是怎樣出現的——關於 30 個鄉鎮企業調查的綜合分析，」*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合編，頁四五九至四六〇。

金的來源。在鄉鎮村的層面，這些地方官員、黨幹部可以透過企業剩餘而獲得直接的利益；並且紓解農村地區的就業問題，減輕農業去集體化後釋放出剩餘勞動力所帶給黨幹部的社會責任，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一年間，農村集體鄉鎮企業雇用的勞動力總數由二千八百二十七萬員增加到四千五百九十二萬員；¹⁸² 農業的發展仍是必要的，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在必要時可進行人員的調動，同時兼顧農業與工業的發展。¹⁸³

圖 4-2、鄉鎮企業運行圖



資料來源：楊沐，”討論：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蹟是怎樣出現的—關於 30 個 鄉鎮企業調查的綜合分析，”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合編，頁四五九。

（三）一九九一年代 - 高效益的私營鄉鎮企業

在一九七九年之前，許多農村地區興辦私人企業是無法取得政府發給執照的，當時「私有」仍是個陌生且不容易被接受的概念；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央明定鄉鎮企業為社（鄉）隊（村）辦企業、社員聯營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工業與個體企業後，私營企業才取得法律地位；但至一九八七年，對私人企業的規

¹⁸²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¹⁸³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73-80.

範仍有不得超過七個雇員的限制。

由私營鄉鎮企業的增長趨勢來看，自一九七八年核發的第一張企業執照開始，一九九一年達到九十七萬八千八百家，截至二〇〇二年底為二百二十九萬七千九百家，這還不包含雇員人數七人以下的個體鄉鎮企業；¹⁸⁴根據 Jean C. Oi 的研究顯示，私營鄉鎮企業的登記資本額與總增加值的成長速度很快；在本研究的第三章中也指出，私營形式的鄉鎮企業無論在雇員人數、總增加值都呈現逐年相對增長的趨勢。

一九九〇年代私營企業的快速成長，部分原因可以歸於一九八〇年代早期與中期農村資源配置結構的轉變，鄉鎮辦、村辦企業的發展提升了農民的收入，累積的儲蓄就成為創辦企業的資金。其次，地方政府也針對私營鄉鎮企業提供了優惠政策，並且銀行也開始對私人提供貸款。這些原因都成了私營鄉鎮企業在一九九〇年代快速成長的動力。

1.政策的轉向

在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嚴重的物價膨脹，高達一百二十點七的膨脹指數迫使中央以「下馬」的方式降溫，頓時各公營銀行緊縮銀根、投資計畫宣告暫停；原本依賴銀行信用貸款的集體制鄉鎮企業，因為銀行與國有企業間壞帳、三角債問題浮出檯面，緊縮銀根導致集體制鄉鎮企業陸續發生集資、資金周轉不靈的問題。並且，在一九八〇年代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不佳，突顯了鄉鎮企業的高度成就；但隨著外資進駐、私營企業興起，集體制鄉鎮企業在競爭的環境下開始暴露出生產技術低落、人員素質不佳的缺點。而中央出口導向的政策，使得具社區特色的鄉鎮企業無法面對出口競爭，獲利及營運效率下降。

¹⁸⁴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農村地區的基層政權開始轉變對集體鄉鎮企業的政策優惠，注意到私營形式的鄉鎮企業具有較高的市場競爭力。縣人民政府面對集體企業的破產與銀行間壞帳問題，以及來自於企業的稅收減少；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則由於縣不再擔保集體鄉鎮企業的資金來源，八十年代集體企業過度擴張、競爭力不足，而來自於勞工不願意受到過度的政治約束，這些集體的鄉鎮企業開始出售給沒有社會責任的私人經營。¹⁸⁵

2. 行政控制

由於地方政府轉而支持私營形式的鄉鎮企業發展，地方政府也開始思考如何去因應這些新的產權形式？如何去維繫與企業、經營者間的關係？黨又要如何去控制一個非集體所有、非政府所有的企業？由於各層級的地方政府仍然擁有約束企業行為的行政資源，以及特殊的關係及資訊網絡，對於九十年代私營企業的興起，地方政府也衍生出了一套制約系統。

「縣」組織下的工商管理局是主管農村企業許可與辦執照的核發。但核發過程相當繁瑣，想要興辦私營鄉鎮企業的農民，必須先從黨支部取得在社區內居住與健在的證明；再向銀行取得有關本身流動資金與固定資金可抵付額度的財力證明；接著可至設於鄉鎮層級的工商管理局分社辦公室接受偵查，經批准後再到縣的工商管理局，由該局的官員決定最後核發事宜。透過這樣一套政府授權私營企業的系統，反映出政府對企業的行政力量以及兩著合作的本質，並且可以監控該企業的經濟活動。

「個體協會」是政府創造的利益團體，屬於半自治的組織，獲授權的企業廠商向該協會繳納會員費用即可獲得授權；協會的活動也受到政府的規範，其工作內容包括：監視並確保個體服從規則、對企業家進行政策教育、協助處理

¹⁸⁵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88-93.

會員問題等項。¹⁸⁶

3.資源的誘導

已經有許多縣逐漸提高對私營部門信用貸款的協助，如成立縣級財政公司、或在鄉鎮分設資金會，提供各種所有權形式企業的貸款。申貸者所支付的利息成本自然比國營的信用合作社高，但是對於規模較小、較短期、需要流動資金的企業則較容易獲得所需的貸款額度。

除了資金便利性提高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許多技術上的建議和相關的市場資訊，這些相對便宜的資訊服務，對於小規模或剛起步的私營企業主，減輕了許多草創時期的資訊蒐集成本。¹⁸⁷

4.市場的連結

由於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扶植，使得兩者之間存在著共生的關係。政府運用其行政資源，將私營企業帶往合作模式，透過與國有企業或集體形式鄉鎮企業生產契約的聯繫，使得私營部門、集體部門、國有部門間獲得商業聯繫。這種合作模式也可為私營企業打開市場、獲得新生產技術，同樣有利於地方政府的收益。¹⁸⁸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聯營合作的模式，其實有助於保護鄉鎮企業免於政治壓力，同時能夠繼續生存發展。¹⁸⁹

鄉鎮企業的發展自一九八〇年代的集體形式，到一九九〇年代的私營企業蓬勃發展，地方政府始終扮演著重要的引導角色。經濟自主權下放，地方各級政府紛紛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考量下，調整企業的優惠政

¹⁸⁶ *Ibid.*, 128-131.

¹⁸⁷ *Ibid.*, 131-134.

¹⁸⁸ *Ibid.*, 134-137.

¹⁸⁹ 楊沐，「討論：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蹟是怎樣出現的——關於 30 個鄉鎮企業調查的綜合分析，」*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合編，頁四六二。

策。地方正府官員所代表的是執行的角色，真正具有規劃與決策權力的是各級黨委書記，因此在政策考量上仍必須將政治因素納入；故地方政府也同時透過行政工具與資訊網絡的誘導與制約，力保政治上的掌控地位，並且達成中央下達的經濟總體目標。由此可看出縣、鄉、鎮、村在政策與現實環境轉變的調適上是非常有彈性的。

（四）所有權改革

以Jean C. Oi的地方政府組合主義來解釋一九九〇年代私營形式鄉鎮企業的發展，從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做為立論支持似乎稍嫌薄弱。九〇年代推行的所有權改革，目的是為了藉此實現政企分離、政府退出經營活動，一開始盛行股份合作制，後來則是股份制與拍賣制，整體是走向私有化的方向；只是在私有化的過程中，所有權的歸屬仍然脫離不了村幹部或與之關係良好的企業經營者手中。

1.經營者的優勢

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原意是希望職工入股，但是職工的經濟能力有限、入股意願不高，反之經營者較有能力持股；因此，在拍賣招標的過程中，原本就對企業營運管理的經營者就佔有優勢。

2.政府政策

部分地區政府鼓勵「經營者持大股」，甚至明文規定經營者的持股比例；或者以「共享股」來增加經營者的持股意願。另一方面，由於大部分村集體企業的帳目不清，政府便以查帳方式威脅企業經營者承接該企業。

3.企業政黨關係

由於企業經營者與村幹部關係良好，許多企業都是內線交易，根本沒有公開拍賣，或甚至村幹部與企業經營者為同一班人，透過所有權改革，將集體資

產轉移到個人名下。¹⁹⁰

股份制的實行，乍看之下可以逐漸達成政企分離的目標。但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前，企業主與地方政府、幹部之間交錯複雜的關係網絡，產生許多合謀的利得；透過這種將股份集中在經營者或少數人手中的型態，其實有助於黨幹部與之建立關係。在許多的鄉村中，幹部兼任企業的董事長、經理、廠長，或即使當時沒有兼任，以往可能曾經擔任過鄉鎮政府機構的職務；另外，股份制的結果也可能讓他們從中獲取暴利，增加股份集中的誘因。

黨幹部在股份制的落實後，失去了以行政方式掌控企業所有權的機會，但是卻透過幹部本身的「多重身分」，或是親屬友人的關係網絡得以再次掌控企業：如企業的董事長可能除了經濟職位外，還兼有政治身分；或是父親為企業黨組織書記，而其子為董事長。所以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仍然是很緊密的，主要是依賴人際網絡的連結，而非政治或是制度上的連結。¹⁹¹

這個概念配合 Oi 的地方組合主義，便能強化地方組合政府與私營形式鄉鎮企業的交互關係，而並非只是利用行政上的優勢來誘使、規範企業，仍可以透過經營者來掌控村民的政治意識；具有多重身分的經營者，也可利用其擁有的人際網絡從地方政府、或黨組織中獲取特殊權利。所以，一九九〇年代的鄉鎮企業，雖然政策將集體企業導向私營型態，在所有權轉移的過程中，其實充滿了黨幹部、政府官員與企業家的議價及合謀空間，地方政府、黨、企業間的多重依賴關係並不會因私有化而瓦解，企業家反而會協助村委會或地方政府維持其統治權威，並同時繼續擴大資本。¹⁹²因此，地方政府組合主義只是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所有權改革中，轉變了地方政府與企業間的關係運作模式。

¹⁹⁰ 徐斯儉，「大陸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四卷第五期（民國九十年五月）：頁二八。

¹⁹¹ 同前註，頁二九。

¹⁹² 同前註，頁三。

第三節 政企互動實例

在本節中主要以實際的鄉鎮企業運作方式，來驗證第二節中對企業、地方政府以及黨之間的交互關係。實證調查的案例或許不能全面解釋三者之間的互動型態，但大致可以透過調查案例來與 Jean C. Oi 的地方組合政府做對照；案例的選用上，為考量到總體與個體層面的觀察角度，分別以企業個案分析、地區模式比較提出實例作為驗證。

（一）鄉鎮企業案例

H 鄉的絲織廠¹⁹³是由「紅衛絲織廠」和新成立的「立新大隊絲織廠」在一九八一年合併而成，為 I 村集體所有的村辦企業。現任該村黨支部書記譚先生為工廠的創辦人，一九七八年該縣決定大力發展工業，當時為代理大隊長的譚先生透過縣組織下的第二工業局，向國有企業以鋼材交換的方式購買織造用的機器。購買鋼材的資金主要由集體公積金中提撥，其餘的就向公社的社員家庭借；再透過私人關係的運用，向城市裡的國有企業換取鋼材，順利將機器購買進來。

但是當時的機器購買並不包含組裝、操作及維修的指導，譚先生只有透過縣的行政關係與黨的網絡關係，去獲取這些資訊。由於工廠的運作也需要原料與資金，銀行對於「村」辦企業放款額度很低；而原料和產品皆由第二工業局承包，由於可運用資金不多，該廠主要是以成品換計成價格，憑單直接領用原料，如此便不需要準備現金購買原料。

經過一、二年，該廠已經累積高度的利潤收成，不但經黨支部決定擴充產能，也提出盈餘從事社員分配。一九八一年，公社黨委決定將紅衛絲織廠與立

¹⁹³ 此例歸納整理：劉世定等，「H 鄉絲織廠」，*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主編，頁一九六至二四八。

新大隊絲織場合併，並且指派廠長、副廠長甚至車間主任等職務。該廠的成功被歸因於工人的勤勞與工資低廉，聘請來的師父對產品品質把關、並培養出一批技術工人；之後則是縣局在原料、燃料優先供應，以及保證成品銷售管道；同時銀行開始對企業的信任，使資金週轉效率提高。

在 H 鄉轄區內的鄉辦村辦企業都統一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簽訂相同規格內容的契約（合同）書；與鄉辦企業不同的是，村辦企業的承包契約是與本村的經濟合作社簽訂的，並且由鄉工業公司監證。契約中規定產出的提留指標：若完成承包利潤，職工獎金可幅度增加；超過承包部分則在扣除所得稅之後，以集體、職工按比例分成。絲織廠是村經濟合作社的一部分，為該村主要的經濟來源，比重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村辦企業與村經濟合作社的財政聯繫主要分為以下四方面。

1.企業上繳利潤。上繳分項包括？前利潤、？後利潤、包乾上繳三項，而在稅前上繳方面各年均不同；實行稅前上繳的主要目的是使村多得利，少繳國家稅收。

2.上繳提留。上繳提留（表 4-2）與上繳利潤不同，前者不管企業是否營利均要上繳，而本項是與利潤掛勾的，企業不景氣時此項可以減收或不收，企業收益好時則適當提高徵收比例。

3.支付村幹部的報酬。村幹部的補貼一般應由村經濟合作社負擔，但該廠隸屬於村經濟合作社；絲織廠負責支付十一名幹部的報酬，支付標準等同於企業同級幹部。按照管理人員平均工資計算，該項支出每年大約為二萬多元。

4.集資。農村進行重大建設時，企業要額外提撥出一部份資金支持該項活動；如一九九一年村里決定新建村小學，召開籌集資金座談會，並決議由絲織廠負擔六萬元，若到期無法完成集資任務，對廠內建設應停止或緩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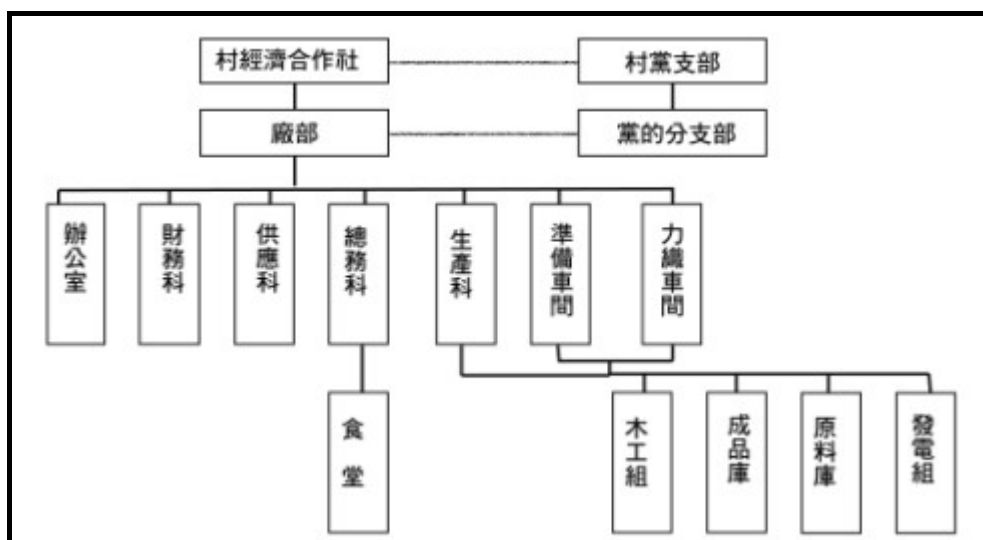
表 4-2、承包合同結算方案

項目	結算合同指標（元）	實際數（元）
基本工資及基本獎	297600	288800
折舊大修理	111720	112000
獎勵基金	29760	27280
福利基金	27280	29760
教育基金	3720	4560
建農基金	24800	24800
教育附加費	16000	16000
管理費	2666.7	1985.8
結算利潤	133333.3	10194
帳面稅金	19786.7	20470.3
實交稅金		1915.9

上繳提留項目包括：折舊大修理費、獎勵基金、福利基金、教育基金、建農基金、教育附加費、管理費等項。

資料來源：H 鄉絲織廠調查¹⁹⁴

圖 4-3、絲織廠組織運作圖



資料來源：楊沐，”討論：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蹟是怎樣出現的—關於 30 個 鄉鎮企業調查的綜合分析，”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合編，頁二一二。

村辦企業的發展除了與村的財政收入有密切相關之外，也直接影響到村內主要負責人的收入。該村與其他行政村一樣，設置了三大領導班子：一是負責黨的工作的黨總支，其二是負責全村行政工作的村民委員會，三為管理村集體

¹⁹⁴ 同前註，頁二三一。

經濟的經濟合作社。雖然有關社區、企業的重大決策是由三大領導班子共同決定，但是黨支部的意見才是最後決定性的，而且黨支部對企業活動的參與遠遠超出「重大」決策的範圍；許多有關企業的決策都是由黨支部直接發文，而不是透過村經濟合作社發文。雖然黨支部並不在廠內的在正式組織上，但實際決策卻是由廠部與黨支部共同管理的（圖 4-3）。

由以上絲織廠的例子，可以明顯看出「地方政府」、「黨」與「企業」間的密切關聯性。從建廠開始的資金、原料、設備、市場、資訊等所需要素，幾乎完全依賴地方政府以及黨的關係網絡運作：企業可以獲得低價原料或優先購買的特權，透過黨幹部的人脈尋求技術人才，地方政府牽線將產品銷售往其他地區的國有企業，營運期間縣無息提供高額度的財政借款等。除此之外，企業的營運收益的分配也主宰著村民的生活水準，企業招納當地職工，提供就業機會、薪資與福利保障；村內公共建設、基礎教育、幹部薪資都由企業提撥貢獻；另外，企業上繳的稅收、各項費用成為鄉、縣的重要收入及預算外資金來源。

H 鄉的絲織廠雖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鄉鎮企業，但在普遍的調查中，鄉鎮企業、社區、黨、政府之間的交互運作關係的確是交錯而複雜的。這也是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的特殊之處，黨的網絡廣佈在政府各層級中，甚至深入社區與企業內部，為求經濟與政治的控制；地方組合政府為獲取本身利益，以企業優惠、政策限制誘導企業行為；而企業則樂於與黨、地方政府合作，換取行政便利及資源特權。透過這樣的多重依賴模式，使每個行為體之間彼此合作，並且達到共進共榮。

（二）地區模式的比較

在地方組合政府的概念之下，可以了解鄉鎮企業繁榮興盛背後的制度性、政治性因素的運作。但這在總體層面，卻無法解釋為何中國大陸的不同地區會發展出不同的鄉鎮企業經營模式？以下便透過幾個地區主要的鄉鎮企業經營模

式，概略認識、比較地方政府與企業間的角色配置有何不同。

1.溫州模式

溫州地區位於浙江省東南沿海處。在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強調重工業的發展，因而造成日用消費品短缺；溫州的集體主義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並沒有增強，反而在文革期間湧現了許多地下商販，從事黑市交易。當時社隊企業生產家庭日用品並不稀奇，但以「家庭」為單位製造這些商品卻是溫州人的創舉。

溫州的農村工業主要以家庭為單位，這種經濟模式沒有高成本設備的考量，雇用員工數量不多，因此可以迅速按照市場需求調整生產物品、式樣；並且，溫州地區的雇主與雇員經常互換角色，今天自己當老闆，明天會去為別人打工。這些家庭作坊訊息流通快速，產品也是競相模仿，諸如打火機、鈕釦、髮夾、徽章一類的物品。因此溫州農村的家庭工業一向有「小商品創造大市場」的美譽。¹⁹⁵

Jean C. Oi 認為溫州以私人家庭作坊為主體的經濟模式是個例外。¹⁹⁶然而，沒有地方基層政權的扶持，溫州模式也不可能大放異彩。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溫州農民已經有規模的興辦家庭作坊，但按當時規定：私營企業主不能擁有企業章、銀行帳戶和政府印製的發票。但要與當時仍為經濟主體的國有部門打交道，這些物品卻不能或缺；於是溫州地區就出現了所謂的「掛戶企業」，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假集體」、「紅帽子」。¹⁹⁷當時溫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作坊都是

¹⁹⁵ 項光盈主編，*世紀之交看溫州：解讀溫州模式與溫州現象*（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四四至五五。

¹⁹⁶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67-68.

¹⁹⁷ 「假集體」企業是指，私人投資或私人合夥投資的企業，以集體的名義註冊登記，並領取集體所有制經濟性質企業營業執照的私營企業。參考：周立群、謝思全主編，*中小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一八八至一八九。

掛戶企業，打著集體的旗幟、用集體的企業章與銀行帳戶做私人生意；而地方政府給這些掛戶企業的「介紹信」，則提供業者出差、打通關係的門路。

若是溫州這些私人家庭作坊沒有「集體」的旗幟，商品根本不可能在各地的國營商場中販售；溫州地方政權，包括公安、工商、司法等部門，給了這些私營企業家方便、庇護及「紅帽子」。由於溫州的基層政權與家庭企業利益關係並不密切，中介關係就成了明訂的金錢交換；每封介紹信定價十五元、銀行帳戶的百分之一提撥歸集體。在溫州，是金錢和官員的私利把農村企業與基層政權連在一起。

2. 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是廣東農村工業最發達的地區，此地的農村集體力量強大，吸引了許多香港或透過香港的外商投資，這種外向型經濟的集體鄉鎮企業為珠江三角洲模式的重大特色，也稱為「兩江模式」。¹⁹⁸廣東省遲至一九八三年才開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落後於全國絕大多數的省份；但是在此之前，已經有大量的香港資本流入這個地區了。

農村工業隨著香港資本的流入而興盛，農業成了婦女及老人的責任；不同於傳統依賴農地、廉價勞動力的鄉鎮企業，這裡的農村工業是以資本為導向吸引勞動力集中。中外合資企業的進駐，吸引大批外來打工的勞動人口，而本地的農民就變成了當地的企業管理階層。另一方面，對於香港企業家而言，農村集體大規模出售耕地、提供有組織的勞動力，使企業設置基礎穩固，有利於未來的生產運作。

而這裡的農村基層政權也是農村市場化、工業化的最重要中介。珠江三角洲的基層政權主要是透過「股份制」來進行集資與分配，而香港投資從一開始

¹⁹⁸ 項光盈主編，*世紀之交看溫州：解讀溫州模式與溫州現象*（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七五。

就必須與農村集體劃分股份及利潤，因此這裡的農民很快就有了股份的概念。而上述的集體耕地、組織化的勞動力都需透過農村基層政權的供給，同時也提供一些企業需要的基礎設施以及進出口許可證。這些香港企業家也在農村集體的幫助下逃稅，甚至榨取出口退稅；也透過地方政府的關係，賄賂地方黨幹部以規避法規限制。¹⁹⁹

珠江三角洲農村社區的權力集中在基層政權手中。這裡的黨支部、黨委、支部行政，以及公司董事會也是一班人馬輪流調替，這種模式下創造出了許多「企業村」；這些基層幹部、官員與外來的投資者共同領導管理的權利，以及共享創造的高額利潤。

3. 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的發源地為「蘇錫常地區」，分佈在長江三角洲、地近上海。蘇南鄉鎮企業的投資主體大多源自於政社合一時期的社隊企業，產權歸鄉村集體所有，鄉村黨政負責人同時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政企不分。但也由於政企不分，因此決策較快，社區內的人力、財、物也較易集中。²⁰⁰此模式的主要特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主要手段，中心城市為依託，鄉縣地方政權直接管理企業，經營多為產品加工業。²⁰¹

Jean C. Oi的地方組合政府，在蘇南模式中獲得完美的體現。在蘇錫常地區，村集體開辦、擁有並管理村辦企業。這些「現代」的企業，村就是「股份公司」，董事會由村里的主要幹部組成，村黨支幹部書記擁有最後的決策裁量權；到了

¹⁹⁹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頁二三八至二四〇。

²⁰⁰ 史浩明、章正璋，「蘇南鄉鎮企業的產權模式與法制環境研究」，*廣西社會科學*（南寧），總第一〇一期（二〇〇三年）：頁八八至八九。

²⁰¹ 項光盈主編，*世紀之交看溫州：解讀溫州模式與溫州現象*（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七五。

鄉的層級，鄉辦企業則由鄉黨委書記為領導。各級的黨組織有效的透過這些集體鄉鎮企業，從思想上、組織上規範約束幹部、村民的行為。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企業家們普遍重視產品的品質和企業內部的團結，著眼於長遠的市場佔有，而非短期效益。在蘇南地區，社會主義集體與資本主義市場，現代企業制度與當地事法人情都有良好的結合；而這個地區的教育水準、以及農村幹部的素質遠遠高於中國大陸其他農村地區；農村基層政權以強大的集體經濟為後盾，大量投資社區基礎設施、改善教育環境、並營造出良好的社區秩序，為歐美資本家眼中理想的投資環境。²⁰²

以上三種鄉鎮企業發展模式體制各有不同，以私營家庭企業為主體的溫州模式、以集體外向型企業為主的兩江模式，以及以集體力量強大的蘇南模式；各種模式中，地方政權介入企業的程度略有不同，且介入的方式各有差異。大致可以看出地方官員較難涉入私營企業的運作，因此溫州模式下的政企關係較薄弱；²⁰³而外來資金為主的兩江模式，企業家透過與地方政府、地方黨幹部合作的模式創造利潤，政企之間是分享、共治的關係；與地方政府、黨幹部關係密切蘇南模式中，企業與社區的發展在行政運作下有更直接的提升。

除了上列三種發展模式之外，尚有不發達地區的蘇北耿車模式、資源開發利用型鄉鎮企業的平定模式、以僑鄉股份經營的晉江模式、城郊型企業的瀘郊模式等。雖然地方政府介入各模式的程度不同，卻無法否定 Jean C. Oi 的地方組合主義的概念；主要在於，各地鄉鎮企業發展的背景、資源、地理位置不同，地方政府為尋求本身利益，透過不同的方式去適應、獲取各種經營方式鄉鎮企業的剩餘，無論是透過稅收、介紹信販售、出口許可證的提供，地方政府與鄉

²⁰²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頁二八六至二九三。

²⁰³ 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

鎮企業間的關係仍然是互惠的、妥協的關係模式；所不同的是企業與地方政權在「議價」能力上的消長，這方面則與鄉鎮企業不同的發展模式有關聯。

第四節 村民自治與黨支部

在地方組合政府的三個層級中，縣、鄉、鎮人民政府都是政府行政組織的正式單位，中央或地方政策、及黨的意識號召自然可以夠過這樣的行政結構達到執行與宣告的效果。「村」的形況較為特殊，以「村民委員會」為主管村內各項事務的基層的群眾自治組織而非政權組織，在法律上與鄉鎮政府的關係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是「指導」的性質。²⁰⁴

村民委員會在規定上必須向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負責，主要工作項目包括處理村內公共事務、社區建設、治安維護等項，尤其著重在管理村內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及財產，以及維護村民興辦的各種經濟經營模式的權益。²⁰⁵村民委員會明訂的工作範疇合理化、正式化了介入鄉鎮企業營運與決策的情況，並且與當地的盛區發展建立起連結關係。

由於村民委員會大多是透過村民普選產生的，而村民選舉的推動則是由農村黨支部進行政策宣導。村民委員會與農村黨支部的關係可以由《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明文規定黨支部與村委會之間是屬於「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了解。²⁰⁶黨支部因而可以合理的介入村委會的農村工作，當然也包括鄉鎮企業的相關決策。在本節中將詳細分析村民自治與黨支部的運作，對於

²⁰⁴ 柳金財，「試析中共農村黨支部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衝突的成因」，*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八卷第八期（民國九十一年八月）：頁十九。

²⁰⁵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七五 至七五一。

²⁰⁶ 柳金財，「試析中共農村黨支部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衝突的成因」，*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八卷第八期（民國九十一年八月）：頁十八。

鄉鎮企業發展的影響力；並且藉由黨對村民選舉工作的運作，來觀察農村民主化的意涵。

（一）村民委員會與鄉鎮企業

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工作由農村改革開始，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改變了整個農村的生產關係及產業結構，農民由以往計畫經濟體制下的資源被掠奪者，轉變為農產品的資源提供者；同時地方分權也影響了國家與農民關係的轉變，農民開始關心社區集體與自身財產、利益，這種自發性的行為醞釀村民委員會的出現。²⁰⁷而村民委員會體制的出現，得到地方黨委與地方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中央認為這是農民群眾的創造，是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新管理形式；除了指示機關進行調查之外，也支援村民委員會的試點工作。

並在一九八二年新憲法中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新憲法的一一一條除了規定村民委員會的性質、地位、組成和任務之外，也確立了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至一九八七年，中共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在實踐中不斷修改完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為村民自治提供法律保障。²⁰⁸

在中國大陸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中，包含了村民委員會與村民會議兩部份；村民委員會類似現代民主制度中的行政機關，而村民會議則類似立法機關，負責管理、監督與決議。由於村民會議是以具公民身份的所有村民為成員，村民會議召開與決議事項的不便，而以村民代表會議來代替村民行使權利；目前這個制度已在中國大陸大多數的農村中實行，村民委員會在二〇〇二年總數為

²⁰⁷ 馬祥祐，「村民自治—大陸社會力的重生」，《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五期（民國九十二年五月）：頁十至十一。

²⁰⁸ 邱榮華，「大陸「村民委員會」制度與問題之研究」，《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二年二月）：頁一七至一八。

六十九萬四千五百一十五個（表 4-3）。

表 4-3、村民委員會統計表

年份	村民委員會（個）	鄉村戶數（萬戶）	鄉村人口數（萬人）
1978	690000	17347	80320
1980	709820	17673	81096
1985	940617	19077	84419.7
1989	746432	21504	87831
1990	743278	22237	89590.3
1991	804153	22566	90525.1
1992	806032	22849	91154.4
1993	802352	22984	91333.5
1994	802052	23165	91526.2
1995	740150	23282	91674.6
1996	740128	23437.6	91941
1997	739447	23406.2	91524.7
1998	739980	23678	91960.1
1999	737429	23810.5	92216.3
2000	734715	24148.7	92819.7
2001	709257	24432.2	93382.9
2002	694515	24569.4	9350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中國統計年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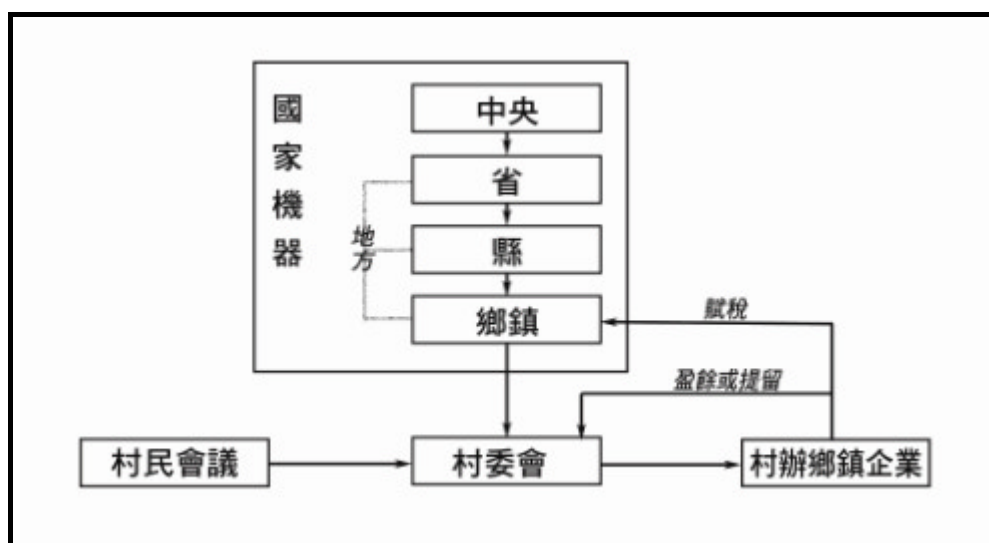
村民會議在作為村的準立法機關其職權包括：其一，罷免和補選村民委員會成員；二，聽取並審議村民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財務收支情況報告，如審定村內建設規劃、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年度計畫以及有關公共事務、公益事業的重大事項；三，審議決定村集體經濟項目的主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承包方案，決定村集體經濟收益使用；四，審議決定鄉統籌款的收繳辦法、村提留款的收取和興辦公益事業經費的籌集辦法；五，審定徵用土地和發放宅基地、生育指標的方案；六，評議村民委員會成員的工作，提出村內享受補貼人員及補貼標準，報鄉級人民政府審定；七，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等規章制度；八，審議決定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其決定的其他事項。²⁰⁹

配合在本章第二節中介紹的村民委員會職權來觀察。在實際功能上，村民

²⁰⁹ 高永光，「大陸村民自治與基層民主—從村準立法事項的範圍析論」，《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第一卷第四期（二〇〇一年十月）：頁九八至九九。

委員會已經具有國家行政體制所派出的行政機關地位，但並不是法定行政機關的一環；雖然村委會是民選的地方自治組織，但在職責上仍然必須受地方人民政府的指揮監督（圖 4-4）。就村民自治組織的職權與執行範疇來看，比較偏重在經濟民主，而非政治民主。

圖 4-4、村民自治體系與鄉鎮企業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大陸對於村民會議所賦予的「權利」(right) 偏重在利益層面，而非「權力」(power) 的強制層面。村民委員會的職責則偏重在管理村的集體經濟：如支持和組織村民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解決村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生產過程問題的服務；維護合作經濟組織和村民、承包經營戶、聯戶等合法權益；管理村民集體經濟所有的土地與財產。²¹⁰因此，村委會在村所屬的資本、勞動力、土地上擁有支配權，並且是建立在對集體有利的企業經營與生產上。

以本章第三節中的 H 鄉絲織廠為例，管理廠部的村經濟合作社就是隸屬於村民委員會下的單位。企業中的任何決策原則上都必須經過村經濟合作社呈報村民委員會，並經村民會議決議才可執行；諸如擴充產能、招募員工、資金週

²¹⁰ 同前註，頁九九至一〇三。

轉等項。除此之外，絲織廠與村簽訂的「合同書」明訂企業所承包的各項社區責任，此部分包括上繳利潤、上繳提留等明細在前文中已有描述。而村委會除了管理集體鄉鎮企業之外，也背負著社區營造的責任，將村務與企業經營結合在一起；甚至有些村發動全民入股，形成全村企業化的現象。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對村委會也有反餽的貢獻，在規模比較小且聚集的農村中，村民會議的召開也比較容易、比較有效率；若是這些村子仍維持著強大的集體主義經濟，或是集體主義所有制的話，會議的召開往往十分迅速，更有利於村委會重大事項的執行時效。²¹¹

（二）黨支部的影響力

中國共產黨依憑農民革命的力量建國，革命時期為適應艱困的環境而發展出黨內一元領導的體制；每個農村都建立一個黨支部，以強化黨對農村的控制力量，而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一元化領導」政策確立了以黨代政的政治傳統。²¹²中國共產黨組織是一種上至中央、下至基層的嚴密系統，因此黨在農村工作中便為主要的指揮管理單位，農民也早已養成無問大小事都找黨支部解決的習慣；而不管是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或改制後的村委會實質上都只是黨支部的從屬組織，村黨支部在農村的歷史遠比村委會的設立更久遠。

1. 兩委關係

在村民委員會出現後，農村開始實施政社分開的村民自治，基層黨的一元化領導產生變化：由於村民委員會是經由直選產生的基層群眾性組織，與村的黨支部也就不是直接的隸屬關係，而黨支部也沒有權力決定由誰出任村委會幹部。因此，黨開始尋求各種管道深入村民自治體系，以維持對農村基層的領導

²¹¹ 石之瑜，「大陸農村的公民意識與集體主義—村民參與選舉的意義」，《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二十至二一。

²¹²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頁一一五至一一六。

地位。

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與村民委員會的關係在《村組法》中做了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核心領導作用；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因此，有的地方就出現了黨支部書記兼任村民委員會主任「一肩挑」的情況。²¹³

就理論上來說，村委會要擁有比較高的自主性，當然是村委會成員與黨支部成員為兩套人馬。但實際現象並不然，依據村委會換屆選舉的結果顯示：當選村委會主任中，黨員所佔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三點五；而村委會成員中黨員所佔的比例通常略低於前者。²¹⁴村委會成員與黨員高度重疊的現象說明了，雖然村委會為村民的自治性組織，但在運作上仍受黨的高度控制。²¹⁵

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對農村基層組織的高度掌控，有了「四個領導、一個注重」的說法：提倡把農村黨支部領導班子成員，按照規定程式推選為村民委員會成員候選人，通過選舉兼任村民委員會成員。提倡黨員通過法定程式當選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提倡擬推薦的村黨支部人選，先參加村委會的選舉，獲得群眾承認之後，再推薦為黨支部書記人選。提倡村民委員會中的黨員通過黨內選舉，兼任黨支部委員成員。要注意在優秀村民委員會成員和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中吸收發展黨員。²¹⁶黨支部除了將黨員送入村委會之外，也積極吸納村委會中的非黨員成員，因此在許多地區的非黨員村民委員，在任期結束前就

²¹³ 史衛民，「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胡錦濤時代的挑戰》，丁樹範主編（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頁一六九。

²¹⁴ 柳金財，「試析中共農村黨支部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衝突的成因」，《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八卷第八期（民國九十一年八月）：頁二。

²¹⁵ 同前註，頁二八；柳金財在該文的訪談內容中指出：儘管村委會有召開村民會議之權，但是如果繞開黨支部的同意，將被視為「背著黨支部搞獨立活動」，況且實行兩委會決策制度，對於有關是否提到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的議案，很可能在兩委聯席會議上便解決了或擱置。

²¹⁶ 史衛民，「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胡錦濤時代的挑戰》，丁樹範主編（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頁一六九至一七〇。

成為黨支部的一員了。²¹⁷

雖然村委會與黨支部成員有高度重疊，但兩委的選出方式與負責對象並不一致，為兩委衝突的主要因素。村委會成員是由全體村民依照村組法選舉產生的，必須向普遍村民的利益負責；而黨支部成員是由農村中少數共產黨員選舉產生，書記的任用方式主要是上級選拔，或村黨員大會選舉經由上級批准，權力源自上級授與，往往形成黨支部成員對上不對下負責。²¹⁸雖然村委會具有普遍合法基礎，但黨支部仍處於優勢地位；村民在日常問題、財務與權力的認同調查中，當支部書記仍有最後的決定權。²¹⁹

而黨支部對於村委會的政治領導作用項目包括：(1)提出全村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的意見，並通過村民委員會的工作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黨支部的工作意圖變為群眾自覺行動；(2)討論村民委員會的重要工作，支持和幫助村民委員會按照法律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3)協調村民委員會同其他組織關係；(4)對村民自治組織中工作的黨員和幹部進行教育、考核和監督。²²⁰尤其在村經濟事項上，與村民委員會職權有高度的相關性，何者才是管理村經濟組織的第一把手？

2. 村經濟管理

以本章第三節中的 H 鄉絲織廠為例，黨的支部雖不是工廠編制內的正式部門，卻可以直接參與、決策企業各項運作；在此調查的紀錄中描述有關黨支

²¹⁷ 石之瑜，「大陸農村的公民意識與集體主義——村民參與選舉的意義」，《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二一。

²¹⁸ 項繼權，「論中國鄉村的草根民主」，《村民自治論叢》，張明亮主編(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四六。

²¹⁹ 王振耀、白鋼、王仲田主編，《中國村民自治前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二六八。

²²⁰ 高永光，「大陸村民自治與基層民主——從村準立法事項的範圍析論」，《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第一卷第四期(二〇〇一年十月)：頁一二。

部參與企業活動的情形：「在我們在絲織廠調查的一個星期中，幾乎每天都能看到該村黨支部書記或一、兩個小時、或半天、或整天，在該廠廠長室與廠部人員討論問題或在廠內巡視，卻沒有一次碰到村委會、經濟合作社長到該企業來。」²²¹不只是此案例，在許多村辦企業中，甚至直接將黨的支部劃入企業的正式編制內；或者是黨的支部書記、村的村長以及村集體企業的總經理，其實是三位一體的領導。²²²

另一個觀察黨支部干預村集體企業的模式，則是透過對村委會的控制。由於村委會是農村各類經濟組織，尤其是村集體企業、財產的自治主管單位；黨支部以領導村委會運作為名，甚至包辦各項村民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以此途徑間接介入鄉鎮企業的運作。²²³H 鄉絲織廠案例中也顯示，廠內的決策批審甚至不需要經過村委會組織下的村經濟合作社，只要黨支部書記決策即可。

圖 4-5 說明了村黨支部在農村基層的運作途徑。村辦鄉鎮企業為村集體所有的資產，企業盈餘除了稅收上繳鄉鎮人民政府之外，部分盈餘與提流回歸村委會從事村內各項建設與分配，並且企業也支付村黨支部的書記、幹部薪資；而薪資的評定除了基本報酬外，浮動報酬與獎勵報酬的部分則與企業的營運狀態有正相關。²²⁴

從這個角度來看，黨支部與企業間互利共生的關係，黨支部也會針對企業在營運上所需的幫助給於支持與協助。無論黨支部以直接介入鄉鎮企業經營，

²²¹ 劉世定等，「H 鄉絲織廠」，*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主編，頁二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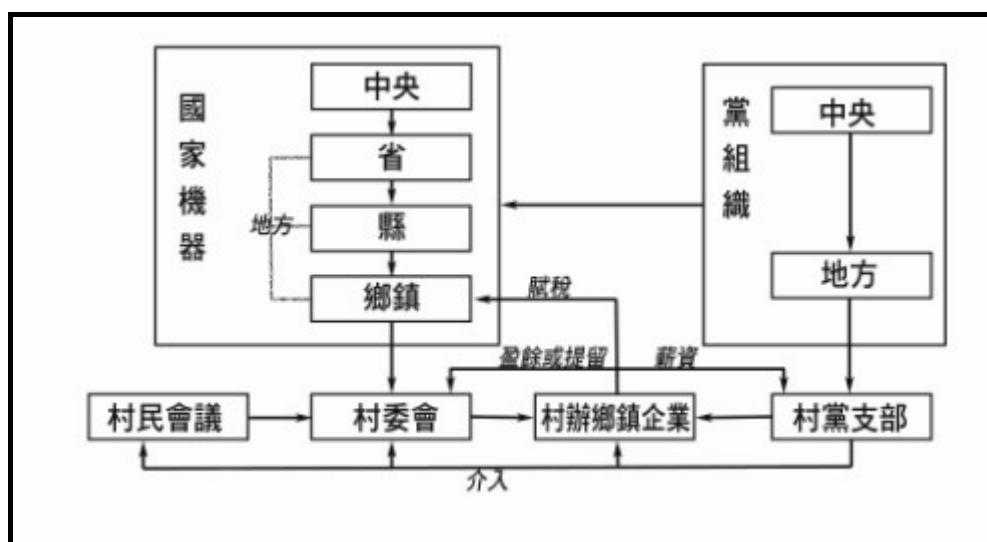
²²² 石之瑜，「大陸農村的公民意識與集體主義—村民參與選舉的意義」，*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二一。

²²³ 邱榮華，「大陸「村民委員會」制度與問題之研究」，*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二年二月）：頁一一四。

²²⁴ 劉世定等，「H 鄉絲織廠」，*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主編，頁二三四。

或是透過村民會議、村委會間接參與集體企業決策的方式，黨支部與村民的關係就像是經濟的共同體，以村的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以鄉鎮企業上繳的稅收為例，稅收是以利潤為稅基作計算，因而在企業中會出現帳面利潤與實際利潤不同的情況，這些都是村企圖最小化對國家與鄉鎮政府利潤、稅收上繳的行為，以求最大化企業盈餘及提留回歸村內。²²⁵

圖 4-5、黨組織運作途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村民選舉的意涵

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民主制度的出現備受學界關注，並以此探索中國大陸未來政治民主化的可能發展。村民委員會、村民會議制度的出現是源於農民自發性的創造，經過中央法律確立系統的正當性，這種具有基本立法、行政能力的機構主要是由村民直選產生的，具備相當的民意基礎。按此自治系統的運作流程，應該已經具備民主制度的雛型了；但實際上，黨的力量卻以各種方式介入村民自治體系中。

1. 選舉的推行

²²⁵ 同前註，頁二三八。

農村自治制度在「民政部」的推廣下，迅速在中國大陸各農村地區中展開。這種一窩蜂的現象，勾起了觀察家對於一九五八年生產大躍進的回憶，只是將超英趕美的口號換成了落實農村自治體系的政策。²²⁶由於村黨支部是國家與農民接觸的最前線，有關國家政策的宣揚與推動都與成為黨幹部的基本工作；因此，有人將村選舉看成是推行國家政策最便宜的工具，有人則認為選舉是為了維持農村政治穩定最好的方式。總之，中國共產黨也體認到了，經濟改革後一元化領導的狀況已經改變，政權的維持必須透過民主機制來支持。

民政部特別強調選舉過程中的各種形式上的活動，例如選舉實應當安排競選演說、連署提名與初選方式、差額選舉、秘密投票等，甚至為了讓更多農民參與而設計代理投票的制度。以差額選舉為例：有些農村村民對選舉並沒有興趣，差額提名便由黨來安排；而投票率的高低，往往就成為中央檢視農村黨幹部政策推行成效的評估標準。

而選舉的結果也提供了黨中央對農村控制策略的調整方向。由於黨所推派的候選人未必會當選，有些農村會選出非黨員的村長，但黨中央並不因此感到憂心；他們認為由非黨員贏得選舉，反而可以有效警惕並且強化黨在基層的領導，透過失敗的選舉來調整黨與民眾的關係，並採取一些預防性的政策，進而長期贏得農村民眾的信心。²²⁷另一方面，黨也積極的吸納這些非黨員的當選者，以擴張黨在農村地區的民意基礎。

2. 民主的評估

在民政部推行的農村自治系統中，「村規民約」的制定是必要的，內容應當依據該村的風俗民情、文化背景，將村務治理的各項詳細列入；並且每個條款

²²⁶ 石之瑜，「大陸農村的公民意識與集體主義——村民參與選舉的意義」，《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十八、二二。

²²⁷ 同前註，頁二一。

都應經過村民的詳細討論，透過投票方式通過落實。以山東省章丘市埠村鎮埠西村制定的章程為例，內容多達五章一 二條，條目清楚、規定十分具體。²²⁸但實際上，「村規民約」的產出過程與黨支部也有密切關聯：通常村規民約的起草，是由農村當中的村支部書記來負責發動的。

而這些「村規民約」的內容甚至有些是違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有明顯侵害個人財產權、工作權、投票權的傾向，然而這些權利都是西方民主基本假設中自主公民的必要條件。如 H 鄉 I 村《村規民約》某條：「凡需調離本單位（絲織廠）的職工須經單位同意，村主管部門批准方能調離，如擅自離開者，除單位按章處理外，不享受村級各項福利，並對其家屬在企業的人員勸退。」²²⁹該村為了防止勞動力流出，以去除職工及其家人的工作權、村級福利為限制，但實際上已經侵犯了人的基本權利。

另外，執政黨是否因選舉而遭遇到挑戰也是檢是該國民主程度的標準之一。就目前的中國大陸而言，大陸一般選民實際上並不會期待中國共產黨以外的政黨成為執政黨；雖然在選舉過程中會遭遇到挑戰，但這些挑戰有許多是黨支部為了滿足上級要求而營造出來的，選舉結果大家都已心知肚明。²³⁰中共在基層選舉不但扮演制度設計、政策推廣，是參與者也是比賽裁判，雖然選舉是民主機制之一，卻反而成為國家政策宣達的工具。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主要來自於「經濟成長」及「意識形態」，只要農村經濟保持穩定狀態、黨透過基層自治系統維持政治思想的掌控，這就可以解釋村民選舉的結果了；此外，有學者提出「霍布斯式」的合法基礎，中國大陸除了中

²²⁸ 馬祥祐，「村民自治—大陸社會力的重生」，《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五期（民國九十二年五月）：頁十三。

²²⁹ 劉世定等，「H 鄉絲織廠」，《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馬戎等主編，頁二一九。

²³⁰ 石之瑜，「大陸農村的公民意識與集體主義—村民參與選舉的意義」，《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二四。

國共產黨以外，並沒有其他可替代的執政團體，為了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的安定，中國共產黨成為唯一的選擇。²³¹

3. 集體利益

中國共產黨強調集體主義的傳統，可以由農村經濟的經營模式上一窺究竟。自一九五八年推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到改革開放後農村集體制鄉鎮企業的發展，中央對於農村的投資著重在集體經濟上。尤其村辦鄉鎮企業與黨支部的密切關係，高於鄉鎮或縣層級的鄉鎮企業與黨的關係；這種社區經濟上的連結，也是村民作出選舉決策的主要考量因素。

大陸一般選民並不期待候選人去促進個別選民的利益，而是著重在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社會關係。候選人與選民之間存在著一種利益交換的社會默契，選民考量的適當選者是否以照顧全村的利益為職志，成功的發展社區經濟便可以獲得多數村民的信賴；²³²而黨幹部在領導村經濟發展上，便佔有優勢的地位。尤其是透過集體經濟的經營，黨支部透過直接或間接的干預，提供給村民的工作權、薪資所得、福利保障等，將農村集體經濟轉化為集體民主。

另一方面，集體經濟也與推動農村自治和農村選舉有關；較發達的集體經濟地區，村民參與基層選舉的意願也比較高。或者，在個體經濟發達的農村，黨透過村委會或個人關係網絡，進行投資、行銷、資訊服務的提供，個體企業甚至取代村委會的功能，由企業來提供社會服務。因此，民政部也將村的經濟發展，視為村自治是否成功的指標之一。²³³

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對公民行為的假設，中國大陸的基層選民並不考量公

²³¹ 徐斯儉，「十六大後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向」，《胡錦濤時代的挑戰》，丁樹範編（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頁一三九至一四〇。

²³² 石之瑜，「大陸農村的公民意識與集體主義——村民參與選舉的意義」，《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二三。

²³³ 同前註，頁二四至二五。

共政策對自身利益的影響作出獨立的選擇行為，而是受到宗族、宗教、工作這些社會網絡的影響，著重在集體利益的考量上。並不能說中國大陸的選舉文化不成熟，而是在歷史背景、政治結構以及文化傳統的作用下，基層民主的發展呈現出不同於西方公民自主型態的模式。所以，若完全以西方民主發展的模式來檢視中國大陸村民自治，在概念上就已經有西方價值偏誤的不客觀角度存在了。

第五節 小結

一九七八年後，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蓬勃發展可以歸功於「地方分權」。這時期的地方分權模式，不同於人民公社時代的自力更生，地方政府真正擁有經濟上的自主權：可以自辦經濟特區、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地方稅收處分，中央則政策性的宏觀調控引導經濟發展。地方分權表現在財政分配上，以往由中央統籌，自上而下的分配方式也有所改變；中央開始依賴地方上繳稅收與盈餘，形成一種由下而上的財政收入流動方向。因此，地方政府便有了與中央協議的籌碼，形成一種遊說式的、妥協式的新中央地方關係。

由於地方必須自行募集發展經費，地方分權的概念繼續往下延伸到縣、鄉鎮、村的層級，透過稅務系統由下而上徵收，形成一種地方組合政府的形態。各級地方政府為拓展財源，便開始利用人民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資產、設備，辦起各級地方政府集體所有形式的企業，除了開闢了稅收的來源，也增加了地方的預算外收入。由於稅務徵收體系的運作，越低層級的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獲取管道越少，因而發展集體鄉鎮企業的誘因越強；這也可以解釋村辦企業與社區間緊密的聯繫關係。

不同以往計畫經濟體制各項事務皆由中央指令下達，地方或單位只需要按

政策辦理，並不須去追求自身利益，在黨的一元領導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是緊密的「國家—人民」二層結構；地方分權與經濟自主使得各省、各縣、各鄉鎮、各村皆有屬於自己的地方利益，地方在追求經濟發展、開闢財源時，並不會考慮到總體的經濟效率與資源配置問題，因此地方利益也不再等於國家利益。地方政府的角色在經濟改革後被突顯出來了，形成「國家—地方—人民」的三層結構；在研究中國大陸問題時，以往關注在中央政策、國家利益的影響，現在逐漸轉移焦點到地方政府的行為上。

地方政府組合主義生動的解釋各層級地方政權與鄉鎮企業的交互關係。一九八〇年代，地方政府延續人民公社傳統的集體意識，以及財稅收課徵的便利性，透過原料、行政、資金的選擇性配置方式，來扶植集體所有形式的鄉鎮企業。政府官員尋求地方財源的擴展，黨幹部的表現也由當地經濟發展狀態來評判，這些都驅使地方政府與黨幹部們提供各種關係網絡、技術資訊、市場通路等，來協助增加集體鄉鎮企業的營收。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總體經濟環境惡化，許多潛藏在集體鄉鎮企業的問題也浮現出來了。地方政府對鄉鎮企業的扶植考量，不再侷限於意識形態與徵稅的便利性，而開始著重企業競爭能力、獲利效益、或工作機會、社會福利的提供；相對於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私營鄉鎮企業沒有沉重的政治與社會責任，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有較高的彈性，同時配合所有權轉制的政策，地方政府轉而支持私營型帶的鄉鎮企業發展。

所有權的轉制方式有很多，股份化、股份合作、企業拍賣、租賃等，有許多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也轉制成私營或股份化的企業。但透過實際查訪，轉制的企業經營者仍然是與政府或黨有密切關係的人員，企業與地方政府、黨的關係只是由檯面上的行政網絡轉向檯面下的私人網絡。佐以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的各项優惠措施，並透過行政資源優勢地位對企業行為的約束；地方政府、黨、

鄉鎮企業仍然存在互惠、協議的交換關係，地方政府組合主義在一九九〇年代私營鄉鎮企業中有了新的詮釋方式。

觀察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的幾個指標，配合對地方政府組合主義運作的認識，本研究發現了新的解釋方向。首先，在勞動力、商品流動、非農化、城市化幾個數據分析上，都顯示出鄉鎮企業的發展對於整合二元經濟體制有正面的貢獻。而地方政府也扮演著推手的角色，主要是在於地方政府對集體或私營鄉鎮企業的扶持過程，提供來自國有企業的特殊原料供應管道、技術人才的協調調動、輔助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或其他類型企業的合作、市場及銷售網絡的資訊供給，中介的地方政府加速了城鄉間或各企業類型間人員、資源、商品、技術的流動，也加速了二元經濟的整合。

其次，在企業產權結構的轉變分析中，國家對於經濟環境的干預降低，源於中央下放經濟自主權給地方；由於市場逐漸自由化，鄉鎮企業私有化的發展趨勢，是總體經濟非國有部門比重提高的動力之一。乍看之下，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都逐漸減少對企業與市場的干預。但以地方政府組合主義及企業所有權轉制的情況觀察，以往政府或黨對企業的介入是直接的、合法性的，現在政府對私營部門的控制則轉向間接的、透過私人網絡關係的方式；以一九九〇年代私營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黨的關係轉變為例子。因此，在數據與指標的「非國有部門比重降低」的解釋上，不能直接推斷政府對企業或市場的干預減少，只能說明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方式有所轉變了。

鄉鎮企業除了在經濟現代化的貢獻外，透過村民自治、黨支部的交互作用，可以檢視鄉鎮企業在其他領域現代化的成就。在現代化理論中，強調民主與財富之間存在正相關，經濟越發展，市場上的經濟型態趨向多樣化、複雜化，威權政權便越難掌控，民眾為減少政權對經濟管對民主的需求就越高；也就是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社會也會尋求政治的現代化。此外，經濟發展會促進社會

結構的變遷，一是公民價值觀的培養；二是高教育程度也形成了人們互信、追求滿足與平能力競爭的性格；三是經濟發展創造出更多可供分配的資源，可以促進族群的融合與妥協；其四，開放性的經濟發展，會使政治民主的觀念擴散到世界各地。²³⁴

經濟民主可以促成政治民主，是西方社會民主發展的事實，因此有許多學者對於中國大陸村民自治的發展持樂觀的態度。第一種觀點認為，村民自治就是經濟民主；第二個觀點則認為，公民自主性提高會使得黨、國控制民間社會的力量減小，而民間社會的出現便是政治民主的充分條件。²³⁵中國大陸的村民委員會與村民會議的民主決策範圍，有大部分是著重於管理村集體經濟、支持村民發展各類型經濟組織、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等經濟議題上；因此，村民自治可以說是符合第一個經濟民主的觀點。

然而，村民自治的社會是否象徵著民間社會呢？村委會與村民會議是村民自治管理村辦企業的職權機構，村辦集體形式的鄉鎮企業提供了村民工作機會、工資所得、福利保障，並且也促進村內各項建設的發展；但是村黨支部在農村基層的運作並沒有減小黨、國介入村民自治系統的力量。村民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數是中國國民黨員、村民會議的最後決議權在黨支部手中、村辦鄉鎮企業的經營者也多有黨員的背景關係；另一方面，鄉鎮企業支付黨幹部薪資、維持村內發展、社會福利的提供。這些交互關係將村民、村黨支部、村辦企業以及村委會聯結成一種經濟共同體，村辦企業的營運、村民的集體利益也依賴黨幹部的關係網絡；而村經濟的發展程度、村民自治的推行成效，則成為評估黨幹部工作績效的要點。

²³⁴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59-72.

²³⁵ 高永光，「大陸村民自治與基層民主—從村準立法事項的範圍析論」，《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第一卷第四期(二 年十月)：頁九三。

無論是村民選舉、村委會、村民會議、村辦企業都與「黨」緊密連結在一起，黨、國的社會控制力並沒有因為村民自治的發展而變小。基層民主反而成為國家控制農村的工具，定期實施的農村普選制度，提供了中國共產黨農村政策的修正方向，以獲取更多農民的信賴。村民自治並沒有發展出民間社會，村民自治是建立在受黨國掌控的集體經濟利益上，而村民重視集體利益、社會關係的決策模式也不同於西方國家對公民性格的描述。因此，民間社會並沒有在中國大陸村民自治系統上萌芽。

經濟民主是否必然的過度到政治民主？就中國大陸的農村基層自治而言，主要目的僅僅在於經濟自主以及社區經濟發展；中央開放村民普選主要立基於能夠掌控村民、村辦企業、黨幹部三者的利益緊密關聯性。反之，越向上層的基層政權，如鄉、鎮、縣與鄉鎮企業及民眾的集體利益關聯性較弱，黨能夠掌控的程度與範圍並不能保證執政優勢；這也是為何村民普選沒有向上延伸，並且成長為全國政治民主的原因。

第五章 比較研究與結論

本章主要針對中國大陸現代化發展模式作歸納，並且以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作為對照比較，為尋求中國大陸現代化的特殊途徑；此外，並由鄉鎮企業在各領域的貢獻與運作方式，對中國大陸現代化的特殊途徑作出解釋，強調鄉鎮企業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節 西方現代化

現代化理論最早緣起於對西歐國家發展的觀察，這些實證經驗被二次大戰戰後許多新興工業國家、脫離殖民政權的國家，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視為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政策的藍圖；以下舉出全世界最早工業化國家—英國、傳統封建背景的歐陸大國—法國、有殖民背景的現代民主大國—美國的現代化歷程，作為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對照組。²³⁶

（一）英國現代化模式

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英國與歐陸封建大國相較，是屬於不發達的國家，被視為是西歐的經濟殖民地。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亨利八世改信新教，切斷了英國於羅馬教廷的政教關係，並且沒收教會財產、取消特權；宗教革命也被視為英國工業化的背景因素，新教所主張的「內在禁慾主義」鼓勵人們投身商務行為，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同時，英國積極擴張海外殖民地，在政權的支持下創立了東印度公司、俄羅斯公司等，資產階級的出現成為政治上不可忽視的力量。一六四〇年起，資

²³⁶ 周穗明等著，現代化：歷史、理論與反思—兼論西方左翼的現代化批判（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三至四七、頁六四至八九。

產階級掌握了國會的席次，為了宗教自由與私有財產，開始了一連串與王室或階級間的內戰、權力鬥爭。直到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英國資產階級透過革命創行了新的財政與行政內閣體系，去除了皇室特權，奠定代議制立憲政府的基礎。

英國國內資本累積最早是透過「圈地運動」²³⁷將農民與土地分離的過程實現的。大量農民失去耕作土地，淪為租地人或是打工人，傳統的封建農業轉變為資本主義下的雇工農業；農業資本化增加了土地的產量，也由於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擴大了國內市場。另一方面，承襲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精神，一六六一年創設英國皇家科學協會，致力科學研究發展；至一七六三年 James Watt（瓦特）發明蒸汽機，被視為是英國工業革命的起點。

英國的工業革命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型態，一是蒸汽機的發明代表人類結束依賴風力、獸力、水力這些自然力，能夠創造更巨大的能源；引用到紡織、採礦、運輸工業上，是工廠制度的誕生。二是科學影響工業發展，以往科學是偶然發生，而工業革命以後的科學大多是實驗室創造，並且可以運用到產業上。

英國的工業革命帶動了城市化的發展，工業化改變了人的經濟行為，城市化則改變了人的社會關係；如農村的血緣社區特徵淡化，契約性利益關係強化，農民轉變為獨立的現代個體。工業化過程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衝突的勞資關係、城市人口壓力、生活環境惡化等；但這些問題在十八世紀以後獲得改善，並且逐漸提高全民的生活福祉。英國的階段性經濟現代化模式已被許多發展中國家奉為圭臬。

（二）法國現代化模式

十二世紀開始，法國的農奴制度瓦解；直到十七世紀農民可以透過贖買獲

²³⁷ 由於十六世紀上半時期，羊毛價格上漲，大量土地被圈佔以作為畜牧用；圈地運動是由上而下的，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至一七六三年英法戰爭期間，國會就通過幾百個圈地法令。

得人身自由，並且貨幣與地租制度的出現，促進農產品商業化。貴族仍為土地的擁有者，以出組土地、榨取農產品到市場販售來獲得高額利潤；但自由市場中，包買商的出現直接與農民接觸，農村手工加工工業誕生，有的農民擴大經營，有的農民則進入城市工作，提高了生產效率與專業化程度。

一二六九年菲力四世時期逐漸擺脫宗教干政，君主與商人的非正式聯盟降低封建貴族的力量，建立中央集權促進全國性市場的形成，並以保護政策發展葡萄酒、奢侈品等產業。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受建約束的商人、資產階級藉而興起，對外貿易也使法國的經濟比較利益發展。另方面，海外殖民加速母國（法國）的國內資本累積；爭奪殖民地的龐大軍費支出，貴族開始對王室喪失信賴，君主專制體制發生動搖。

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源自於文藝復興精神與十五、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潮，為法國帶來政治、宗教、經濟、科學層面的轉變。啟蒙運動主張天賦人權、崇尚科學與自由、政治三權分力等，造就了資產階級的壯大，並在政權上挑戰貴族與教士，最後於法國大革命開花結果。一七八九年，國家財政破產、農民鬧事、階級鬥爭壓力下，歷經三級會議、國民會議，廢除了封建制度與貴族、教會特權，並且確立基本公民權力。此外，一七九三年宣布土地歸民，土地所有制的改變與農業技術革命提升農業產量，使部分農民進入城市支持工業發展。

法國的工業革命在保護政策下，是由紡織工業擴及運輸、重工業發展，工業化也帶動了金融業成長、提高國民所得；²³⁸雖然工人階級相對資本家是貧困的，但實際工資仍是呈現增長狀態。工業化的結果，使農村生活方式與思想觀

²³⁸ Peter Alexis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4th ed., edited by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99-100.

念城市化，城市中工人的地位取代了封建體制下的農民，而其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則為主導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法國的現代化經驗並不只是工業與經濟成長的過程，連帶的政治體制、社會文化、人文精神上的變革，是為其現代化途徑中更值得被借鏡的部分。

（三）美國現代化模式

十七世紀開始歐洲各國在「新大陸」上建立了許多殖民地，英國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英國為了維持帝國權力，與北美十三洲殖民地自治的訴求相衝突，終於在一七七四年爆發了歷時八年的獨立戰爭，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十三洲共同發表《獨立宣言》，為美國脫離殖民統治的重要文件。隨後並建立了政府制度：一七八一年至一七八七年實施的「邦聯制」，由於各州州權過大凌駕國會力量，在全國制度統一及對外經濟上進展困難；一七八八年的《費城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的「聯邦政府」體制，建立起適合中產階級發展的社會權力結構。

美國工業革命前，延續一百多年的西進運動，除了確立美國領土主權之外，經由西進過程對土地的開發、淘金熱潮吸引大批移民，美國成為世界民族鎔爐、並建立了家庭農場制度，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農業社會。美國的工業革命晚了英國整整三十年，而在一八六〇年代的南北戰爭，工業的北方戰勝了農業的南方，確保聯邦政府統一的地位。

另方面，聯邦政府取消了州際貨物流通的限制、交通運輸網絡的建立，以及存在美國社會中的創新精神、標準化工廠生產制度，農業朝向機械化與市場化，工業化帶來產能的提升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工業化過程也造就了許多大家族企業：石油大王洛克斐勒、摩根、卡內基鋼鐵王國，原料市場上出現了壟斷、托拉斯的企業形式。

美國汽車工業的興起，代表著工業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以及充斥在民間

的樂觀進步主義：美國人相信社會不斷進步、人的力量可以促使社會進步的價值觀；因此主張反托拉斯、支持勞工組織的聲浪漸起。以往對經濟社化的自由放任，在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經濟大恐慌中成為社會不公的主因；羅斯福新政主張政府適度干預經濟，在公平分配的原則下調整社會結構。

美國的政黨輪替也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典範之一，民眾可以透過對政黨理念、政策主張的認同在選舉制度中執行公民決策，選票所象徵的是人們對未來生活方式、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的期望。這種人可以改變現狀的「牛仔精神」，落實在不斷創新的技術、新產業的開發、理論與制度的創造，使美國社會有多元化的發展。

（四）現代化的共同特徵

由英、法、美三國的現代化歷程，大致可以看出現代化路徑的主要特徵：

1. 經濟上的工業化是必經的

從傳統低生產力的農業社會轉型為高生產力的工業社會，象徵著人類不斷將進步生產技術用來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然而，在利益分配的過程中，社會結構的轉變速度與工業化不一致，衍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勞資糾紛、農民暴動、貧富差距、社會治安等；經過社會結構的調整，工業化帶動經濟成長、所得提升、生活水準改善的效果也就越顯著。

2. 工業化帶動的城市化

這種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主要隱含人際關係的轉化。以往農業社會的人際網絡是建立在宗族、血親以及封建體制的社區關係，著重社區群體的利益；工業發展引導人口集中的現象，人際網絡轉變為工廠關係、利益牽動的契約關係，著重在與個人利益相關的事務，由傳統村民轉變為現代公民。

3. 社會力量的崛起

透過工業化的利益集中過程，經濟力量較大的社會階層興起。這種「利益團體」為保障本身財產所得、追求更多市場利益的獲取，許多個體利益組成的團體利益驅使，或透過妥協、結盟、民主制度、抗爭，以各種方式當權者挑戰。

239

4.新政治制度的建立

藉由工業化興起的新社會階層，在面對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不一致、舊政權制度又無法滿足階層利益時，建立新政治制度的聲浪就出現了。英、法兩國拋棄封建與君主專政，走向代議制度；北美十三州脫離英國殖民控制，組成三權分立的聯邦政府。這些政治制度上的改變由專政趨向民主化，以適應經濟演進過程中各社會階層權力的消長。

5.政教分離與宗教改革

宗教在封建社會中為重要政治的角色，君王加冕、國家政策、徵收賦稅各項政治事務都與教會有關，下則全面影響民眾的社會關係、日常生活。法國政教分離後確立了國家主權，英國宗教改革的新教內涵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美國清教徒移民易於培養企業家精神；無論是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提供了正向的發展趨勢。

除了英、法、美三國之外，其他有關拉丁美洲、東南亞、日本各國的現代化歷程也多具有以上特徵，雖然各國的歷史背景不一：有封建體制、殖民色彩、政教合一等。現代化過程不僅僅是工業化的經濟現象，而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其他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文化精神、以及個人觀念的轉變；中國大陸強調現代化發展，固然歷史背景不同，仍可按以上歸納特徵來觀察其發展途徑是否有

²³⁹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4th ed., edited by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London: Routledge, 1999), 319-320.

相異之處。

第二節 中國大陸現代化

身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擁有悠遠的五千年歷史，期間創造輝煌的文化成就、各家學說思想，影響範圍擴及中亞、東南亞與日本，形成廣大的中華文化圈。但由於君主專制、封建思想與科舉制度的侷限，中國的現代化遲至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才開始，歷經清末戰亂與國民政府時期，工業化始有初步成長。但隨後的中國共產黨建國，全面實行計畫經濟取代市場機制，社會與政治發展皆由黨所控制；到了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才又重新提出經濟成長與現代化的口號。以下便由中國大陸的歷史背景開始闡述，並歸納整理本研究對中國大陸現代化發展的要點，以與西方現代化模式相對照。

（一）歷史背景

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遵從中庸之道主張「重義輕利」，而社會「士、農、工、商」階層的順序，對於有助科技創新的工匠與經濟貿易發展有關的商人並不重視；在加上科舉制度對仕人思想的桎梏，古中國政府著重在農業產銷的調配，因此古中國一直沒有進入現代經濟成長的階段。²⁴⁰其次，中國的中央集權封建體制能夠維持數千年，也與宗教超然出世有關，中國歷史上宗教鮮少干預政治，因而不會發生政權與宗教間的衝突，並且「天地君親師」的倫理觀念，有助君主專政體制的維持。

清末英人叩關解除中國的鎖國政策，國際貿易興盛激起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聲浪。至國民政府時期的黃金十年，貨幣、財政、金融制度帶來蓬勃的經

²⁴⁰ Malcolm Gillis, Dwight H. Perkins, Michael Roemer, and Donald R. Sm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8.

濟發展，但由於所得分配極不平均、馬克思學說為學子推崇，終於釀成數年的國共戰爭，中國共產黨以計畫經濟體制全面取代市場機制；並且，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國改以「無產階級專政」、黨的全面領導，傳統的儒家文化、封建思想已不復存在。

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體制才開始漸漸復甦，但計畫經濟時代的產物仍然持續影響著經濟改革與現代化的步伐。一九七八年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下，透過單位體制對政治的意識形態與經濟分配全面掌控，從搖籃到墳墓的契約責任體制將黨的影響範圍深入每個人的生活中；直至今日，經濟改革的政策仍是由黨所領導的，而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也不僅是經濟成長的數據，契約責任制的影響使政策也重視在工作的保障、社會福利的提供等方面。

其次，人民公社時期的自力更生政策與黨政合一的組織型態，發展出「集體主義」而非獨立思考的公民；改革後的農村基層組織與企業、黨支部的利益重疊關係，即為集體主義的表現。此外，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延續性影響：全民所有制、戶口制等，都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有不同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表現。²⁴¹

（二）經濟現代化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擁有高度的經濟成長率、吸引最多外國資金的開發中國家、勞動力密集產業優勢出口，都顯示著其十分亮眼的經濟表現。本研究中由經濟的現代化為切入點，分為四的評估指標來了解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模式，以下為評估結果的歸納。

在工業化水準方面，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均生產總值都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而主要的成長動力就來自於工業部門的高比重與高成長率。在產

²⁴¹ 社會主義國家轉形成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經歷：(1)高度的通貨膨脹；(2)大量失業人口。

權結構的轉變方面，國家的直接干預力量減小，主要是集中在對國有部門的控制；並且，非國有部門的企業產值、從業人員比重為增長的趨勢，顯示市場朝高生產效益的方向提升。另外，在城鄉二元經濟的聯繫上，透過勞動力移動、商品流通、企業間技術與資金合作，轉變了計畫配置的經濟型態；同時，全國非農化程度提升，但總農村人口仍高達百分之七十二；人口流動所帶動的城市化現象出現，「鎮」的建立也吸納農村人口的集中。但在內生經濟成長因素上，中國大陸的表現則有待加強，醫療水準低落、城鄉生活品質有落差、政府與民間企業對投入知識創新的態度不積極。

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現代化主要是由政府所主導的，之所以能在二十餘年間有如此成就，得歸功於中央下放的經濟自主權，採指標式、以目的為導向的分層負責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府對於經濟有過多干預，但並不直接表現在「投資」項目上，而是透過政府行政上的優勢、市場資訊的供應、特殊網絡關係的提供對企業直接或間接的介入。另一方面，統計數據本身無法顯示「質量」標準，只單純由「數量」來探討經濟現代化的成就也過於偏頗；透過內生經濟成長因素的觀察，中國大陸的經濟現代化仍舊停留在勞力密集這類不需要有太多創新技術的產業；人們的觀念仍停留在「數量」的追逐上，對於生活品質較不重視。

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工業化過程，相較於政權對市場自由的尊重，中國大陸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層面更多。雖然中國大陸這種以政府主導的目的為導向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快速的達到經濟目標，但是缺忽略的其他部門的調整速度；只著重在「短利」的數據增長上，卻嚴重漠視維持永續性經濟成長內在因素的提升。

（三）其他領域現代化

現代化研究分為多種領域發展，但彼此之間互有重疊與相關性，除了經濟

現代化之外，尚有社會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人文範疇以及制度學腳步的現代化研究，這些領域在本研究的第二章中已有概略介紹了。透過上段分析中國大陸的經濟現代化模式，以下便藉此延伸探討在其他領域的現代化程度。

政治現代化主要表現在國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自由化、分權化等方面。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透過政治協商會議將各家意見彙整、協調，名目上是多黨參與國家政策民主制度，實際上卻仍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為主導。由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是由中央所規劃執行，各類型的非國有企業在市場經營往往都須透過政府的行政程序，尤其許多特權、優惠更須依賴政黨的關係網絡，尋租行為在中國大陸市場上相當活絡。²⁴²因此，中國大陸並沒有出現強大的社會階級來挑戰當代的政權與政治制度。經濟的現代化並沒有帶來等同的政治現代化發展，地方分權化後社會各部門所享有的僅為經濟的自主權，村民選舉的開放並沒有發生向上擴展的現象，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地位並沒有動搖。

在人文範疇方面，強調的是個人的參與意識、獨立思考、創新精神等。首先由教育水準來觀察，中國大陸的文盲比例已經大幅減少，主要教育程度仍以中小學為主，但背後仍隱藏著性別歧視的問題；雖然平均教育程度提升，但在「公民化」的表現上卻有所不足：前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就表示，中國大陸平均教育水準太低是不擴大基層選舉的原因。²⁴³其次，人民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集體主義」仍然影響著農村基層選舉，也說明了中國大陸民眾沒有「公民化」的原因。

根據 Cyril E. Black 的發展四階段來觀察，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過程一直是由

²⁴²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一二 至一二四。

²⁴³ 轉引自：*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alse Dawn: China Will Have Democracy—But Not Yet, Says One of Jiang Zemin’s Top Advisers on Political Reform,” Oct. 1 (1998), 26-27.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傳統領導者並沒有被取代，而是轉化成為經濟發展導向的領導模式。另外，在社會現代化的部分，雖然中國大陸同樣是以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觸動因素，但是在其他領域的發展卻是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模式的。由上述五個領域的現代化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途徑的特殊性，無法全然以西方價值觀來探討。

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現代化上的主導地位，經濟現代化與其他領域現代化程度的不一致發展，自然也與黨的政策方針有關。學者徐斯儉提出「政治最小化改革論」²⁴⁴來解釋黨的行為模式：中國共產黨為適應經濟改革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與挑戰，在所需調整的政治體制之幅度最小化的條件下，來從事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尤其強調若要作政治改革必須確保共產黨的地位不動搖、由中共主導、不犧牲經濟成果等。相對於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上的積極角色，對於政治改革的消極態度就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是為何中國大陸在經濟現代化的表現會較其他領域突出的原因。

第三節 鄉鎮企業的角色

中國大陸目前仍有廣大的農村人口，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工業化勢必吸收大量資金、勞動力，相對的農業部門規模縮小，有鑒於西方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農民運動，甚至動搖了政權穩定基礎；因此，農村經濟發展一直是經濟改革的重點。

（一）總體經濟角色

鄉鎮企業在農村地區的出現，為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推手。首先，

²⁴⁴ 徐斯儉，「中國大陸九一年代之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四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二年二月）：頁二一至二四。

在工業化方面，鄉鎮企業的工業部門總體增加值就佔了全國工業部門總產值的半數之多；而其二級產業部門吸納的勞動力佔全國二級產業勞動力比例將近六成之多，可以看出鄉鎮企業在全國工業化層面的貢獻程度。此外，在農村工業化方面，鄉鎮企業原本就以非農業產品的製造為主，其工業部門增加值就佔了全鄉鎮企業的七成之多，而工業部門從業人員也有百分之五十七點七的比例，無論在吸納勞動力或是企業增加值比重的貢獻，鄉鎮企業絕對是農村工業化的主要動力。

其次，鄉鎮企業的產權形式包含了集體所有、個體、私營各類，但沒有政府企業干預較多的國有形式，因此鄉鎮企業能享有比較自由的經濟自主權。一九八〇年代的鄉鎮企業主要是集體所有制較強大，不過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私營與個體形式的鄉鎮企業成為發展主流；在全國經濟結構轉變的非國有化趨勢中有重要地位，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就佔了全國非國有部門從業人員的五成以上的比例。

第三，鄉鎮企業也是扮演城鄉聯繫與促進城市化的動力。在產品生產到銷售的過程中，鄉鎮企業在資金、人員、技術、市場通路方面，與城市中的國有企業或其他私營、三資企業合作，加速二元經濟一元化過程。以及二、三級產業為主的鄉鎮企業使農村的非農化程度相對提高，也促進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透過中央引導分散在農村各地的工業集中在「鎮」，一方面減少了鄉鎮企業的經營成本，另一方面則提升城市化程度。

第四，一九九〇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的發展瓶頸逐漸浮上台面：低生產技術、設備老舊、管理人才缺乏、產品品質低劣、仿冒產品普遍等。許多現代化國家開始將生活環境、人、知識視為生產的重要元素，而針對這些元素進行投資；表現在企業行為上通常會對社會作公益性回饋、人員在職訓練，以及資訊設備、研發經費的投入方面。鄉鎮企業遭遇瓶頸就是面臨到轉型關鍵，要如何

提升生產技術、提升職工素質，如何創新產品、如何貼近市場需求？必須回歸到這些內生性的因素。在本研究中，農村地區的生活與醫療品質不佳、村民的教育水準及資訊的普及程度有提高的空間、企業投入研發工作不普遍。由於鄉鎮企業與農村地區的社區發展關係緊密，如何利用企業的提留造福當地，並且能藉此提高這些內生性因素，創造出與企業良性循環的回饋機制，也考驗著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主本身的經濟智慧。

（二）地方經濟角色

中央在經濟事務方面的權利下放給地方自主，突顯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尤其是以「縣 - 鄉鎮 - 村」三級所構成的地方組合政府與鄉鎮企業關係最密切，甚至可以說是鄉鎮企業突顯了地方組合政府的經濟地位。

一九八〇年代，地方政府扶植的鄉鎮企業主體是集體所有制形式。企業直接受控於地方政府，政府與地方黨部以特殊管道或特權優惠形式，提供企業所需的原料、資金、技術，以及經濟開革初期市場最缺乏的各類資訊；而鄉鎮企業則提供上繳稅金、預算為資金供地方政府財政支用。由於地方政府是合法的集體經濟管理者，扶植集體形式鄉鎮企業自然也容易掌控企業營運狀態，並且透過官派的廠長管理，在財政需要或農務調配時可以直接掌控。

一九九〇年代，地方政府扶植的鄉鎮企業主體轉為私營企業。主要考量則在於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與生產效益等方面，而不在純粹重視掌控容易程度。地方政府則改為透過執照的核發、個體協會的約束、資金與市場通路資訊的提供等方式誘導私營鄉鎮企業發展；另一方面，許多透過股份化的私營鄉鎮企業經營者本身就具有政府官員背景、或黨幹部關係；私營形式的鄉鎮企業與地方組合政府、地方黨部的關係仍然密切。

此外，在不同地區的不同地理背景下，發展出了許多鄉鎮企業經營模式：溫州的私人家庭作坊、外向型經濟的兩江模式、集體所有的蘇南模式等。各種

模式與地方政府的互動型態各有不同，溫州地方政府成為假集體企業的保護傘、兩江模式的地方政府則與企業共享利潤與經營權、蘇南地區政府則實際為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地方分權後，地方政府官員與黨幹部的評等升遷標準以地方經濟發展為指標，鄉鎮企業最為農村地區的經濟主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地方組合政府自然保持著與企業間互惠、交換的關係模式。

（三）社區關係角色

在三級地方組合政府中，與鄉鎮企業關係最密切的當屬「村」的層級；在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及村民之間，鄉鎮企業實際扮演著集體利益連結中心的角色，將整個村串聯成經濟的共同體。

村民委員會主管村內集體所有財產、幫助各類型經濟體制的發展、村提留的分配方式等項。村民委員會透過村民會議決議許可能夠直接參與鄉鎮企業的運作；而鄉鎮企業也提撥盈餘及提留供村內的公共建設、社會福利、興辦教育或醫療衛生等。由於鄉鎮企業的員工多是當地村民，因此集體經濟越強大的地區，村民會議的召開往往更具效率。

基於黨為最高領導的原則，村黨支部書記對於村長則擁有決策的權力。村民委員會成員往往也具有黨員身分，因此鄉鎮企業的營運實際上也是有黨來主導的；雖然黨支部並不在鄉鎮企業的正式組織中，卻擁有高於廠長的決策能力。而鄉鎮企業除了盈餘提留供村內事務使用外，也必須支應黨幹部們的薪資；企業營運狀況越好，黨幹部的收入也就越高，形成了黨支部與鄉鎮企業共同牟利的模式。

在村民基層選舉中，村民或許對政治參與的興趣不高，對於候選人的政見也不太關心；村民們所依賴的是社會關係網絡，考量的是能夠照顧全村集體利益的人。鄉鎮企業正好是集體利益的中心，而掌控鄉鎮企業致使有良好營運的企業經營者便是村民的最佳選擇，村黨幹部往往就是掌控全村經濟與鄉鎮企業

的人物。因此，這種集體利益互相連結的村民選舉，並不會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造成威脅，反而成為政策宣導、調整農村政策走向的工具。

由以上鄉鎮企業在經濟、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過程並沒有發生農村動亂，鄉鎮企業便扮演著農村地區的穩定力量。無論是在經濟發展、社區建設、村民自治中，鄉鎮企業以利益作為地方政府、黨支部、農村村民的連結，將遺留自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主義」做了新的詮釋。

第四節 展望

鄉鎮企業可謂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力量，尤其是表現在工業化的貢獻上。但面臨鄉鎮企業轉型的瓶頸，政府或企業更應著重深層的內生性要素改善，提高醫療水準、勞動力健康狀況、教育水準、資訊獲取與創造能力等；未來面對更進一步的現代化階段：全球化、資訊化、創意導向的產業需求，鄉鎮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也應著重強化這幾個未來的發展趨勢。

此外，在最近幾年世界銀行發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已經不再只是專注在國內生產總值、工業化、城市化水準的數據提升；而有更多的現代化國家著重在自然資源的保育、物種多元化、環保意識培養等領域，²⁴⁵現代化模式已經跳脫經濟數據上的追求，為求更深層的品質提升，而轉向關注於如何維持人類與生存環境的永續發展。²⁴⁶中國大陸在面對這樣一波波新的現代化思潮，挑戰著當局者的智慧。

中國大陸的村民自治是眾多利益連結的體現，鄉鎮企業的發展與村民、基

²⁴⁵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s,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2).

²⁴⁶ 相關研究指出，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減低，如英國，其實是將經濟潛能轉向環境保護、著重經濟的永續發展。

層黨幹部、村民自治組織相關聯，形成一種經濟共同體，在基層選舉中表現出不同於西方公民獨立決策的「集體利益」選擇。但不可忽視的是，鄉鎮企業對於黨的過度干預出現反動；代表民意的村委與代表黨的支部間的「兩委衝突」益受注目，要如何調節民主與黨的權威成為新的政治議題；還有，農村中逐漸興起的宗族力量成為新的、黨所無法掌控的關係網絡，²⁴⁷為基層村民選舉投入更多變數。

中國大陸現代化途徑中並沒有發生階層衝突、政治動盪的情況，這固然與其特殊的政治模式、社會背景有關，但農村的穩定力量最不可忽視：鄉鎮企業對總體經濟的貢獻與吸納眾多勞動力，減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²⁴⁸鄉鎮企業還有扮演政治上的集體利益中心角色，因而堅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位。

但是，在現代化過程中，許多潛在的問題開始漸漸浮現，如前段所提及新的現代化浪潮與社會的反動力量，目前所面臨的產業轉型、城鄉差距、三農問題、失業人口等議題更是迫在眉睫；鄉鎮企業如何在調整、轉型的過程中，繼續扮演維持農村經濟政治穩定的力量？又會將中國大陸特殊的現代化途徑，引領向何種新的風貌？

²⁴⁷ 馬祥祐，「村民自治—大陸社會力的重生」，*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五期（民國九十二年五月）：頁十四。

²⁴⁸ Andrew B. Abel and Ben S. Bernanke, *Macroeconomics* (Bost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8), 460-461.

參考文獻

中文書籍

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中國鄉鎮企業年鑒。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中國衛生年鑒。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中國農業年鑑。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Ian Roxborough 著，馬紹章譯，*發展理論*。台北：巨流圖書，一九八一年。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4—地區現代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王振耀、白鋼、王仲田主編，*中國村民自治前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王曉魯，”鄉鎮工業的資本形成和效率問題，”*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

William A. Byrd、林青松合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史衛民，”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胡錦濤時代的挑戰*，丁樹範主編。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吳祥鈞主編，*江蘇鄉鎮企業管理經驗千例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宋洪遠等編著，*改革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杜海燕，”鄉鎮工業的增長因素，”*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William A. Byrd、林青松合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周立群、謝思全主編，*中小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周穗明等著，*現代化：歷史、理論與反思—兼論西方左翼的現代化批判*。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林青松、William A. Byrd，”中國農村工業概況，”*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

胡鞍鋼，*中國發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范小玉，”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狀況分析”，*農村經濟調查研究文集*，朱向東主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徐斯儉，”十六大後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向，”*胡錦濤時代的挑戰*，丁樹範編。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馬戎、黃朝翰、王漢生、楊沐合編，*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馬杰三等編，*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3 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國家統計局農調隊課題組，"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問題"，*農村經濟調查研究文集*，朱向東主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

張毅，*中國鄉鎮企業：艱辛的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項光盈主編，*世紀之交看溫州：解讀溫州模式與溫州現象*。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項繼權，"論中國鄉村的草根民主"，*村民自治論叢*，張明亮主編。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楊沐，"討論：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蹟是怎樣出現的—關於 30 個鄉鎮企業調查的綜合分析"，*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馬戎等合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楊智元編，*知青檔案：一九六二 - 一九七九*。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一九六七 - 一九八四*。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劉世定等，*“H 鄉絲織廠”，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馬戎等主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劉志彪、唐勇，*“中國大陸農業發展與鄉鎮企業”，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論文集*，范錦明編著。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二〇〇一年。

潘維，*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

蔡昉、都陽、王美艷，*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英文書籍

Abel, Andrew B. and Ben S. Bernanke. *Macroeconomics*. 3rd ed.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8.

Berger, Peter L. *Pyramids of Sacrifice – Politic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Black, Cyril E.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Carnoy, Marti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lmers, Douglas A.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New Direc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dited by Howard J. Wiard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Timothy Cheek and Saich, Tony. New York: M.E. Sharpe, 1999.
- Chilcote, Ronald H. *Theoretic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China Embraces the Market: Achievements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Barton ACT,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7.
- Fei, John C. and Gustav Rains. *Development of Labor Surplus Economy*. Homewood, Ill.: Irwin, 1964.
- Gillis, Malcolm, et al., ed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 Goodman, David S. G.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in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edited by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_____.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7.
- Gourevitch, Peter Alexis.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4th ed., edited by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Hendrischke, Hans. "Provinces in Competition: Regi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truc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ited by Hans Hendrischke and Feng Chongyi.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Hobsbawm, E. J. *The Pelic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3, Industry and Empire*. Baltimore: Penguin, 1969.
- 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an M. Nels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_____.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Kumar, Anjali.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Production, Trade and Marketing," in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edited by David S.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London: Routledge, 1994.
- Lee, Peter Nan-Shong.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Corpora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Brantly Womac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England: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 Levy Jr., Marion J.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Lewis, W. Arthu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omewood, Ill.: Irwin, 1955.
- Li, Si-ming.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Issue," in *China in Transition: Issue & Policies*, edited by David C. B. Teather and Herbert S. Ye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 Macpherson, C.B.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igdal, Joel S.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Nicholson, Walter E.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 and Its Application*. 7th ed. Orlando, Florida: the Dryden Press, 1997.
- Oi, Jean C.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_____.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Parsons, Talcott.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Rogowski, Ronald.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4th ed., edited by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London: Routledge, 1999.

- Roland, Gérar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0.
- Rostow, Walt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Schmitter, Philippe C.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The New Corporatism*, edited by Fred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4.
- Scott, James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hue, 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olinger, Dorothy J. "The Impac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n the Danwei: Shifts in the Patterns of Labor Mobility Control and Entitlement Provision," in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Xiaobo Lu and Elizabeth J. Perry. London: M.E. Sharpe, 1997.
-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s,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2.
-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Wang, Fei-Ling. *From Family to Market: Labor Allo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 Whiting, Susan H.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ilber, Charles K. and Kenneth P. Jameson. "Paradig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yond,"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Business Division, 1988.
- Wolf, Eric R.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 Yang, Dali L. *Beyond Beijing: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egions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Zhou, Kate Xiao.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 Zweig, David. *Freeing China's Farmer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 _____. "Rural Industry: Constraining the Leading Growth Sector in China's Economy," in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edited by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E. Sharpe, 1991.

中文期刊

- 史浩明、章正璋，"蘇南鄉鎮企業的產權模式與法制環境研究，"《廣西社會科學》(南寧)，總第一 一期(二 三年)。

石之瑜，”大陸農村的公民意識與集體主義—村民參與選舉的意義，”*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

社會學研究編輯部，”98 社會學：研究進展狀況與熱點難點問題，”*社會學研究*（北京），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邱榮華，”大陸「村民委員會」制度與問題之研究，”*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二年二月）。

柳金財，”當前中國大陸村民自治研究相關途徑與理論適用之探討，”*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一期（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_____，”試析中共農村黨支部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衝突的成因，”*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八卷第八期（民國九十一年八月）。

徐斯儉，”大陸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四卷第五期（民國九十年五月）。

_____，”中國大陸九〇年代之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四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二年二月）。

馬祥祐，”村民自治—大陸社會力的重生，”*展望與探索*（台北），第一卷第五期（民國九二年五月）。

高永光，”大陸村民自治與基層民主—從村準立法事項的範圍析論，”*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第一卷第四期（二〇〇一年十月）。

陳淳斌，”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發展與地方政府職能：回顧學界對相關理論的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四卷第七期（民國九〇年七月）。

英文期刊

Domar, Evsey. "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Econometrica (1946).

_____. "Expansion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7 (1947).

Grossman, Gene and Elhanan Helpman.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1994).

Harris, John R. and Michael P. Todaro.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 1970).

Harrod, Roy F.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1939).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Apr. 1965).

_____.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 1971).

Lucas, Jr., 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 1988).

Oi, Jean C.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Romer,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 1986).

Wang, Fei-ling. “Floaters, Moonlighters, and the Underemployed: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v. 1998).

其他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alse Dawn: China Will Have Democracy—But Not Yet, Says One of Jiang Zemin’s Top Advisers on Political Reform,” Oct. 1 (1998).

World Bank Data Base, 2002.

北京同響現代化學術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網，<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

（二 四年二月四日）。